

李士奇著

# 汤若望传



96651

B979.911 6

2

# 汤 若 望 传

李兰琴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立群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朱 强

责任校对:智福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若望传/李兰琴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4

ISBN 7-5060-0578-6

I. 汤…

I. 李…

Ⅱ. ①汤若望-传记②传教士-传记-德国

IV. B9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515 号

**汤 若 望 传**

TANG RUOWANG ZHUAN

李兰琴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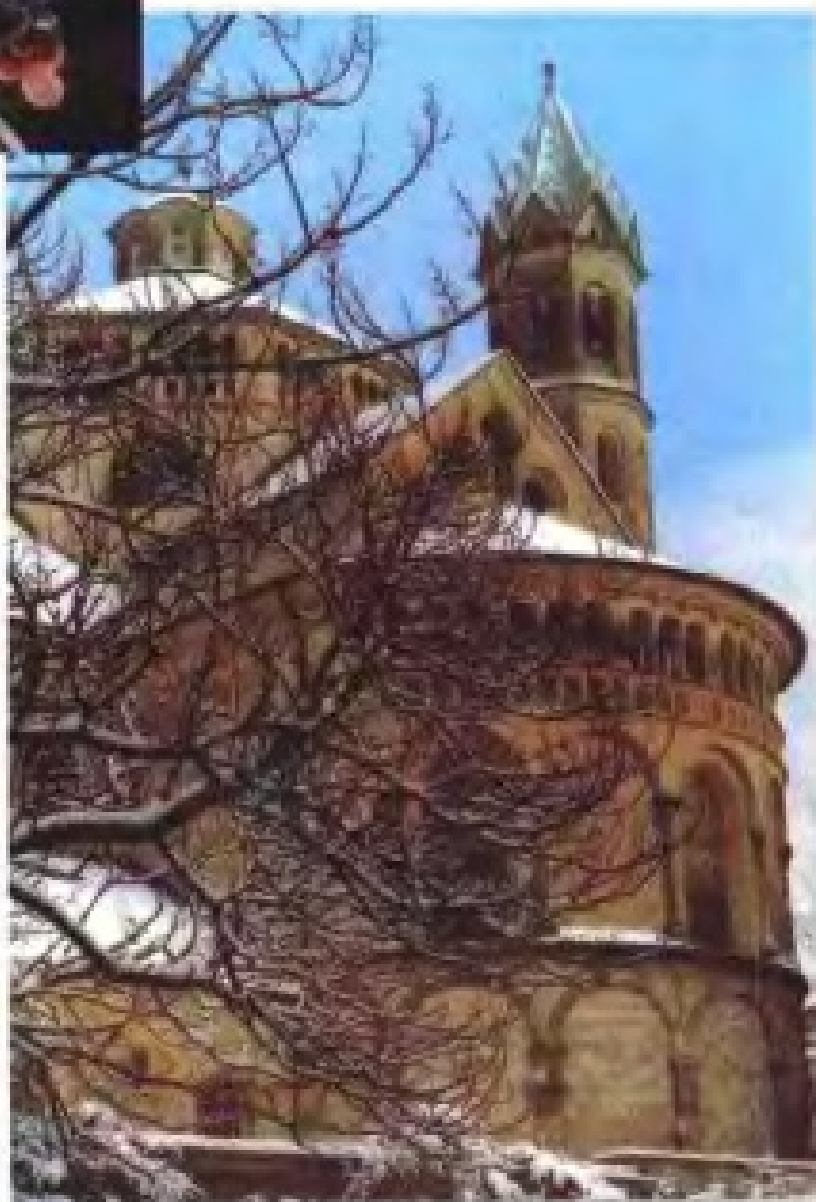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 2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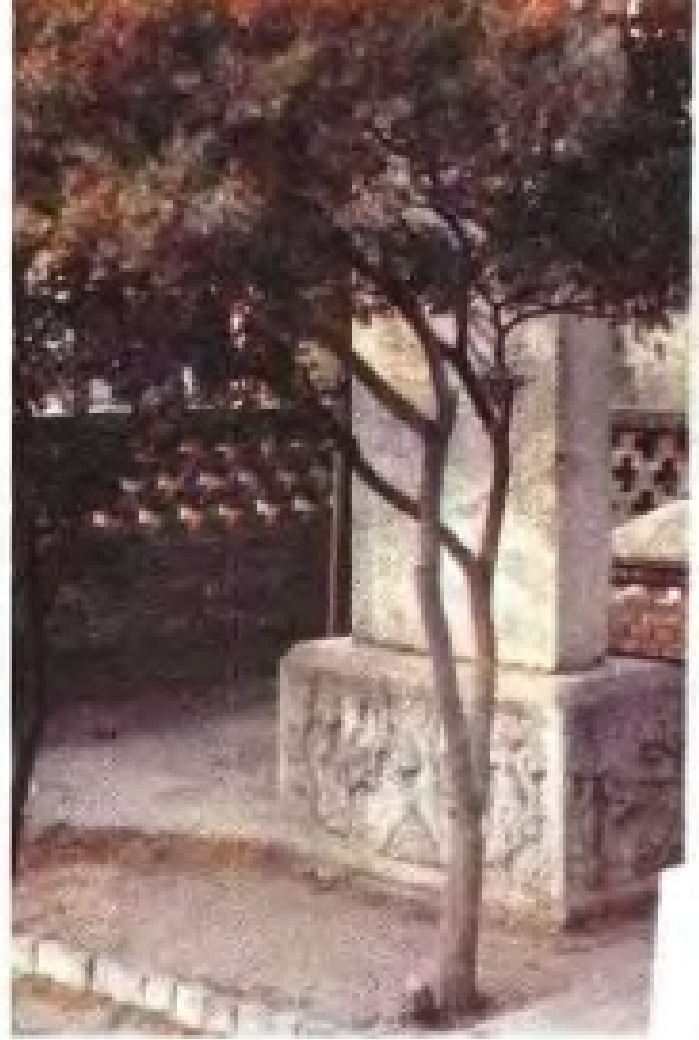
ISBN 7-5060-0578-6/K·130 定价:9.50 元



汤若望像



德国科隆城阿波斯特尔教堂



汤若望墓  
(北京阜成门外)



北京古观象台内汤若望原工作处



中国青花方瓶  
(汤若望后裔收藏)



汤若望著《新历晓惑》

仙童射策相和升，清童秀髮佳堪羨。他山鳥獸請辰會，異國明珠帶子家。

可道天樞通海眼，始知日跡不孤窪。常時白浦探西極，沽酒常逢去有涯。

珠方別自宿烟塵，一葉餘艸世外親。地折流沙繫品物，人寤千摩佛。波瀾若

洞垂色三光，向運毫翰。形多窟室，出向穉官。地受符如君定，不忙瓊丹。

八萬遺科並新中，如雲第子向鴻濛。滄溟慣除片嶺等，風息屢傳那籍存。空

靈藥旋時回，相痛術新。後升天，此屢刺青。長生訣一收，擬醫還考風。

圖書先同影，攝行何珠層。闕攝真像，留本江映。羣在午，間取借。遊古史，昔

翠珠中，知秋。花奈銀，皓光怪。報雙，魁火從。龍。拂。不窮。夜。只恐。富。事。迄。海。煙。

道志先生學道天人養，多事秘心服其善。人中訪處地手曾，遇訪先生壽上

登覽同海外諸奇圖畫此示 正和 道甫心方懷也 河南王铎

王铎题赠汤若望《登览同海外诸奇》

## 前言：重悼芳踪

重悼芳踪，这“芳踪”两字，出自清康熙八年皇帝赐汤若望的祭文，镌于其墓碑上。当时，康熙皇帝亲自派遣官员到汤若望墓前致祭，追悼“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汤若望被这位清代皇帝誉为“鞠躬尽瘁”之臣，对此，他是当之无愧的。而且他四十余年在华生涯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帝王忠臣的范畴。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年轻时到罗马修神学并加入耶稣会。17世纪20年代来中国传播他的信仰天主教。1666年在北京去世，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汤若望志愿到中国弘扬天主教，甚至想使中国社会上层要人乃至宫廷显贵皈依天主教。然而，中国士大夫乃至崇禎、顺治、康熙三位帝王更为赏识的却是他在西学上的造诣与才能。因而早在明代他就被荐入历局，与中国同行一起从事撰写崇禎历书等工作。清朝初年，他又受顺治皇帝之封，出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掌管钦天监印务达20年之久，最后被封为光禄大夫，仕到一品。他在观测天象、制造仪器、修历治历以及掌管钦天监行政事务上均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朝野广泛建立了密切而融洽的关系。这更促进了他在传播西学方面的成功。结果：



“若望谈道之名，反为其历学天文所掩。”（陈垣语）——所以说，历史更改了他在华事业的主航线。而历史也公正地记下了他的贡献，确立了他在西学东渐潮流中的突出地位，使这位早期来华传教士，成为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

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无法进步。

德国伟大文学巨匠歌德曾指出：西方学术传统所固有的那种兴致勃勃的，但也是破坏性的“浮士德式的求知欲”，应该由中国人对待自然的那种“永久的女性气质”来加以补充。李约瑟博士进而认为：欧洲的科学传统可以比之于“自然力阳”，那么，中国的科学传统就可以比之于“自然力阴”，这两种传统，正如这两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力一样，并不互相否定，而是存在着互相补充与互相吸引的倾向。

那么，两种传统又是如何才能发生碰撞，产生交融以至实现相互补充呢？这首先需要人，需要文化邮路的开拓者。这样的人是鸿雁，是桥梁，是人类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使者。然而，并非任何人都能承担这种重任，它要求有两种文化的高度素养，要求有非同寻常的理解力、适应力和活动力，要求要以非同寻常的韧性和耐性，在东西天地间不倦地求索，才能有所成功。纵观汤若望一生，正是这样一篇生动的写照。他四十年如一日，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精神，耕耘于中国的土地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哺育了他，使他在这块土地上扎住了根基，结出了果实。或者说，汤若望这个人物本身，就成为中西文化相融而产生的一枚果实，所以很有特色，很富于内涵，这也许是对他的研究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1933年，德人魏特曾著有《汤若望传》一书。16年后有了中译本。笔者有幸见识了魏特神甫的大部手稿和初加工的原始资料，从中看到他研究传教档案所花的巨大功夫。魏氏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神甫的信念出发，通过回顾汤若望在履行耶稣会使命中的曲

折经历,赞颂其会先行同志传播福音的奉献精神。

此后六十余年中,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过种种研究。这期间,中外历史的长河几经掀起惊涛骇浪。汤氏的荣辱声名随之沉浮,对汤的研究评述也不可避免地随之留下历史变迁的烙印。

当前,在中国疾步走向世界的大潮中,重新探讨汤若望其人在中西交通史中的价值,对文化交流的继往开来,可能会有所裨益。正是从这点出发,笔者拟作一“重悼”的尝试,因而在汤氏曾生活过的几个城市,作了寻踪考察,走访了学者、学术机构和汤氏家族的后代,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在撰述中尽可能借鉴这许多年中外研究者的诸多成果,使用佚散于中外的不少历史资料。笔者是以世俗的眼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再作传述的。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汤若望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地呈现于当代读者的面前。

往昔的文化使者给我们以启迪,未来世界文化交流的需求向我们召唤。当今时代的脚步有如驰骋在高速公路上,世界相形变小了,人民的接触、文化的交汇更多也更易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更广泛、更频仍、更密切的交流浪潮亦将来临。对于她,我们不仅愿像观海潮者那样兴趣十足地翘首企望,而且应为她的到来尽一点微薄之力。

这也是笔者“重悼芳踪”的初衷。

本人在完成这部书稿时,曾得到多方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鲍尔教授(Prof. Dr. Wolfgang Bauer)、魏斯教授(Prof. Dr. Eberhard Weis)和莫克博士(Dr. Walter Mogk)给予的指导和关怀。感谢德国汤若望协会多位对中国友好人士、特别是主席泰森先生(Hansjosef Theyßen)以予的友好情义与支持。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科学院图书馆、德意志博物馆、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和首邑档案馆等图书资料机构

提供的方便。

没有东方出版社的支持,本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责任编辑刘立群先生的鼎力相助和融洽合作。请他们亦接受作者的真诚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能力有限,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中外读者、同行与专家不吝赐教!

## 目 录

|                      |       |
|----------------------|-------|
| 前 言：重悼芳踪 .....       | (I)   |
| 第一章 欧洲岁月 .....       | (1)   |
| 第二章 造炮小史 .....       | (18)  |
| 第三章 传播西学 .....       | (31)  |
| 第四章 交游中士 .....       | (65)  |
| 第五章 清天子与洋“玛法” .....  | (93)  |
| 第六章 中荷初交中的“通事” ..... | (115) |
| 第七章 传布教义 .....       | (125) |
| 第八章 冤狱与昭雪 .....      | (146) |
| 附 录 汤若望生平年表 .....    | (181) |
| 主要参考书目 .....         | (188) |
| 档案资料 .....           | (192) |

D121/21

## 第一章 欧洲岁月

16世纪,欧洲正处于一个风云多变的时代,政教之争,疆土之争,宗教之争,社会发展的新旧交替之争交织进行。德意志更是经历着历史上的多事之秋。踏上处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土地,便有如进入小国的丛林。四百多个诸侯国同时并存,这种离析分崩的局面,决定着它在政治势力上必定是一盘散沙。德意志皇帝与教宗的矛盾日渐趋于尖锐化。但德意志没有形成足够的凝聚力,没有类似英法式的君主政权借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社会下层对罗马教廷的积怨便构成潜伏的危机。那时,不少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生活腐化,巧立名目,索取金钱,激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不满。1517年,发生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领导的宗教改革。路德勇敢地将自己提出的95条改教论纲公诸于世,从而对旧教提出公开的挑战。路德的改革影响远大,此后曾波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新教因之在那里形成国教。路德的誓反即抗议精神对德意志贫苦农民也起了召唤作用。与此同时,新兴工商产业的发展使一些市民较快地致富,而下层劳动者却受到残酷的剥削,普通百姓挣扎于贫困的生活之中。农民倍加受到破产与饥馑的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1523—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这一运动声势浩大,群众性强,当时百姓中约有4/5的人参与。但它后来遭到残酷的镇压,死亡者高达10万人。马丁·路德面对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暴露了其固有的局限性。他

“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sup>①</sup>，也主张无情地鞭笞与屠戮起义的农民。一场德意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被凶暴地镇压下去。农民仍处于被盘剥、被鱼肉的惨状之下。他们对路德及其改革感到失望，许多人又因而返皈旧教。

1530年，新教的拥护者在奥格斯堡聚会，提出了二十八项信条，史称奥格斯堡信条。但天主教与改教者达成协议的希望落空，两者间的分歧反而更加势同水火，从而酿成了德意志内部新的冲突。直到1555年签订了奥格斯堡条约，才暂时平定了局势。此后，世俗的统治者有权调整其管辖境内的宗教事宜，因而形成了“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这样一种原则。

到16世纪末，欧洲的教会基本上是南部以天主教为主，北部则以新教为主。除此基本布局之外，便常以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为转移了。

位于德意志莱茵地区的科隆，虽已临近北疆，但它是神圣罗马帝国晚期最古老的大主教区之一。1582年，盖哈德·冯·瓦尔德堡主教曾试图使科隆改奉新教，从而引起了历时三年的科隆之战（1582—1585年）。结果教皇与皇帝共同将这位主教罢免，在巴伐利亚与西班牙军队的共同保护下，巴伐利亚大公爵恩斯特继任其职。因而此后科隆与巴伐利亚、法国、西班牙保持了良好关系。在科隆地区，天主教的优势也长期得以维护和稳固。这一地区的许多望族，也是世袭的虔诚天主教信徒。

正是在这幅历史帷幕的陪衬下，汤若望降生于人间。

1592年5月1日，他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兰地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命名约翰·亚当。而这个世袭的贵族家庭姓沙尔·冯·贝尔，因而他的全名为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Adam Schall von Bell)。“汤若望”这个名字,是他后来抵达中国后,出于入境随俗的缘故,才另取的汉名。因为 Adam 听起来与中国的姓“汤”相似,而 Johann 这个西名,以前大多习惯地译为“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字的由来了。但我们在叙述他来华之前的经历时,自然以使用亚当·沙尔这个名字才更准确。

对于他的生辰年月,有两种说法:除上述 1592 年之说外,还有人认为他系 1591 年诞生。但笔者以为第二种说法没有太多根据。他年轻时求学的罗马日耳曼学院,在这一问题上留下了可信的依据。在学生登记册的亚当·沙尔·冯·贝尔名下注有:“1608 年 5 月 1 日,方始 17 岁。”那所学校对学员年龄的要求很严格,正因为亚当·沙尔当时年龄偏小,所以他的入学申请一度被校方严肃驳回。这一登记档案,现在恰恰成了查考他出生年月的证据。

那么,约翰·亚当·沙尔出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却已成为有关他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难以解开的疑团了。魏特所著《汤若望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约翰·亚当·沙尔是于 1592 年 5 月 1 日生于科隆城内阿波斯特教堂近处的爵邸中。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新市场街 47 号和伊木·拉赫(Im Lach)街 16 号房宅之所在。”<sup>①</sup>

对上述说法,现在却出现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沙尔—利奥柯尔家族的后裔中,出现了否定的意向:如维德里希·沙尔—利奥柯尔伯爵先生认为:亚当·沙尔并不是出生在上述地点,而是生在其父母当时所居住的吕符腾贝格(Lueftelberg)城堡之中。这个小镇位于科隆城远郊,由于地僻而幽静,有如一处世外桃源。为了寻访亚当·沙尔的遗踪,笔者曾两抵风景宜人的吕符腾贝格,不仅目睹了古老城堡的风韵,也聆听了沙尔后代的叙述。因为无论亚当·沙

---

① 参见魏特《汤若望传》德文版第一章,注释 12,第 4—6 页。

尔呱呱坠地的时刻是否在此古堡中，要寻他在德国的根，这里该是必谒之地，因这城堡曾是他家当时的大本营，也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沙尔家族故居。

“吕符腾贝格”一词，其德文原意有风凉之山的意思，顾名思义，这是个有韵味的山庄。它位于莱茵—西根一带，从现今的行政区划分讲，辖属于梅肯海姆城。这地方虽并非闻名遐迩，但它历史悠久，早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已开拓，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重要，正处在当时帝国直辖的特里尔城通往波恩的交通要道上。沙尔家城堡四围的小小护城河，也与科隆城那时开掘的水渠一脉相通。小镇周围风光憩静，树绿荫浓。17世纪时，村内不过20多座屋宇，星星点点散落于山谷之中。那么这座城堡显然曾是鸡群之鹤了。虽然它几经易主，所幸各届主人都精心地保护了它，因而使它迄今古韵犹存：铁灰色的瓦顶，正黄色的墙壁，用绳索拉起的小吊桥，这一切在浓绿林木的烘托中，更显出一种独特的古典之美。城堡正前方左右两角，各有一个桥头堡式的圆柱型小楼，楼顶酷似骑士的钢盔：顶端一个铁尖尖，似增添了几分威武，使它们好像两名武士，威严地守护着这个古堡。从古城堡行不远，便可见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教堂，系14世纪最后建成。这在当时无疑是沙尔一家经常作弥撒的地方。为了缅怀亚当·沙尔神甫——这位家乡哺育出的名人，教堂特别在墙壁上镌刻了一副汤若望身着清代官服的像，像的线条极简单，形象却清晰而逼真。

无疑，他是家乡的骄傲。他和兄弟们及父母等曾一起生活在这小镇上。在科隆城里新市场附近，确实也曾有过他家的一幢住房。据悉比起城堡要相对简陋、狭小了，可惜遗迹已荡然无存。那么亚当·沙尔到底是生在哪处宅中呢？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要凭推断与分析了。产褥中的贵族太太沙尔会不会离开城堡中的那个设备齐全、环境安宜、仆人诸多的长居之所，而偏安于城里的小住宅



之中呢？维德里希·沙尔—利奥柯尔伯爵先生认为不可能，他说：他认为亚当·沙尔神甫确是生在古城堡的，而且少儿时代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度过的。可能在就读三王冕中学时，曾住在城里宅中，因为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他们若进城，往返需乘坐马车，这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不可能每天来来去去地奔波。而假期之中，亚当和他的兄弟们仍然是在吕符腾贝格美丽的山庄度过的。

在南怀仁笔下，关于亚当·沙尔的出生地是这样记述的：他是“在科隆附近出生的”。南怀仁与汤若望多年朝夕相处。他的见解颇具参考价值。

但沙尔家族后裔中的另外一些人，如年逾八旬的玛丽娅·卡布里埃·沙尔—利奥柯尔伯爵夫人(Marie—Gabrielle Gräfin von Tattenbach Schall—Riaucour)曾对笔者说：这位先祖恐怕是生在科隆城里，她说：乡下医疗条件不佳，医生大多在城里行医。况且，4月底还是乍暖还寒时节，还有些清凉。沙尔太太自然是在城里分娩，才更合乎情理，那时贵族家庭大多在夏季才去城堡中避暑。她的见解当然也有一番道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考证意义不大，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要立一块“亚当·沙尔诞生地”的纪念碑，到底该放在什么地方呢？几年前曾有热心于中德交往史的人，把这样一块牌子挂在了科隆城新市场街附近的路口，新闻媒介也作了报道。但鉴于沙尔家族后裔的不同意见，只好又把牌子取下来！我们期待找到更可靠的历史资料，以帮助我们拨开这团疑云。

迄今所能了解到的沙尔家族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那时他们是该地区的望族，具有比较显赫的财产和声誉，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沙尔家族的族徽。从迄今掌握的材料看，这一家族标志最早出现于1350年。那时期，他们家中涌现了勇敢善战的骑士，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渐有名气。到16世纪，族中出现了两

个主要分支,一个是沙尔·冯·米尔海姆—施瓦多夫(Schall von Mühlheim—Schwadorf),另一个则是摩伦霍芬·吕符腾贝格(Morenhoven—Lüftelberg)。这两支各有一处较大的庄园,其中前一处是住在格劳伊尔(Gleuel)与瓦尔多夫的家人购置的。后一处是亚当·沙尔的曾祖母结婚时,娘家陪送的田庄。亚当·沙尔的祖父亦名约翰,祖母名莉沙(Lysa),娘家姓冯·阿尔登库姆(von Aldenkum)。她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亚当·沙尔的伯父,另一个即是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德根哈特(Heinrich Degenhard)。兄弟两个成年后分了家,伯父家分得了米尔海姆的庄园,父亲则继承了吕符腾贝格的产业。他先后娶了三位夫人,前两个不幸早亡,第三位正是亚当·沙尔(汤若望)的生母玛丽亚,娘家姓舍发尔特·冯·梅罗德(Scheifahrt von Merode)。

中国皇帝顺治(1644—1661年)曾给予汤若望祖上三代以很高的荣典,可惜他的双亲都没有福气歆享,因为他们夫妻都没享有高寿。另外两辈就更谈不到了。他的父亲早在亚当·沙尔离开故乡之前就已去世。母亲故于1621年。他们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约翰·莱茵哈特,年轻时即开始修习神学,后来到附近的希尔德海姆大教堂当了教士。另一个儿子小海因里希·德根哈特以后成为他们这一代中唯一一条传宗接代的根苗。因为连父母也没有料到,他们把儿子亚当·沙尔完全奉献给了中国。

小海因里希·德根哈特在家乡同样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他荣任附近两个专区的区长,以后又被选任莱茵巴赫、哥特贝格、梅伦姆三区区长。可惜的是,他作为唯一的家族继承人,并没有男嗣留世,他的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名伊丽莎白。因而产业的产业由她的夫婿菲利浦继承。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以后所涉及的沙尔家族后裔,全都出自旁系亲属。而且我们很明显发现这个姓氏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沙尔”,变成沙尔—利奥柯尔。这一变化发生

在 18 世纪,即家族继承人卡尔·特奥多尔伯爵在世时期。他于 1747 年生于曼海姆,1832 年逝世于巴黎。由于这位伯爵不善理财,或者说他的生活颇为奢费,因而使家产耗费殆尽。<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萨克森的利奥柯尔伯爵之家达成一项协议:两家的族徽合而为一,两家的姓氏合而为一,这便产生了沙尔—利奥柯尔这个姓。这家萨克森伯爵原没有男性继承人,他的一位千金小姐当时尚且年幼。上述协定达成之后 7 年,即 1777 年,卡尔·特奥多尔伯爵与利奥柯尔家的小姐在曼海姆成亲,从此,在萨克森的这个世袭庄园里,出现了一名新的男性继承人,卡尔·特奥多尔·沙尔—利奥柯尔(Karl Theodor Schall—Riauour)协议达成后 7 年,按照当时有关继承法的规定,在确信该家族始终没有男性后裔之后,这一协定才正式在法律上生效。

这以后,伯爵夫妇从西部迁居到萨克森的皋辛克(Gaussig)庄园。从那时起,合二而一的伯爵之家就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下来,历经一百多年。因而这里是沙尔—利奥柯尔家族故居。它有如一个大别墅,古木参天,湖水清澈,湖心有小亭,宅中有非常宽敞舒适的住房。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945 年,在民主德国的变革时期,这里的财产充为公有,用作疗养场所。被剥夺所有权的伯爵后代,远走他乡,在慕尼黑等地落脚,他们从故居中携出的,只有两幅汤若望在中国做官时的画像和一两件中国瓷器。据悉,原来沙尔家人从科隆曾把一批有关汤若望的纪念物、价值昂贵的遗物或文物带到皋辛克,但如今都已无从找寻了。

当然,沙尔—利奥柯尔家族的后代我们如今仍可见到,而且他们大多热心于弘扬家族的这一段光荣的历史,热衷于续写德国人与中国人自汤若望时缔结的友情。

---

<sup>①</sup> 根据沙尔家族后裔的亲自介绍。

对于从皋辛克到如今的家族历史了解最多的，现在就要数年逾八旬的玛丽亚·沙尔—利奥柯尔伯爵夫人了，而且她对家族史上的历历往事一往情深。凡能搜集到的有关文字与材料，哪怕是片言只字，她都精心保存起来，汤若望身着清代官服的画像挂在她的堂厅里。皋辛克一家三代的照片，她也搜集整理成册。据她介绍，整个沙尔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谓地奉献出五个男子的性命，这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卡尔（生于1908年）及其孪生兄弟。由于他俩年幼时，清朝末代皇帝还没有退位，所以这两个人还曾继承中国皇帝所封的爵号。但他俩是这一荣誉称号的最后一代传人了。可惜这位双生兄弟都成了战争的殉葬品；卡尔在1940年敦克尔刻战役中受重伤，不久即死去。他的兄弟约瑟夫在1944年德累斯顿的激烈战斗中丧生，新婚未满一年的妻子是奥地利人，还没有生儿育女，此后返回故乡维也纳，这一支也就“断了香火”。卡尔有幸留下一个儿子，这就是伯爵夫人的爱子：格奥尔格·沙尔—利奥柯尔（Georg Schall—Riaucour）先生。他是职业律师，居住与从业均在慕尼黑，也是沙尔世家中这一代人中的颇有名望者。与他同属一代的男性还有佩特罗·沙尔—利奥柯尔（Adam—Petrus Schall—Riaucour）、维德里希·沙尔—利奥柯尔（Wilderich Schall—Riaucour）、弗兰茨·沙尔—利奥柯尔（Franz Schall—Riaucour）和彼得·沙尔—利奥柯尔（Peter Schall—Riaucour）等几个堂兄弟。

其中，维德里希伯爵是工程师，于1943年生于德累斯顿。近几年中，他参与了汤若望协会的多种活动，还几次作报告介绍汤若望的生平，并在着手整理沙尔家族的家谱。维德里希的父亲也在二次大战中阵亡（1944年）。母亲已73岁高龄。1992年他们母子曾以典型的中国祭祖方式，公开祭奠家族这位出类拔萃的先祖。

弗兰茨·沙尔—利奥柯尔伯爵子1929年生于维恩贝格（Wernberg）。他与夫人，医学博士英格贝格·玛丽亚和儿子亚当

·米歇埃尔·沙尔—利奥柯尔(Adam Michael Schall—Riaucour)都是中德友好汤若望协会的成员。一家人目前居住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小城。长年以来,他家精心保存着一件家族的历史文物——那是汤若望当年托人从中国捎回家乡的小瓷瓶,是顺治初年民窑中烧制的蓝白两色瓷器,呈方形,上面绘有仕女。瓶底纹有蕉叶,这是判定这小小文物的可靠依据。

沙尔家族后裔中还有些支系,或已久居加拿大,或在奥地利定居,他们各支系之间,也大体上失去了联系。

这一家族各个支系,在莱茵兰地区或多或少还有些遗迹可寻。如在现在的科隆—布吕尔地区的沙伦多夫(Schallendorf),亦称施瓦多夫(Schwadorf)城堡,它是当时贵族的典型建筑,建于水中,占地面积有200多摩根。12世纪时,这座城堡由冯·贝尔(von Bell)骑士所有。以后这座城堡在1788年就已出售给市民家庭,因而有关汤氏家族生活的痕迹是找不到了。

另外一处是科隆的格劳伊尔(Gleuel),这座水堡,或称带有小小护城河的古堡,目前仍保存完好,尽管它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早在罗马人在这一带建城时,它的雏型已存在,它的水道与罗马人城市的水路相通。城堡最早的主人当然也是骑士们,他们因骁勇善战而闻名,有的甚至被选为科隆大选侯议会的或员。大约在公元1550—1629年间,沙尔·冯·贝尔一家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也就是说适值汤若望出生前后,这里是他们家族的产业。以后便几经更换主人,各届主人都加以维修、保护,所以直到如今,现代人只要有兴趣,还可以一睹它古色古香的丰采。

孩提时代,亚当·沙尔是在科隆城的三王冕中学就读的。这是当时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学校,因而也是贵族子弟云集的教育场所。学校的旧址如今已荡然无存。它原来大约在今圣玛丽亚升天教堂与马采伦大街附近。亚当·沙尔估计是寄宿在佛罗伊德贝格

(Freudeberg)修道院。少年时代,他性格就比较活跃,曾加入“天使兄弟会”,并在会中担任助理员。学业上,他成绩出众,很受校方器重,所以在他毕业后,才会被保送进入罗马的日耳曼学院。

1608年5月,沙尔结束了他的中学学业,也就此结束了他在家乡的少年时代的生活。6月初旬,正是欧洲风光最明媚的日子,沙尔开始了毕生第一次长途旅行,从家乡科隆前往直意大利。他骑着马,在一名家仆的护送下,来到罗马这个天主教的圣地。恐怕连亚当·沙尔本人及其父母兄弟都没料到,他这一去,便是与故乡亲人的永远别离,连双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家奔丧。当然,谁也没有料到,后来他竟给家族和故乡带来流芳百代的殊荣。

设于意大利罗马城的日耳曼学院,当时是欧洲一个有名气的学府,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忠于教会,学业上又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期望他们日后成长为各教会组织、各修道院的中坚。因此选收学员也十分严格,需几个神甫共同推荐,然后由教区的主要负责人签字保送,并寄去被荐入的成绩、考卷及内容庞杂的申请表,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入学。对年龄的要求同样十分严格,因为学院旨在招收各方面比较成熟的学员,经7年全面培养训练,毕业后即可以祝圣。故规定入学年龄必须是年满20岁。

亚当·沙尔虽然当时各方面成绩都很出色,但由于年龄关系却险些被淘汰。因为他在1608年5月1日,才刚刚进入17岁。校方很不容情地提议把他转到罗马学院读书。最后特地由他家乡科隆城的副主教暨巴伐利亚公爵斐迪南给耶稣会总会长修书一封,极力加以保荐,这使校方感到不好推脱,才表示:“鉴于巴伐利亚王室及殿下本人对耶稣会作出的卓著功绩与一片盛情……”才特地破格收下他保荐的亚当·沙尔。沙尔的入学日期是1608年7月24日。

日耳曼学院学员的一切活动安排雁行有序。入学前在填写申

报表格时,就要签字画押,表示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嗣后便要集体宣誓,矢志履行自己的诺言。学员连着装也是一丝不苟的,一律要穿神学院设计的红色大警式制服。更换服装也必须统一行动。每个学生都要为学校尽一定的义务,以期从中受到应有的锻炼。

在日耳曼学院读书的岁月,是亚当·沙尔从身体到智力上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初进校时,他还是一个稚气十足、体格清瘦的少年。毕业之际,他已成为一个学业优秀、体魄健壮而又朝气蓬勃的青年。

这一时期,他在信仰上日益坚定,精神境界也日趋成熟。在这种学校,每个学员都有一位良心指导教师(用现代的说法或称思想辅导员更贴切)。沙尔感到,他的辅导老师努斯鲍姆神甫在心灵上曾给他以很大启发。由于此人的帮助,使亚当不断坚定了他的信念,并决心加入耶稣会,这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决策。1611年10月21日,他正式入会了。这不但决定着他自己本人的前途,而且对耶稣会未来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也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还未满20岁的青年,能如此怀抱坚定的信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是令人刮目相视的。可以说,加入耶稣会一举,是亚当·沙尔生活旅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此后,他便开始了见习修士的生活。在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磨炼。比如,同其他修士一道,到社会上募集零钱,积少成多,拿去赈济穷苦人。又如到医院去为病人作护理,到监狱中为犯人作神事。他还曾和几个年轻修士结伴去朝圣旅行。他们身无分文,完全以“化缘”方式四方游历,这使他们在忍耐性、刻苦性上,受到实实在在的磨炼。以后沙尔在生活上表现出的韧性,与年轻时的这些磨炼是很有关系的。他本人对日耳曼学院的这一段生活也很留恋。所以他到亚洲后,第一封写往欧洲的信件就是寄给母校的。

结束日耳曼学院的学业之后,亚当·沙尔又进入了罗马学院。这两大学府,都是耶稣会创立人圣伊格纳提乌斯·罗耀拉所建,旨在为教会培养对外传教的神职人员。罗马学院系他在1551年在罗马城首创,第二年又为来自德国的学员创设了日耳曼学院。

欧洲中世纪时代,教育几乎成了神职人员的专利品。那时,造纸、印刷等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知识的传播主要靠人的记忆与讲述。而知识这个概念,在当时人的头脑中主要限于宗教、神学、哲学这种学科,神职人员恰恰专司这些知识的传授,因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神职人员享有无尚的尊敬与权威,这一点成为欧洲的一种传统观念。在亚当·沙尔时代,这样的观念仍然十分强烈,十分流行,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终身效力于神职的一个原因。

从天主教本身的发展来看,在宗教改革爆发前后,形成了一个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为了对付新教,改革旧教的衰颓局面,以重振天主教,曾有一批信德颇高的旧教司铎等,作出过种种努力,其中也包括伊格纳提乌斯·罗耀拉。他是西班牙人,1491年诞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后来成为耶稣会的创设者。他年轻时以惊人的毅力研读神学,修炼圣德,然后与七个志同道合者,一同去进谒了教宗,阐述了他们一致的矢愿:共同建立一个新的修会——耶稣会。除一般修士所发的三个矢愿之外,他们还特别矢志服从教宗的圣愿,无条件地前往教会派遣的任何地方。这一点以后发展为耶稣会的传统。

公元1539年,他们在获得教宗批准之后,建立了耶稣会。<sup>①</sup>该会成立之初,立即显示出它的活力与严肃的纪律性。会士们不是整天端坐于教堂内诵读日课,而是可以自己支配一切时间用来学习各种知识,进行传教或自己作祈祷。与此同时,他们像士兵一样,随

---

<sup>①</sup> 参见: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二,生命意义出版社(香港)。



时准备应召到世界各地传教,并同时大力兴办教育,以期从教育入手,塑造青年一代的心灵。上述罗马学院与日耳曼学院正属他们所办的公学之列。正因为汤若望出自这种学府,身为耶稣会成员,所以必须终生信守其矢志。这也是他到达中国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汤若望是在1616年新年伊始正式递交给耶稣会总会长的。这一愿望的萌发与他在罗马这几年的生活密不可分。

当时的罗马,除了掌握东方传教的各种信息之外,也自然成为东方文化信息的荟萃之处。这使年轻的学子们获悉了欧洲以外世界的魅力。

而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所取得的成绩,也在这里很快得到广泛的传送和称颂。利子在中国得到朝廷的礼遇,不但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而且跻身儒林,与中士共译西方的学术经典。这一切使罗马的年轻神职人员心驰神往,愿去继承玛窦的事业,矢志到新开拓的传教领域,去奉献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与才智。

这也是汤若望写出申请的初衷。当然他的愿望得到刚从中国返回欧洲的金尼阁神甫的鼓励和支持。1616年底,他高兴地获得了准许。

就这样,“中国之行”已列入他的生活日程。他已整装待命了。

1618年4月16日,是汤若望与欧洲道别的日子。这一天他同数以百计的乘客,都来到里斯本大港码头。早已悉心准备好的行李一一装入了行李舱。只剩下旅客登船这隆重的一幕。飘洋过海,即使在今天,也难以预测吉凶,更何况是在三百多年前呢!亲友们纷纷前来送别。为耶稣会士们举行的告辞仪式则更加庄重:送客的人为远行者行吻足礼,表示对他们由衷的尊敬和崇拜。众人高唱着圣经中的赞美诗句:“传布和平的使者们,他们的双足是多么可敬可亲啊!”这时,启锚的炮声响了,22名神甫一起登上了“善心耶稣”

号远航船。这艘船上,连同驾驶人员及水手,共有 630 人之多。这些人起码要在半年之内,同患难,共命运。

金尼阁神甫携带着汤若望等年轻会士们,一同启程了。同行的德国神甫还有约翰·特伦茨(Johann Terrenz,或 Schreck),即以后取汉名为邓玉函的神甫。还有约翰·阿尔布莱希(Johann Albrech)和维·帕·基尔维策(Wenzeslaus Pantaleon Kirwitzer),汉名齐惟才<sup>①</sup>。另外有 3 名意大利人、5 名比利时人和 10 名葡萄牙人。然而这 22 个人中,前后有 14 名殉教了。余者有的那时还没有取得神甫资格,不得不先留在澳门完成他们的学业,故赴华时间又推迟数年。汤若望所幸的是,他在罗马一口气完成了神甫晋升阶段,为此他从抵达意大利后甚至无暇回乡省亲。但这对他日后的事业颇为有益。与他同行的耶稣会士们,最后仅有 8 人真正实现了在中国传教的愿望。其中除了汤若望之外,另外 7 人为:金尼阁,傅汎济,邓玉函(1576—1630 年),罗雅谷(1592—1638 年),伏定原(Froes Frois, 1591—1638 年),齐惟才和瞿西满(Simon da Cunha, 1589—1660 年)。这之中又有 4 人都是短寿的,即邓玉函、罗雅谷、伏定原和齐惟才。瞿西满后来是担任了罗马任命的教务视察员。金尼阁与傅汎济两人后来是较有成就的。金尼阁是法国人,生于 1577 年,卒于 1628 年。1594 年加入耶稣会。他初次赴中国是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4 年之后奉命去罗马报告在中国传教的情况。他请求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用汉语作弥撒,这都获得了罗马的批准。他这次重返欧洲,还办成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募集了 7000 册图书,费了种种周折,后来终于运抵中国,这成为中、西文化沟通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其二便是为中国传教在欧洲“招兵买马”,同船携来了诸位同会弟兄,正是他的工作成果。以后他还为西方人学习

---

<sup>①</sup>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209 页。

中国语言写了《西儒耳目资》，这本书在音韵学史上有开拓作用。以上是金氏的特殊贡献。他的另一部著作名为《基督教远被中国记》。

傅汎济是葡萄牙人，生于 1587 年。1608 年加入耶稣会。他入华之后，先到嘉定逗留，学习汉语。后在杭州与李之藻等一起译书。译成《寰有铨》(六卷)和《名理探》两书。因而和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起留下了早期杭州译书史上的佳话，即所谓“结庐湖上”、“庐居灵竺”，意思是讲他们曾共同在西湖水上，在灵隐与天竺之间，一起从事中西文字的输通与推蔽。此人 1653 年卒于澳门。这些均是后话。

这多名旅伴之中，日后最有成就者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汤若望了。

自“善心耶稣”号驶离里斯本港口后，这船上的所有乘友们，无论主观上情愿与否，大家都只有同舟共济，别无良策了。

当然，初登海程之时，人们怀着新鲜好奇感，船上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耶稣会士们利用方便的地理位置，进行观测和研究。原来生活在欧洲的城市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样无遮无碍地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在这里，海风、海潮随时需要观测，不仅因为他们饶有兴致，而且由于必不可少。船上，罗盘针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晚上，站立在甲板上观看星象，当然是得天独厚的位置。船上每周都有系统的功课安排。擅长数学的邓玉函神甫，每周给会友们上一次数学课。金尼阁神甫每周作一次汉语启蒙。此外，神甫们还有他们每日必修的课业：神学、祈祷，这些无疑是法定的。

然而，这长途的旅行生活并非是那么美好、惬意的。第一件艰难事，是每天都受到晕船痛苦的折磨。虽然因人而异，反应不一，但是恶心、呕吐、头昏，或嗜睡或失眠，这一切使乘客的身体状况紊乱，过了很久才逐步习惯下来。为了减轻海船造成的病态的折磨，人们也有意识地把自已的思路集中在某种事务上。

每遇到返程船、邮船，乘友们就把精心书写、贴封的家信交付予人。这些信常常是写两份，<sup>①</sup>打印上火漆。信中详细报告他们的经历，也寄上他们对别离的故土一片眷念之意。有的信件现在还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或其他图书馆内。

汤若望在漫漫旅途中，曾写过的“家信”有两封尚保存至今，在其中一封的行文中，他回忆起在罗马书院的生活，他请求转告对院长和努斯鲍姆神甫的问候，这是他的指导神甫，所以还特地满怀深情地叮嘱说：“去问候努斯鲍姆神甫时，一定要轻手轻脚，以免惊扰他虔诚的祈祷。”<sup>②</sup>

航船行驶的路途是漫长的。它从里斯本向西南方向，沿着西非海岸缓缓行进，与对面的巴西大陆遥遥相望。它经过加那利群岛，接着就航抵有名的佛得角。从这里又沿着几内亚海岸继续前进。之后越过赤道，绕到好望角。它顺着非洲拐弯，从科摩罗群岛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穿行而过，一直向着印度半岛行进。这海船离欧洲越远，份量也越减轻：船上的食物，用品、燃料一天天消耗掉了，连人的总重量都在减少——不断有人在船上死亡，不管同伴是否情愿，都只能将他们的身躯投葬鱼腹了。

在驶近非洲几内亚海岸时，船上人的生命受到可怕的瘟疫袭击，这瘟疫相互传染，很快就蔓延开来。大约一半人都卧于病床上，发着高烧，与死亡搏斗着。这种病就是恶劣的非洲疟疾。它夺去了四十多人的生命。金尼阁、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尽管自己也先后受到病魔的威胁，但还是挣扎着起来救护其他病友。死去的人中有5人是传教士，同会的兄弟们对此深感遗憾，因为他们的同志还没有去实践其东方传教的宏愿，就在远征途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

① 为防止丢失，有的还写一式三份，如今在档案馆中找到的，同一信存有两三份很多见。当然有的是后来另请他人书写的。

② Jap-Sin, 142号，信件1号。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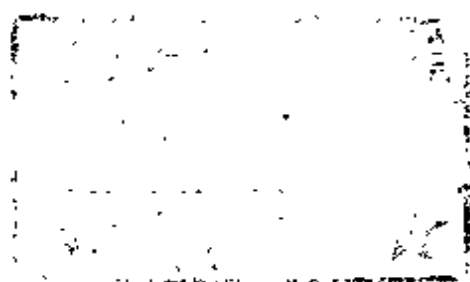
远航船的行进是艰难的，有时受到无情海风的阻逆，徘徊不前。有时险些被巨大的海浪吞没，这种全船覆没的危险几次出现，人们几乎天天在祈求神灵的保佑……然而，困难毕竟一一摆脱了，印度大陆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1618年10月4日，经过了五个半月的苦难历程，航船抵达印度的果阿。

这座古城，当时还经历着其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金色果阿”之称。已经疲惫不堪的乘客们，首先为能重新落脚在大陆上而感到格外喜悦。他们沐浴、更衣，洗去几个月海上的灰尘。同时，这些远方的来客，也以好奇的目光，欣赏着亚洲大陆的异国风光。

这地方从1510年起，已被葡萄牙人占领。天主教会的势力，因而也已获得发展。这里已建起几个书院。对迢迢千里之外来的教士兄弟们，这些书院无疑是最理想的接待站了。他们在这里逗留的日子可以说是休养、度假。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休息调养，以图早日精力充沛地奔赴各自的目的地。同时他们也需要及时地交流各方情报，以掌握教会在各地而临的形势。几个将去中国的教士，当然急于恭听中国明朝对天主教传播的态度。

果阿的几个月调整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619年5月，赴中国的教士们重新启程了。金尼阁与邓玉函同乘一船，汤若望与齐惟才（基尔维策）搭乘另一条船，先后向中国南海方向驶去。两个月后，他们分别在澳门登陆。就这样，汤若望的欧—亚之行终于顺利结束了，他也就此告别了欧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



## 第二章 造炮小史

汤若望抵达中国前后，正值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长期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对人民盘剥吸髓。各级官僚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不顾国家库府空虚，民间哀鸿遍野，四疆兵变迭起，社会危机四伏。庄烈皇上登基后，面对艰危局势，仍试图力挽时代狂澜，无论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想有所作为，所以他还是需要任用一些得力人才的。

关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方面，在汤若望抵华前，曾发生了沈淮教案。吏部侍郎沈淮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向皇帝上《参远夷疏》，要求取缔外国传教士。因此一些西方耶稣会士被押解到广州、澳门。南京的天主堂及教士住所被拆毁。其他教士多暂避于杭州杨廷筠家。而中国奉教的官员也上疏力保其教。沈淮不久失势。几年以后，教案渐渐平息。在汤若望来到时，这一不利形势基本上已扭转了。所以汤氏大体上可以说是逢时而至的，他不久即得到朝廷委任的机会。

从若望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余年之中，汤氏的所作所为不外乎四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安顿下来，深入研习中国语言，逐步接近士大夫阶层，以为日后做种种准备。第二，开始传教。第三，在崇禎抵御外患的措施中，他应聘参与了火炮的制造事宜。第四，他的天学知识与才能，得到初步的认识与发挥，因而被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因当时“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见食，及星宿缠犯，取中国经验

之不甚应，以西历验之辄应。遂加西人汤若望尚宝司卿，专理历法。先是召对，德璟奏及之，曰：‘汤若望有何好处，皇上如此优礼？’上曰：‘古帝皇招徕远人。汤若望远夷慕化，朕故优待之有加’……<sup>①</sup>

以下先述汤若望为崇祯帝造炮之原委。

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与应用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此后中国也继而成为制造火器较早的国家。所以李约瑟先生在评价这一问题时说：

“中国在9世纪就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化学炸药，火药用于战争可以追溯到公元919年，当时中国首次使用火药作为喷火器的引信。公元1000年，中国制成了炸弹和炮弹，不过那时的炮弹不是通过大炮发射，而是由石弩或弩炮弹出，速度徐缓。此后，火箭、火器等等相继在中国诞生。”

“我们认为火炮也是中国人的发明。火炮是一个惊人的发明。”<sup>②</sup>

李约瑟先生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确实了如指掌。早在南宋时代，军事家陈规所发明的火器，被视为是最早的火炮。到了元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制成了“铜火铳”。以后，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这些火器才逐步传入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连续不断的征战中恰恰需要这样的利器，如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大炮发挥了相当的威力，同时也获得了改造与发展。大炮当时从中国传入欧洲，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产生了可观影响。令人遗憾的是，在其故乡，它的发明地，火器的发展反而缓慢了，落后了。到了明代，人们才又重新开始认识火器的重要性，并在欧洲人的帮助下重新制造火炮。汤若望造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

<sup>①</sup> 文秉《烈皇小识》，广文书局，1967年版，第213页。

<sup>②</sup> 约翰·默逊编著，庄锡昌等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进行的。

明熹宗在位时，徐光启曾上疏：“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sup>①</sup> 后来，熹宗命陆若汉带了二十多个西人铸大炮，称为“红衣”或“佛郎机”。

明朝天启初年，曾从葡萄牙人手中进口了一批西洋火炮，但并未使用，而是置之兵器库束之高阁。明代人认识到大炮的威力，主要是通过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的一次重要战役。当时后金努尔哈赤发兵攻入宁远（今辽宁兴城），明朝大将袁崇焕（1584—1630年）率兵抵御，但他的兵员仅两万余众，而后金却发兵五、六万之多。在这种兵力悬殊、寡不敌众的局面下，袁崇焕以极大的魄力，调用了入库的西洋大炮，将其布置在四面城墙之上。炮击之后，果然见效，因为后金人弄不清这是什么神奇的杀伤物，他们许多人密集一处躲闪，结果伤亡惨重，吃了大亏。努尔哈赤本人也大伤元气。后来他卧床不起，不久就命归西天了。明军这一次竟以少胜多，全军大捷，明帝熹宗特颁旨予以表彰：“虏遭屡挫，打死头目，自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sup>②</sup> 这一仗打下来，大炮大显神威，因之又是受封，又是受祭，皇帝下达了如下旨意：

“西洋炮即如法多制，以资防御。”

据说当时受封的那门炮，正是徐光启等数年前从澳门引进的。1618年，徐光启受命练兵，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他派人去澳门购买火炮并招募了炮手。经过这一仗后，其中一门炮获美称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这以后，外国教士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改善，如龙华民、阳玛诺等人，曾受到明朝兵部聘请，协助训练炮兵等。

以上正是汤若望受命造炮的前因。

---

① 《明史》卷 251“徐光启传”。

② 《明熹宗天启实录》第 63 卷，第 5 页。



汤若望为明廷造炮到底是在何时呢？对此，诸家说法颇有出入。方豪先生认为应是1636年（崇祯九年）。按照《正教奉褒》一书的记载是1640年（崇祯十三年）。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及魏特《汤若望传》中均认为是1642年。笔者在查阅了有关资料之后，也认为1642年这种说法更具有说服力。

据明朝实录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若槁举西洋人汤若望演习火器。宗周进曰：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自有大器辄依为劲，误专在此。上曰：火器终为中国长技。宗周曰：汤若望为一西洋人，有何才技。据首善书院为历局。非春秋尊中国之义。乞令还国，毋使诬惑。上曰：彼远人，无斥遣之礼。上不怵命，宗周退。”<sup>①</sup>

崇祯九年，明廷已处于一片内忧外患之中。后金皇太极派阿济格攻入关内，为了保卫关内城池，崇祯帝有意使用大炮，于是下达旨意，要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帮助教授、训练炮手，同时协助视察京城防御工事。至1642年，边疆再次告急，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皇帝否决大臣刘宗周的异议，决定任用汤若望铸造火炮。但迄今为止，他虽然听说汤若望能教练炮手，具有铸炮知识，但他的本事到底怎样？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对此无人能作出确凿有据的答复。于是皇帝决定派人明察暗访，深入了解。一旦证明传言属实，即马上传他接旨造炮。

被皇上派去察访的人既没有披露真实身份，也没有亮出来意，他只装作一个普普通通的来客，而且相当好奇好聊，问东问西，加上汤若望本来就很健谈，又对中国朋友十分热情，所以二人很容易打开了“话匣子”，客入对火炮这个话题格外着迷，不断寻问大炮的种种规格、式样，造炮所需的材料，炮弹中火药的配方等等，若望口若悬河，凡他知道的，一一详细作答，还介绍了他在欧洲时有关这

<sup>①</sup> 《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第十五卷第19页。

方面的所见所闻以及他阅读过的一些书籍。这一切使来访者断定，汤若望正是他所要觅寻的合适人选，于是他突然亮明身份——原来他密藏皇帝圣旨，并立即宣若望接旨。汤若望万万没料到，他不知不觉中已掉进了圈套，因之急呵呵赶忙寻找退却之策。他解释说：本人只不过胡乱看了些书罢了，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头脑中想的是一回事，干起来完全是另外一码事，那是需要经验的。再说，制炮这种事不是我的份内工作，也与我的职业不相干……可惜来访者此时却不屑于和他多谈了。只是简短地说：“下官唯有遵从圣旨，别无他法。”汤若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给崇祯皇帝上疏一道，婉转地阐述难以从命的理由。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君无戏言，圣旨既出，任何人不得违抗。

然而事情的进展也并非那么一帆风顺。在当时的中国，办点事又谈何容易呢？从中作梗者不乏其人。汤若望虽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孰不知在背后踢脚者大有人在。官员们在是否任用汤若望主持造炮一事上众说纷纭：有的敬服汤若望的学识与能力，深信他能承担这一重任。有的将信将疑，有的矜持狂妄地站出来反对，声称使用一个蓝眼睛的西国人有辱于中国之尊。比如，御史杨若樵就曾一再举荐汤若望，而吏部左侍郎刘宗周却竭力反对，他上了一篇奏折，其中写道：“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貽笑？”事实上，这位自视甚高的“上邦忠良”之辈，他自己的所言才是貽笑大方的，因为他尽管出言不逊，却并未悟出这条浅显的道理：技术与科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以国家大小作为衡量的标准。小国的文化发达了，科技进步快了，自有精英人才脱颖而出；大国无论有何等广袤领土，无论怎样地处“中央”，如果既不放手国人探索技术科学，又不吸取别人之长，而是一味妄自尊大，那么终究要落伍的。

不过当时崇祯皇帝对这位左侍郎奏折的批示还是颇有明鉴的，他斥责刘宗周“愎拗偏迂”，并指出：“火器是中国长技，若望比

不得外夷”。<sup>①</sup> 这简明扼要的两句话点明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肯定了中国以往在发展火器上的成就，虽然聘请外籍人才，但对自己仍然是充满信心的，并不说明请教洋人就是否定自己；其次是明确表示了朝廷对汤若望的态度——把他视为自己人，这反映出对汤的充分信任。正是在这种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才把生产兵器这样重要的军事任务交诸他手。

一波刚平又起一波。就在汤若望刚去报到之时，财物方面又出现阻力。经管财务的人竟不予拨款。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官场弊端横生：朝臣倾轧，朋党无休止地争斗，宦官窃取实权，上下污吏贪官肆无忌惮地填饱私囊。为了个人享乐，不惜耗费巨资，而对有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竟然毫无热心。这种状况也使汤若望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面临做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他气愤地抱怨说：这些大人们显然以为“人们用不着花钱，就靠法术，念个咒语，就可以把枪炮变出来了！”<sup>②</sup>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解决了这个难题，制炮工作正式开工。

在紫禁城开阔、空荡的院子里，<sup>③</sup> 很快开辟出一块场地，作为火炮临时试验场。铁、火药及各类工具都运到了。三十多名太监被派到这里充当“学徒”或“临时工”。这些人对生产兵器自然一无所知。需要汤若望从零一点点讲起。但随着炮身成形，这些人也渐渐入了一点门径。不过闹笑话、出纰漏的事有时也是难免的。据说有一天，一门大炮刚刚铸成，炮筒尚未磨光，就有人把一枚炮弹装了进去，说是为了测试一下这东西是否灵验。可炮弹好进不好出。几个“伙计”急得团团转，忙不迭地把汤师傅找来。若望赶到现场查看，遂命人真的装上一些火药，设法把炮弹放出来。霎时间，这一向

① 李逊之《三朝野记》，1982年历史研究社编，第177页。

② Vath《Adam Schall von Bell》，6. Kapitel 魏特《汤若望传》，第6章（德文版）。

③ 另一说造炮地点设在煤山，即今景山公园内。见上书中文版第204页。

肃穆、寂静的紫禁城内，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众人大惊失色，连身居内官的天子也吓得惊魂不定，忙寻问是怎么回事，当他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又立即打听若望的安全。人们告知他：汤师傅安然无恙，而且这巨响又说明了大炮的效应，这时皇上不由得惊去喜来，感到江山社稷的安稳这回又多了一分保障。

这时候又有人向皇上禀报说：“汤神父在每门大炮前都摆设了一个小小的祭坛，每位炮造成之前，他都披戴上祭服、祭巾跪在那里读经祈祷。”学艺的太监们对这一切既感到好奇，又疑惑不解，有人甚至持有反感，所以很快就告到皇帝面前。不料，皇帝却宽厚地下达御旨：任何人不要阻挠，要尊重汤神父的作法。就这样，在大炮试验场先后设过20个小祭坛，因为在这里第一回合铸成20门40磅重的大炮。

汤若望铸造大炮的过程中，时时招来周围的好奇感，不但跟随干活的人脑中不断划着问号，解着问号，皇帝也时常带着疑虑寻问，他的炮是什么式样，多么大小，射程多远？正因为这样，若望曾特地为皇上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木制模型。由此一端，亦可见汤若望的多才多艺，制木模这样的精巧活计，并非一般学者官员所擅长，而他却不然，既是文人加设计师，又是金工、木工加铸工，样样本领都在行。

据说，崇祯帝看到这个小巧玲珑的小木模，非常高兴。还有的史书记载，崇祯曾亲临工地视察，他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欣赏，加以称赞表彰。另一说，是他曾在随从的簇拥下，出城观望放炮。鉴于历史记载出人，我们且用不着去追究崇祯是否亲临燃放现场，无论如何，大炮运到北京城郊试放是确有其事的。观望者中，有亲自参加造炮的，也有特地前往检验质量的朝臣。20尊大炮一一作了试放，个个成功。在场人欢呼雀跃，特别是那些亲自参加了工作的太监们，他们从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看见了自己的工作成果，当然由

衷喜悦。可惜这三十多个人中,后来大约有 25 个人染上天花,大多被夺去了性命。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下层太监的命运很多是十分悲惨的。自从接受“腐刑”进入宫廷之后,就完全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及生产实践活动,专事侍候帝王后妃,现在竟偶然地奉派去学点工匠技术活计,也是难得的机会与乐趣。在短短一两年中,由于个人的勤奋努力和若望的悉心指教,这些“太监徒弟”们总算有所长进,成为难得的宫廷技术力量,他们一并在瘟疫中亡命,确是令人遗憾的。

造炮过程中,成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误解、嫉妒以及恶语中伤也始终伴随着汤若望。有人竟写过材料上告,说是财务帐目不清,言下之意,是说汤若望有侵吞、私用公家款项之嫌。这一条罪状未能成立,因为汤若望在这个问题上似有先见之明;他有意避开了钱财管理事宜,一开始就请求工部直接料理出入帐目。所以这样的状子显然属于不实之词,无法成立。

就是在大炮试放之前,也有人报告假情况,说是炮身有可能爆炸,从而散布一种恐怖情绪,使亲临现场观望者情绪颇为紧张,担心开不了眼界反而丧命。而抵达现场的还有保守派朝臣私下指派的暗探,他们是十足的幸灾乐祸者,只待出现不测,即可乘机作文章,造舆论。令他们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而且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试放完全成功了。崇祯帝对此甚为满意,他“派大臣验收,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sup>①</sup>新的要求是轻型,一方面便于军队行动时携带,另一方面,鉴于炮的造价昂贵,不宜再制更多大型的,只要有足够的威力,在战场上可以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就可以了。遵照这一旨意,若望与中国工匠们一道,又制造了五百门小炮。

然而,这些坚兵利器并没能挽救明朝的覆灭。在农民起义的炮

---

<sup>①</sup>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77 页。

火之中,在清兵攻入关内之后,延续了 270 年的明王朝寿终正寝了。可怜崇祯皇帝,独自逃出皇宫后门,进入煤山苑内,在山的东坡上自缢而亡。汤若望对这位皇帝的死感到十分遗憾,他对崇祯的评价是:“天分甚好,命运不佳。”<sup>①</sup> 史家论及明亡时曾哀叹道:“外缘于清兴,内困于流寇,臣逞于私图,民病于征敛,而明卒以亡矣!”<sup>②</sup> 特别是朝政的腐败,国力的空虚,这是任何新式武器所难弥补的。那么,这时期大炮的输入与制造是否就毫无意义了呢,恐不应如此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从一时一事、一朝一代的狭隘角度去理解,而宜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角度加以分析。科学的发展本来就不该受到国度的约束,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说中国文明,特别是举世著称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的发展曾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恰值中国火器发展相对落后之际,中国能有机会分享一点儿欧洲科技的新成果,这也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互通有无,共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具体到火器的发展也是这样,因为它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为打仗之用。恩格斯早就指出:“火药和火器的采用……表现了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sup>③</sup> 因为它反映了多门自然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的水平,如数学、化学、冶金、物理、测绘等。所以说,随着西洋火炮的输入,这方面的有关知识传入中国是有益的,汤若望在这方而工作的积极意义也是应予肯定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朝统治者也曾调用仿造的西洋大炮对付农民起义军,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所以造炮一事,在这种时刻实际上从两方而帮了明廷的忙;不但帮助他们抵御从北方来

---

① 杜纳《伟大的楷模》,第 250 页(George H. Dunne: Das Grosse Exempel)。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 270 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178 页,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犯的清兵，也帮助他们镇压揭竿而起的百姓。那么农民起义军对朝廷新造火器又作何反应呢？

以李自成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非墨守成规之辈。他们并不反对“用夷技”。他们的“情报信息”是很灵通的，早已得知朝廷储备并新造西洋火炮。首领们经过商议，积极主张“以牙还牙”。不仅造自己的炮，而且组编一支精兵，专门训练操弄火器，以对付朝廷的炮兵队“神机营”。由于条件所限，他们仅铸造了一些轻型的炮。至于重炮，则准备去夺取官兵的。例如在项城战役中就曾缴获西洋大炮两尊。<sup>①</sup>以后这些作为战利品的大炮又在进攻官军时发挥了威力。这一点恐怕是造炮者难以想到的，可叹朝廷是造炮自毙了。结局是：明统治者早就想依赖大炮的神威，汤若望也帮了他们的忙，但这都无法挽救气息奄奄的明王朝，这一切进一步说明，新式武器并没有成为决定性因素。

火炮重新输入和制造的另一直接后果是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沈淮教案发生之后，西洋教士在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立足点，但是明天启年间大炮输入之后，这种状况得到改善，传教士们重新稳住了脚跟。汤若望造炮获得成功之后，则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正是传教士们孜孜以求的，也使汤若望本人如愿以偿。因为，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为他们提供的只有这样两个机会：一是历法失修，经常发生错误；第二就是边疆形势不稳，北方少数民族常来进犯，这样，修改历法和制造火炮就成了传教士们得以施展其所长的良机。只有在这种机会中得到好评，取得进展，才能为他们继续传教、扩大传教范围与影响创造条件。正如汤若望自己所言：在朝廷供职对于传播福音是大有有益的，虽然在世俗事件上丧

<sup>①</sup> 参见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上册，第547等页。

失了大量时间,但对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传教事宜更为有利,使其更有了新的起色。

在制造火器方面,汤氏不但参加了实际工作,而且进行了理论上的著述,这就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完成的《火攻击要》一书,此书又名《则克录》,取“则克”两字是有攻则必克之意,极言火攻的威力。这书是由汤若望口述、焦勛(xù)整理的。它是我国明代末年有关火攻知识的一部比较全面、比较权威的著作。先被收入《海山仙丛书》。至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和二十七年(1847年)均刻有单行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个小册子又被收入《丛书集成》。

这本书在“概论火攻总原”中,回顾了运用火攻的历史,指出它的使用始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兵家,也是世界军事学的鼻祖孙子,是他改革用兵之道的结果:“孙子更变,而用火攻,焚人马、焚粮草、焚辎重、焚府库、焚营寨,谓之五火,更胜于兵器之利多矣。”这里突出了火器的威力,接着也谈起当时我国使用火器的现状和所具有的优势:“我国朝更制有神威发愤,灭虏狼机,三眼快枪器。置之军中,更觉随地可施。以此荡平寇虏,廓清宇内,战阵攻取,所至必克。”文中还简述了西洋火炮的优点,感叹那时我国在制造火器方面的相对落后,主张革故鼎新,着眼未来:“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更胜诸器百千万倍。若可恃为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矣。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然则谈火攻者,岂宜拘执往见。概恃为胜着哉。深心兹道者,必更翻然易虑,详察利弊,灼知近来所以不胜之故,默计将来所以致胜之方……”,<sup>①</sup> 这些看法体现出著书者的远略。

本书版本上的差别有两卷本及三卷本之别,而两卷本的后面

---

<sup>①</sup> 汤若望授、焦勛述《火攻击要》,卷上第1页。



附有《火攻秘要》一卷。其余两卷内容分别为：一，讲述制造火器的方法。第二，论述制造火药和试放的方法。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书呢？作者在“序言”中这样概况总结了以往有关兵器的各种书籍的情况：

“诸书所载火攻，颇称详备；然或有南北异宜，水陆殊用；或利昔而不利于今者；或更有摭拾太滥无济实用者；似非今日救急之善本也。至若火攻专书，称神威秘旨，大德新书，安攘秘着，其中法制虽备，然多纷杂滥溢，无论是非可否一概刊录，种类虽多，而实效则少也。如《火龙经》、《制胜录》、《无敌真诠》诸书，索奇觅异，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资实用……”

这里点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以往各类书籍缺少实用价值。而两作者在著这本书时，综合了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以及著者本身的苦心之偶得，而且是着重在实用方面下了苦功夫。这种联系实际、以指导实践为宗旨的著书立意，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在这种立意主导下，本书对炮的冶铸、制造、试放、安装、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的配制方法、性能、贮藏等等，都详加阐述。此外还介绍了攻城、水战中火器的作用等。作者共绘制说明图四十余幅，以图文互补，使阅者可以一目了然，这也可算它的一大特色了。

这里还应着重探讨的是，这本《火攻秘要》中不乏朴素的辩证论述。例如它在“审量敌情斟酌制器”一段中谈到：“人知攻敌全恃火器，未知制器先欲量敌，故制器得法可以胜敌，则一器可以收数器之功。若制器无法，不能胜敌，则百器不获一器之用。”这说明了有的放矢地制造武器的道理。根据对手的实际情况，制造和选用适当强度的火器，就能“以大胜小，以长胜短，以多胜寡，以精胜粗，以善用胜不善用，则胜斯可百矣。”这里阐明了在用器上百战不殆的关键。

在论及武器与人在战争中的关系时，其论证也是相当精彩的，

如“宝剑必传烈士，奇方心须良医。则庶几运用有法，斯可得器之济，得方之效矣。”接着它列举了当时的实战之例：“昨救松锦之师，西铕不下数十门，亦尽为敌有矣。深可叹者，同一铕法，彼何历建奇勋，此何屡见败绩，是岂铕法之不善乎，抑以用法之不善耳。总之，根本至要，盖在智谋良将，平日博选将士，久练精艺胆壮心齐，审机应变，如法施用，则自能战胜守固而攻克矣。否则，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人，是犹以太阿利器而付婴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资敌而自取死耳。”这里，两作者似有先见之明，他们充分理解并阐明了“战争的決定因素是人”这一道理。汤若望虽帮助造了炮，但明朝的残兵败将们，正是以大炮“资敌而自取死”了。

### 第三章 传播西学

中国重视而且需要科学，“传教士们从一开始便从这种现状中受益。他们把自己在各学科中掌握的知识作为钥匙，借以打开这个大帝国紧锁的大门和通往宫廷的艰巨途径。”<sup>①</sup>而传教士们的这种意图，却客观地在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发生了推动作用。

清初，西学的传入及其在中国学术界所初见的成效“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sup>②</sup>。梁启超先生的这一结论是颇有见地的。而在欧洲天学历算的输入过程中，既留下了为传播学术奉献力量的欧洲人的辛劳，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勇于探索、勇于纳新者的足迹。利玛窦在这方面作出了为之公认的成绩。“利玛窦卒后，名业与玛窦相并，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者，若望也。”<sup>③</sup>陈垣先生在这里将利玛窦与汤若望相提并论，是很有道理的，其意恐怕不只限于传教方面，而是综论其各方面的业绩与声名，因为当时，在他们这样的人身上，二者是难以划分开来的。

利子与若望又各有特色，前者是来华西士的先驱，他的所作所为具有开拓性；后者不愧是一位成效卓著的后继之人。利子在华时间约10年，若望则超过了40年，时间当然也是他成就其业绩的一个前提。在著述方面，若望是成果硕硕的。限于各种因素，

---

① Anton Huonder, *Der chinesische Ritenstreit*, Aachen 1921, 第27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43年版第16页。

③ 陈垣《主制群微》第三版跋。

玛竇与明朝宫廷的接触是有限的，而若望却不无艰难地荣任了清代一品大官，同时开创了西洋人执掌钦天监的先例。可以说，汤若望这个继业者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具体到汤若望的“名业”，可以列为他的业绩与声名之下的，自然也主要是传播宗教与天学两件事。他在中国立业，是以历算作为传教的先导，为传播其信仰开道。再纵观他立业的过程，在历算上花出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出了传教。列数当时在中国传播西方天学的人物，汤若望在其中曾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与他先后从事同类工作的西洋教士，除利玛竇之外，还有数名，但正如《清代通史》中所介绍：“时在京教士，除（庞）迪我等外，尚有龙华民、邓玉函等，然皆非天文学家，故不能有所成就。俟德人汤若望至，而其业始大昌也。”<sup>①</sup>

汤若望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首先可以从他的著述方面反映出来。汤氏有关天历方面的著作，迄今传世者为数不少，原版甚至也有收藏，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崇祯历书》及《西洋新法历书》，汤若望即是作者之一。笔者在搜集材料时，曾有机会查阅此书并请教于故宫老专家朱家潜先生。

据明史记载，“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所未发。”<sup>②</sup>

明代，我国历法年久失修，故经常出现舛谬，修历已迫在眉睫地摆上日程。1629年（明崇祯二年），礼部准奏，开设历局，这个局日后成为一个采用西洋新法推算，在修历治历上很有成绩的机构。其地点就设在宣武门内“首善书院”。主持编纂的，正是上

---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678页。

② 《明史》，卷31，志7，历1，中华书局1974年版。

面提到的徐光启，其官位后升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并主持此项工作的还有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光禄寺卿李天经。参与工作的外国人有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和汤若望。此外还有一大批辅助人员。他们共同辛勤工作了十多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根据书目统计，其总数在一百三十七卷。但由于这书是逐步译、逐步编纂完成的，随脱稿，随进呈皇上御览，有的也随即刻印，所以对其版本、印数如今已难作出准确的统计。还有一百二十卷本，一百二十六卷本等等，但据朱家溍教授介绍，留传到今天的，并没有一部是完整的：“传世未见全书，故宫所藏亦一残帙。”<sup>①</sup>

汤若望在这项工程浩大的著作中，到底起过什么作用呢？对此，史亦早有评述：

“西人汤若望，与徐光启共译新法者也，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疏，畴人子弟翕然信之……”<sup>②</sup>

上述结论是一个总结概括。具体而言，汤若望在这部历书中，亲自撰写、翻译了哪些章节段落呢？在徐光启先后五次向朝廷进呈的历书中，由汤氏完成的篇目如下：

1. 《交食历指》四卷。
2. 《交食历表》二卷，以上两书可见崇祯五年四月，第三次进呈书目。
3. 《交食历指》三卷。
4. 《交食诸表用法》二卷。
5. 《交食蒙求》一卷。
6. 《古今交食考》一卷。

---

①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7期。

② 《清史稿》志7，历1。

7. 《恒星出没表》二卷。

8. 《交食表》四卷。

以上书中，以《交食表》四卷为例，其首卷扉页上书写着：“钦差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钦命山东布政使司右恭政李天经督修。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同会龙华民、罗雅谷同订。”其他各卷有关编纂者所作的交代也大体如此。这部《交食表》四卷包括的内容还有：“南北高孤表说”、“太阳距赤道表”、“黄道九十度表”、“加减度表”、“月食时分表”等。以上这些书都是崇祯七年（1634年）第四次和第五次进呈的。

以上罗列的汤若望著作，多属译著，然而即使是译著，也是中西士们配合默契、靠共同智慧完成的。徐光启、李天经等人，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一道，多年日以继夜的工作，反复切磋琢磨。正如徐光启所记述：“臣等藉诸臣之理与数，诸臣又藉臣等之言与笔，功力相倚，不可相无。”<sup>①</sup>这两句话，真实地描述了他们密切合作的情况：他们之间是相互配合，各尽所长，取长补短，缺一不可。因而可以得知，完成上述著作时，无论是汤若望作为撰稿人，或徐光启作为编纂者，都不可能独自闭门造车，而是要随时相互探讨。故可以说，每一卷书，都是以某人为主而完成的集体创作。所以这卷帙浩繁的历书，应该视为中西学者的共同成果。

除上述书籍之外，经汤若望译编著的有关书籍还有：《测天约说》二卷、《测日略》二卷、《学历小辨》一卷、《浑天仪说》五卷、《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黄赤正球》一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四卷、《五纬历指》九卷、《五纬表说》一卷、《五纬表》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表》二卷、《恒星经纬图说》一卷、《交食》九卷、《八线表》二卷、《新法历引》

---

<sup>①</sup> 《增定徐文定公集》第四卷，第90页。

一卷、《历法西传》二卷、《新法表异》二卷。此外还有《西洋测日历》、《新历晓惑》各一卷，以及《赤道南北两动星图》、《恒星屏障》等书与图。汤若望还分别为罗雅谷等人撰写的天学方面的著作做过校订，如《比例规解》、《测量全义》、《筹算》等书。<sup>①</sup>

以下再简略介绍一下汤若望的另外几部专著：《民历铺注解惑》一卷；其内容是针对《民历铺注》一书，对疑难费解之处加以解释。他列举这本书中提供的不够正确或涉及迷信的例证，加以剖析或纠正。汤书前面附有两位监官所作的序。

中国古代，民历对老百姓说来是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迷信”在人们头脑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百姓生活诸事，几乎都要求助于《历书》，如婚、丧、嫁娶、访亲、购物、裁剪、洒扫、沐浴剃头、挖井造屋等，甚至连行房事，都要挑选适宜的、吉利的日子，否则担心对后代不利。迷信者害了眼疾，会归咎于动土（扫除）择日有误。小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会归为安放床铺的日子错误。这种情景，我们如今想象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人们整天被种种莫名其妙的清规束缚着，举措担心失当。百姓笃信吉人天相，吉日天相，乃至许多日子都等闲而过，不敢有任何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出一部解惑的小书，解析某些疑问，纠正某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妄说，是很有必要的。

汤若望在这本小书中提出了如下建议：

“小民日用，除稼穡外，还有冠婚葬祭，栋宇各等许多事件，朝廷家也曾预先酌定一个礼节，安排一个规矩，与同律度量衡一般，以便遵守了。还有各处民情，大小事要选择日时，为是前代相传已久，习以为常。从来治国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

---

<sup>①</sup> 有关汤若望的著作，可参见阮元《畴人传》第45卷。《中德学志》北京1944年版第302页。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书。以上各书所列，颇有出入，宜互参照补充。

易其宜，这岂可违拗他。只因衍数繁多，一持一说，纷争不了。又误民事，不如画一定规，从中去取，勒成一书也。算作授时一类，付与历官铺注，在民历上颁行，令各处都依着铺注上行，方是个一道同风的气象。”

从这本书的立意上看，汤氏是注重务实的。他懂得尊重风俗，重视民情，并着眼于实际应用，不作空泛之论。既介绍科学，又不机械地违拗民俗，这固然好；但另一方面，汤氏本人既具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又有强烈的宗教意识。他本身就处在科学与迷信的矛盾之中，当然不可能彻底去剔除封建迷信的东西，这种局限性是汤若望不可能克服的。

汤氏的务实思想，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明显得到反映，如《远镜说》、《火攻挈要》等书。关于《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一书的梗概本书上章已述，此处仅简介一下《远镜说》。

望远镜在中国明代人的眼中，还是十分蹊跷的东西。人们既感到新鲜，又不得其解，形象地称之为“千里镜”。描述它“能烛见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用来观看星星月亮，都大得令人吃惊。“能照数百步蝇头字；朗朗可诵。”<sup>①</sup>从这种描述可知，望远镜实在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罗雅谷在《五纬历指》一书中，曾提了这样一笔：“近年西士有度数名家造有窥筒远镜，能视远如近，视小如大，其理甚微，其用甚大。”但具体到“理”和“用”到底如何，他并没说明。葡萄牙人阳玛诺（Emanuel Diaz, 1574—1659年）曾在他的著述《天问略》中谈到这样的观测器械，他说：“近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造创一巧器，持此器观六十里一尺之物，明视之，无异在目前也。持之观月，则千倍大于常，观金星大似月……”但更具体的东西，他没有透露，涉及构造、道理等，他

---

<sup>①</sup> 郑仲（明）《耳新》，卷7等。



还留下了一个大伏笔说：“待此器到中国之日，后译言其妙用也。”由上所述，这个细言妙用的任务，便历史地留给了汤若望。

汤若望适时地撰写《远镜说》一书，对以上疑点与伏笔作出了较详细的解析。他的这本书是在1629年竣稿的，书上题有“天启六年岁次丙寅仲秋月大西洋汤若望题”。而此书是1630年才在北京刻印的。此间汤氏曾前往西安传教，这本书估计是在他返归京城后，才刻版交付印刷的。

小册子很简短，但却图文并茂。它分述了望远镜的构造及其原理，指出：“人身五司，耳目为贵”，“物体有大小方圆，邪正动静，数有多寡，住有远近，畴非于目辨者乎……”既然耳目这样重要，那么便顺理成章地设法寻找“佐目佐耳之法”了。“佐目者利物出于人力，其巧妙诚有可得而言者。”“无可得而言者言之则诞，有可得而言者秘之则欺。”这说明作者著书的意图，是愿把其所得公诸于世，从而剥开望远镜的神秘色彩。这本书以绘图为辅助，除讲原理和构造外，还介绍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如文中写道：“夫远镜者，二镜合之以成器也，其利用既如斯矣；乃分之而制造如法，则又利于用焉，即中国所谓眼镜也……”

汤若望曾为中国朝廷制作了多台望远镜。但第一座带入中国的天文望远镜到底是由谁，在什么时候带来的呢？一种说法认为是利玛窦来华时携入的，他死后由他的徒弟传世。

但是，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是伽利略1609年才在意大利制造成功的<sup>①</sup>。而利玛窦早在1582年就来到了中国，未曾返回欧洲。1610年他逝世于北京。所以上述说法是不合乎逻辑的。那么人们为什么把这一功绩归之于利子呢？对此，方豪曾作如下解释：“尔时国人极崇拜利玛窦，固凡闻一异说，见一奇器，必以为玛窦所创

---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第427页。

……”这种推测是很有道理的，方豪继而认为：“第一座望远镜果于何时入中国耶？思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八月前，盖汤若望远镜说自序在此年。第一架望远镜殆即彼所携入。次年，王徵著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参考书中已列此书。足见其书一出，即为国人乐诵。”<sup>①</sup>

《远镜说》一书绘刊的望远镜外形图，与伽利略制造的第一个窥筒很相似。而此后不久，在北京和福建等地都制出了望远镜，如果没有实物参考，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创试成功。因而可以认为，望远镜系由汤若望首次携入中国这个结论，是不无道理的。

望远镜制作成功之后，对于科学地观测日月行星，证实并增长人们的天文知识，都成为一个很大的推动：“自造镜以来，诸天殊异更著。如太阳其形不圆，其面显泡，内边高低不等。太白时盈时缺，距日近即圆，远即缺。岁星周边见四小星或先行或随行。日轮上见血点，时密时疏，时进去而复出来。恒星见所未见者益多。若天汉雾气，从前不解者，今乃知由无数小星密聚而成此象。”

以上谈及的是汤若望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或著作。其总数大约有30种，合计70卷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在生产或生活实践中很有实际指导意义的。

据以往学者统计，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在16—17世纪期间，著书总数约在402种，其主要内容及所占比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属于宗教教义和耶稣会活动方面的，共301种，占著述总数的75%；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类，共39种，约占10%；

第三，自然科学类，共62种，占15%。

---

<sup>①</sup> 方豪《顺治刻本西洋新法历书四种题记》，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8号。

以汤若望从事著作的情况，与上述统计作一比较，就可看出，汤若望著述的总情况与上述统计大相径庭。

汤氏关于社会科学、关于宗教方面的书只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真福训论》和《崇一堂日记随笔》（合作）等几种。综上可知，汤若望的著述：“言历算天文者众”，“故若望谈道之名，反为其历学天文所掩。”<sup>①</sup> 这一点，在汤若望本人及其同会会友及许多教友看来，很可能是桩遗憾事。但客观地讲，在中国，天主教友毕竟是相当少数。汤若望不远万里从欧洲来到中国，能以其才能，以其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多从事天文学研究，多撰写天文历算方面的著作，从而有助于中国天学事业的发展，使更广大的中国人受益，其意义不是更大，其价值不是更高吗？所以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这使汤若望的影响面，或至少说是他的读者，远远超出了教会、教友的较狭小范围，使汤氏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作用大大超出了一名普通传教士。

还需提及的一点是：汤若望就是在他有限的神学著作中，也常常谈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传播了一些当时对中国人说来很新鲜的知识。如《主制群徵》就是一例。这是一本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天主确实存在的教理书。它既是汤氏有关宗教理论的一部力著，又阐述了自然界的许多重要现象与原理。《主制群徵》一书原来的题目叫《论神的智慧》和《论灵魂不灭》。全书分为“卷之上”和“卷之下”两部分。第二部分由卫匡国译著。该书于1629年在山西省绛州刻印，因当时汤若望恰好赴陕西传教。

这本书在叙述自然界的规律时说：“寰宇中物，无一无为者，亦无一乱为者。虽体势性情，种种殊异，或相克相伐，然即此相异相克，而公美正赖以成，匪直无损于大全而已！”全书列举了天

<sup>①</sup> 参看《主制群徵》序，第2页。

文、地理、生物中的二十多种事物作为证据，以证实天主确实存在。他认为：“凡物依其本性，避害保己，多趋所向。”他通过对天、气、地、海、人等多方面自然现象的概括描述与分析，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观点——宇宙间的一切，都出于造物主超凡之力的安排。他的论述是富于哲理性的。然而他的结论是唯心的。例如在讲述了人体的骨、肉、血、气以及心等内脏器官之后，所下的结论是：

“是知造化人身、安排人身，如是恰当者，必智能超人倍万不啻者也。从此推知，造化天地万物而安排之，其智能准此矣。”<sup>①</sup>

《主制群微》还提出了“以物公向微”和“以物私向微”两个方面，他说：“公向者，万物一向，私向者，一物一向。”按照他的解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事物的共性与个性。而汤氏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性，都是由造物主加以主宰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医学角度讲，他在《主制群微》中介绍的人体解剖学上的知识，如“血液的生成和功用”等，都和我国古代医学理论迥然不同，这曾引起我国学者的很大注意，如启蒙思想代表人物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就曾根据《主制群微》所论指出：“这种‘以肝、心、脑、筋立论，是灵素（指中国医籍《内经》）所未发’，认识到西洋医学从医学体系上说，同传统中国医学是有重大区别的。”<sup>②</sup>

汤若望在此书的“人身向微”一节中写道：“今论血所成，必赖食化，食先历尺刀，次历胃釜，而粗细悉归大络矣。第细者可以升至肝脏成血，粗者为滓。于此之际，存细分粗者脾，包收诸物害身之苦者胆。吸脏未化者肾……”他还写道：“血行以脉，脉

<sup>①</sup> 汤若望《主制群微》，卷之上，第7页。

<sup>②</sup> 赵璞珊《西医东渐小记》，载《百科知识》1982年第3期。

有所总曰络。络从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渐分小脉，至最细微，凡内而脏腑，外而肌肉，无不贯串，莫定其数……”<sup>①</sup>。“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直令周身脉与之应，少间不应，辄生寒热诸症……”。他认为，人体内脏、骨骼、肌肉等，各主其事，各尽其用，从而“共扶人身资养动觉，以令五司咸正无缺，不旷厥官，岂不奇哉！”这些论述，和我国医学一向推崇的《黄帝内经》理论显然分属于不同的源流，这不能不受到当时我国一部分通晓医学的知识分子的注意。<sup>②</sup>

汤若望的这部著作也像他从事的一些其他工作一样，发生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他的本意原在论证“天主对于万物的主宰，即“主制”，但从实际效果看，他却在西医东渐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有关西方医学的最早的信息之一。从以上可知，这虽然是一本宣传教理的书，可当时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有启迪的。由于方以智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所以曾把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的《物理小识》一书。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汤若望从崇祯年间起，就开始向朝廷进呈他与同事在中国制造的或从欧洲带来的仪器。据历史记载，1634年（崇祯七年）2月2日，“汤若望和罗雅谷向中国朝廷进呈由欧洲带来之望远镜一架，以黄绸封裹，连带镀金镜架与铜制之附件。这一年8月，教士们贡呈了特别精制的天体仪、半面球形图及水平日晷”。汤、罗二人还“为中国朝廷制造了许多其他仪器，譬如象牙制小日晷、望远镜、圆规、小号天体仪、星高机等物。汤若望也曾画了两张地球半圆形图。”<sup>③</sup>

这些举动也使崇祯皇帝对西方传教士逐渐产生了良好的印

① 汤若望《主制群微》卷之上第6页。

② 参阅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③ 魏特《汤若望传》，第一册第154—155页。

象：“其时，日晷、星晷、窥筒（即望远镜）诸仪器俱已制成，奏闻，上命太监卢维宁、魏国徵至局验试用法，旋令若望将仪器亲赍进呈。督工筑台，陈设宫廷。上亦步临观看。毕，就内廷赐若望宴。自后上频临观验，分秒无错，颇为嘉奖。”<sup>①</sup>

鉴于这种情况，推行新历的条件显然已逐步成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有，人们看到利用西法能准确地预测交食，而利用大统历和回回历所测定的，都有差谬，这便产生了很大的说服力。但明朝的宦官和监官中，也有一股相当强大的反对派势力，随时影响着皇帝的决策：

“是时新法书器俱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奎等多方阻挠，内宦又左右之，帝意遂不决……”尽管如此，朝廷对于汤若望本人所作出的成绩还是十分赏识并予以表彰的：“崇祯十一年（1639年）礼部题叙：汤若望创法讲解，著有功效，并道气冲然，颇资矜式，理应褒异。上谕传旨嘉奖。并御题匾额曰：钦褒天学。敕赐若望敬挂堂中。”<sup>②</sup>那时，为领受皇帝所赐的匾额，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许多钦天监监员、传教士及中国官员出席，共致祝贺。不久后，礼部也向汤若望和罗雅谷送了一块匾牌，上而题“功堪羲和”<sup>③</sup>四个大字。

截至明代末年，汤若望的工作已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他本人并未真正受到重用。明末政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已议定的事难以付诸实行。历局屡次进呈的历书总数虽然已超过一百卷，但一直没有用来综合编历。汤若望仍孜孜不倦，想全力推进这一工

① 《正教奉褒》，第17张。

② 《正教奉褒》，第17张。

③ 羲和：中国古代传说中掌管历法的官员。另据《尚书·尧典》中记载：尧曾派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驻东、南、西、北四地，观测星象，判定季节，制作历法。故这里“羲和”可理解为泛指中国古代治历有成效的人。

作。崇祯十四年末，他完成了《崇祯十五年》新历，并将其进呈皇上，皇上这时对西洋新法的相对严密与准确已有进一步了解。他曾嘱李天经等钦天监或历局的人“虚心详究，务祈画一”。李天经在反复实践之后，也向崇祯报告了大统、回回两历的失误之处。优柔寡断的明思宗朱由检，经反复犹豫之后，终于作出了决定，并于十六年（1642年）八月下了诏书：“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令人遗憾的是“未几国变竟未施行”<sup>①</sup>。

1644年5月，清兵入关。此前，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震撼了全国，动摇了明朝统治的基础。所谓“国变”，自然是指接踵而来的明廷覆亡与思宗自缢了。那时，大顺农民军已兵临城下，其势如破竹，不可抵挡。3月19日，起义军即将破城，崇祯皇上在乾清宫鸣钟召集百官，竟没有一个人前来。崇祯万般无奈，心知大势已去，决心以死殉国。他先赐皇后自尽。又要亲手剑劈女儿长平公主，公主惊慌奔逃，身受剑伤。他勉强召唤到几个家丁，命护卫太子出逃。本人则穿过御花园，爬上煤山，到山坡上的寿皇亭自缢<sup>②</sup>。临终，他撕下衣襟，写了遗诏：“……朕死，无面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我百姓一人。”一些忠臣，闻知皇上惨死，感叹“君殉社稷，臣子怎且偷生”，于是相随殉国，一时间氛围十分悲壮。

在这种非常形势下，与明廷关系密切的外国人多不敢滞留京城，有的西方教士前往南方或西南一带暂避，有的分别追随福王、唐王、永明王出逃。至清兵入关前后，京城愈加显得恐怖而紧张。店铺、住宅门户紧闭。人心惶惶，不知还会有什么劫难降临。面对这样的局面，还有多少人能专注于学问呢？但汤若望却处变不

<sup>①</sup> 《明史》，第31卷，志7，历1。

<sup>②</sup> 一说他是吊死在煤山东坡的一株槐树上。

惊。他的头脑是十分清晰的。他洞察着中国社会发生的急骤变化，预感到一个新旧交替时刻的到来，并不觉得是什么大难将临。那之前他曾对同事讲过这样的话：“有时我们的数学家吓唬我说：‘皇上的恩典并不是永世长存的。’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们也许比他更好。”<sup>①</sup>这段对话可以表明，汤若望已预见到历史骤变形势的不可逆转。他把自己的着眼点坚定地放在自己的事业上，几乎不受外界局势变化的左右。

虽然是兵慌马乱之中，汤若望仍安然地守护在自己的教堂里。他不愿堂中的设施，特别是圣坛圣像受到损坏，也不愿丢下存放在这里的珍贵天文仪器及历书的刻版，这些书版中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啊！这是他与多位中国和西洋同行辛勤劳动的结晶，如果一旦散失或毁坏，在天历的研究上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所幸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并没有损坏教堂的设施。汤若望后来上的奏疏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写道：“臣住居宣武门内。城下城中房屋，半为贼火焚毁。仅存天主、圣母二堂，并小屋数椽……堂中所供圣像、龕座重大，而西方带来经书不下三千余部……翻译已刻历书板数架充栋……”<sup>②</sup>这说明，大顺军虽然烧毁过城中的部分房屋，但两教堂却依然存在。特别是那里供奉的圣像和保存的书版，均秋毫无犯。从这段叙述也可以知道，汤神父当时守护在他的教堂里，并没有外寻安全栖身之所。

对于满清定鼎中原后的政局，汤若望是如何反应的呢？他采取的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而且在与清人打交道的第一个回合，他表现出理智、胆略与责任感。清廷对汤若望产生的信任以及汤氏愿为清朝效力的决心，也都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

① 转引自刘登庸《中国教案史》第53页。

② 《汤若望奏疏》“恳乞格外施恩疏”。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是宗德八年八月暴病死在沈阳清宁宫的。皇子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年）承继皇位，他就是清世祖，也是第一个踏上中国皇帝宝座的满族人。福临是皇九子。他的生母姓博尔济吉特，是科尔沁贝勒的女儿。选入皇宫后，在崇德元年被封为永福宫庄妃。后晋为孝庄文皇后。据说她生福临时临盆状况极不寻常，大有吉兆：

“皇后方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者皆惊，以为火。近视之不见。如是者屡，众皆大异。诞之前夕，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孝庄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见，既寤。”<sup>①</sup>

她醒来之后，把这梦说给太宗听，太宗以为是吉兆。第二天，皇九子出世了，因而取名福临。据说这个新生儿头顶上有一缕头发“耸然高起，与别发迥异。是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sup>②</sup>福临有幸成为满人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统治者，所以历史作这样的杜撰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清军入关时，福临，即顺治皇帝尚且年幼，尚无能力治理朝政，暂由睿亲王多尔袞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清朝朝廷中第一位接受汤若望奏折的正是多尔袞。这位亲王当时是朝中握有实权的一位开明人士，他“虽久在疆场，习惯于戎马生活，但注意汉满文化间的彼此调融”，他“曾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对待汉族的文化尊崇仰慕，主动学习汉语，对汉官一经取得信任，就予以重用。”<sup>③</sup>清初汤若望的任用与他的上述政见不无关系。皇帝也正因为尚在求学时期，所以后来才与汤若望有了师生之缘分。

---

① 《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

② 《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27—28张。

③ 参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论文集》郑克晟《多尔袞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天津1982年版。

汤若望的第一份奏章是在多尔袞率兵入京城后上递的，因摄政王此时操揽一切大权。

当时满洲、蒙古各路旗兵同时进入北京。城内的住房成了大问题，睿亲王多尔袞下了一道命令，要城中的非满洲人在限期三天内通通搬到外城去，以腾出房屋。汤若望得知这个消息后，果断决定立即与满清人直接商榷，务使教堂和存放物得以保存。为此，他在顺治元年五月上了这样一道奏折：

“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臣自构天主堂一所。朝夕虔修。祈求普佑。作宾于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板。尚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积垒垒。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夥。若欲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其测量仪器。由西洋带来者居多。倘一损伤。修整既非容易。购办又非可随时寄来。特为沥情具折。恳请皇上恩赐。臣与同伴诸远臣龙华民等。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若望送上这份奏折时，亲王接见了。要他暂且回家，次日再来候旨。

第二天清早，汤若望一到衙门，便领到皇上下达的谕旨一道，他高兴地携回寓所去了。

当他走进南堂时，只见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几位与他很熟悉的教友，正在千方百计说服前来寻找住房的满洲旗兵，劝他们另觅住宿之处。见这情景，汤若望拿出了刚刚得到的谕旨，打开来让众人诵读。士兵们上前一看，上面写道：

“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闯入滋扰……”

于是，吵吵闹闹的人群立即静了下来，士兵们有秩序地退出大门。就这样，汤若望不但没有搬到外城，不但保护了刻版，而且等于向新朝统治者作了自我介绍，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初步印象。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对他发生了兴趣。这是因为汤若望的自荐太合时宜了。

满人初入关来，百业待兴，正欲招贤纳士。摄政王多尔衮属于比较开明的人物，在用人方面主张“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对明朝降兵降将，他敢于大胆录用。可是明代一些知名的官吏文人，先后殉节了。另一些人也不愿落个不忠不孝的罪名。所以，这些人要转而为新朝效力，还需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清朝统治者要争取他们，也必须先下一番功夫。例如洪承畴的降清就是很费了一些周折的。他在被满人俘去之后，决心以死殉国，绝食多日，粒米不纳，传说这时由精干、聪慧的孝庄皇后亲自出面，设计劝降，他才慢慢回心转意……

而像汤若望这样一个人物，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统治者，都会把他看作中国政治的局外之人。对中国的改朝换代如何反应，这完全可以由他自己斟酌而行，不必受中国伦理、中国君臣关系的束缚。试想，如果一个明朝臣子，自己上疏新朝，就会被视为屈节投降。而汤若望本人并不以事异主为耻，表示愿至恭至顺地为新朝效力，满人自然喜为引纳。故实际上，汤若望也成为自动报到的“贰臣”，他自己也大大方方说明自己“曾奉前朝”。这正说明，他与新朝的关系是两厢情愿的。更何况，汤若望从事的行当，又刚好合乎清朝的需要。

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现在是“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需要汤若望这样的人才，因而对他所上的奏折十分重视。他提出要保护的刻版与仪器，也是继续此业所不可缺少的。在这个问题上，刚入关的满人谦虚地听取了原汉人官员范文

程等人的有益建议，范在其中起了引见作用。因为满人要统治中国，也就必须了解历史上汉人对天的研究与认识：“中国有古老的敬天、测天传统。实际上敬天是中国封建皇权神授的理论支柱。掌握天文历法，观象占验手段，不仅仅是为了敬授民时等实用目的，也是皇权的一种主要象征。天文学自然成了皇家御用科学，它受到皇权和国家财力的支撑。也为朝廷所垄断。从历史上看，这种垄断每当改朝换代必然要受到冲击、破坏、甚至中断。中国天文学史的多次起伏，大都与王朝兴废成对应关系。”<sup>①</sup>清统治者以明智的头脑了解并愿尊重这一古老的传统，所以他们对这方面很重视，态度也相对开明，这便促使清初天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起色。而汤若望等人正是在这个历史机遇中表现出他们的才干，显示了他们所介绍的新法的优越性，也因此逐步取得清统治者的信任。

首先，汤若望积极主动地进呈新的仪器，预测日食月食，并及时报告朝廷：

“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sup>②</sup>

他送上一份图表，上面列出了这一年八月将发生的日食和次年正月一次月食的起终时刻，北京城及各省的见食时刻分秒也都准确地列入表内。

一个多月后，即1644年7月，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三件仪器：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一件，望远镜一台。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而对他的历书

---

① 伊世同《坐更台考》，载《文物》杂志，1991年第1期。

② 《清史稿·汤若望传》。

范本，官员们却无懈可击。这也给新朝官员们留下了良好印象。但若真正使各派天学人士、专家等心悦诚服，还要靠实践来证明。

这一年八月初一日，朝廷命大学士冯銓<sup>①</sup>率领钦天监官员及汤若望等人，一同登上观象台，当场验证各人推测日食的结果。这对汤若望而言，更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考试。这天之前，因事先风闻有日食，这被看作极大的“不祥”，民间称作“天狗吃太阳”，所以京城的气氛已变得异乎寻常，这天一大早，百姓就已聚集街头，有的拈香祈祷，有的敲锣打鼓，意在为太阳助威，避免它被天狗吞食。就是吞了，也要在万众吆喝、祈求声中迫使它吐出来。因而这可以称为一场紧张的助日搏斗。

京东观象台上的“搏击”更为紧张。大统、回回和西历的代表人物，共同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各自出示了自己所测的日食起复时刻与方位。汤若望也正是这样做的：此时此刻，他是胸有成竹的。他先让两个弟子向在场的人作了一番介绍，然后拿出自己测算的时间表并把日食的过程画在纸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众人屏住呼吸，等待时辰——这无情考官的裁判！只听得报时辰的官员一次次大声宣告，眼看着大统历、回回历代表测算的时刻已过，但天上的日食情况并没有得到验证。现场的观测最后证实，汤若望的推算最为准确。大学士冯銓等向朝廷回奏了实情：“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sup>②</sup>

西法推算的“密合天行”，产生了充分的说服力，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才真正对汤若望阐述的天学道理公开予以首肯，之后顺理成章地正式表示了态：

---

<sup>①</sup> 冯銓（1595—1672年），顺天府涿州人，时受多尔衮、顺治重用，为弘文院大学士。

<sup>②</sup> 见《东华录》（顺治二年）。

“敬授民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若节气之时日不真，则太阳出入昼夜刻分俱谬矣。历稽《大统》、《回回》旧历，所用节气止泥夫古，且北直之节气，春分秋分前后俱差一、二日，况诸方乎！新法之推太阳地平环也，则有此昼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旧法以一处而概诸方，故种种差讹，难以枚举。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诸方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明列篇首，开卷了然。”

根据上述认识，朝廷才决定颁旨试行，“乃以新法造《时宪书》，颁行各省。此我朝用西人治历之始。”<sup>①</sup>这里的“时宪”两字，是睿亲王多尔袞所赐。其含意在“以昭朝廷宪天义民之意。”

三个月之后，清廷正式发布了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谕旨：“钦天监信印，着汤若望掌管。凡该监官员俱为若望所属。嗣后一切占候事宜，悉听掌印官举行；不许紊乱。钦此。”此旨下达时间为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但汤若望的考虑是：他远道而来，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传道，所以具书谢辞，他在奏疏中写道：

“……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服官之理。况臣迭遵督率职掌之旨料理历法无难，至于掌管印信，臣何敢当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别选贤良……”<sup>②</sup>

然而礼部很快就奉到如下圣旨：

“汤若望著遵旨任事不准辞。”驳回的时间为顺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就这样，汤若望出任了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也由此开创了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之始。从此之后，来自欧洲

---

① 王之春〔清〕《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一，第2页。

② 《汤若望奏疏》第72页。

的一系列有才干的同行，才有条件接续此职。况且，就是在先后任此职的一系列洋监正之中，汤若望也不愧为佼佼者。正因为这样，他在清初顺治朝受到特别的宠幸。正如史家所评：“亘顺治之世，清廷对于若望等始终优待。无中国菲薄夷狄种族之见，且利用其法，以新天下耳目。”<sup>①</sup>

《西洋新法历书》的进呈，是汤若望在清代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他参加了《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保存了大量刻版，便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把一百三十多卷加以压缩简化，于顺治二年，自己拿出钱来刻版或加修补，共编辑刻印为《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原《崇祯历书》的扉页上书有：“钦差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级徐光启奉敕督修”，而百卷本中去掉了“钦差”与“奉敕”字样，改为“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级徐光启督修”。内容上加以概括，同时又补充了汤若望后来撰写的《筹算》、《历法西传》、《新法历引》三卷，所以共为一百零三卷。

故宫所藏的一百零三卷本《西洋新法历书》开头有汤若望写下的一段文字：

“臣谨捐资剞劂，修补全书，恭进御览。”这记录了他自己出钱刻版、编修的实情。他经手的这套历书共有两种刻版，一大一小：“小板原系远人自行刊刻，所有缺略不堪者，远人自行修补。可以仍供推算之用，亦不因其惫坏另外翻译以溷珍藏。况充栋之板未易搬送查阅，即欲另刊官样大字板片，去繁就简，约有一千余块，谨将小样书表刷印数叶，附览便知其详。”

从他本人的这段奏文中，即可得知他为使用方便，特地搞了这种小字型的刻板，他还曾说明：小板的用途还在于：“聊备教授

---

<sup>①</sup>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679页。

后学并推算之用。”鉴于小刻板有残缺，所以他又特地请旨：“将阐发新法奥义历指，并推步七政躔度立成诸表，约成数十卷，用官样大字格式刊刻进呈，藏之内府。”<sup>①</sup>

从上可知，对这部历书从编撰、保存刻版、整理约简，再到出资刻印，汤若望是自始至终兢兢业业、以全部身心投入的。《西洋新法历书》是他的功劳与苦劳的历史记录。据江晓原先生统计，在《西洋新法历书》中所包含的28种著作中，其署名情况大约如下：归于汤若望一人名下的共有7种，由汤若望撰写而其他人校订的6种。由两人署名共同撰写的一种。由其他人撰写而汤经手校订的有10种。以上合计24种。28种著作中完全与汤氏无关的只有4种。可见他的工作量之大，对该书付出的辛劳之多。

在这部书中，汤氏对西方天文学及其理论的介绍也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对托勒密学说的介绍：“《西洋新法历书》所介绍的各家天文学中，第谷（Tycho）学说固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托勒密（Ptolemy）天文学说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常能与前者分庭抗礼，有时甚至超过之。归根结底，第谷以及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大师都是喝着托勒密天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这种历史感和发展的眼光，正是汤若望特别向他的中国读者强调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汤若望，才使得清代的学者有可能较为系统地了解托勒密天文学。”<sup>②</sup>

汤若望在他所著的《历法西传》一书里，简单摘述了托勒密所写的《至大论》的要点。这部《至大论》是托勒密的力著。全书共十三卷。汤氏为这十三卷写了中文提要，十分简单扼要地归纳了每卷的中心，如：卷一为详证历学大旨，诸星运行等；卷二

---

① 《汤若望奏疏》第49页。

② 江晓原《汤若望与托勒密天文学在中国之传播》，1992年“汤若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为论宗动天云云。卷三为考太阳行；卷四为考太阴行；卷五为解月自行以求月经纬度；卷六为解日月合会。卷七至卷十三分别论述了五星的运行以及天汉的起落等。汤若望还着重评述了托勒密（旧译多禄某）的天文学理论，他写道：“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曰亚而封所、曰歌白泥、曰第谷四人者。<sup>①</sup>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至臻至极。”<sup>②</sup>

这里却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汤若望在中国主要传播的是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而没有传播最先进的，反映欧洲当时最新科学成果的哥白尼“日心说”，至于其他，特别是伽利略在1632年公诸于世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则更谈不到了。以上是确切存在的事实。

正鉴于此，曾有结论认为：汤若望等传教士“极力阻挠与破坏近代科学输入中国”。

对此问题，我们最好能从当时汤若望等所具有的宗教上、历史上（时间上）、地理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加以分析，才不会失之偏颇。

首先，不应忘记一点，汤若望原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一个教士。如果他本来就是科学家，特地跑到中国传布科学知识，而又有有意秘而不传新东西，故意将中国学术引入歧途，那么上述结论才有存在的合理前提。但实际情况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汤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是受教会派遣来传播他的信仰，为此需要，顺便

---

<sup>①</sup> 四名科学家为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äus Claudius 约100—160年）、阿尔封斯（Alfons von C. 1252—1284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83—1543年）和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年）。

<sup>②</sup> 据《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卷七八，历法前部总论六，中华书局影印，上海1934年，转引自前揭江晓原先生论文。

带来可以贡奉的一技之长，以博主人欢心，不料其附带之物，恰被主人大大赏识，这里仍然可以用敲门砖的比喻。如果当时中国天历比他等带来的更先进，更完美，那么中国的皇上朝臣们决不会愚蠢地花此功夫了。而当时客方面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领一道逐客令，返回老家，要么靠这块“敲门砖”呆下来，再图大计，汤氏选择了后者。事实上汤若望本意就不在“砖”上，他始终对他的来访初衷念念不忘，甚至斗胆在皇上面前宣传他的信仰教义，可惜始终激不起多大兴趣，倒是在“客从主便”的回旋余地之中，收到双方均未曾预料到的客观效果，这才造就了这段历史，才造就了汤若望这个历史人物，这一切也并不是他原先设计的蓝图。“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sup>①</sup>

第二，上述先进科学，当时即便是在欧洲，其传播也是极不顺利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在他死后方才出版，而他的学说则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才准许公开宣传。伽利略地动学说发表的第二年，即1633年，他已被罗马教廷叛罪。他也曾不得不忏悔，才免遭火焚。尽管他此刻仍大声疾呼：毕竟地球在转动！他的真理的声音却无法传扬开来。而在汤若望离开欧洲之前，伽利略的新论断已经触怒了异端裁判所。公元1616年，该裁判所（法庭）处罚他的两点理论，一是太阳为世界的中心，二是地球在转动。迫于强大的压力，伽利略不得不许诺放弃他的意见。这以后一段时期内，当然无人再敢妄谈此说。以上都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历史因素。在欧洲尚且如此，什么人能公开违背禁令，将禁书、“妄说”携往外国呢？

第三，汤若望即便当时已掌握或了解到新的科学信息，他也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0卷，第459页。

不可能大胆地在中国宣传。他作为一个教士，早已发过三层矢愿，其一便是对教会的顺从，教会禁止之事，他如何可能去做呢？特别是他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更不可能越雷池一步。耶稣会诞生的历史背景，它与罗马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会士还矢志服从教宗圣愿，鉴于此，汤若望也不会造次。况且，就他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已然受到极大的指责，也正因此，他死前向教会写下了悔过书，他的行动已被视为越轨了。更加超越极限之事是不可能了。

对这些问题，魏特神父的一些分析还是比较客观，比较合乎情理的。他写道：“在欧洲，在科学史上，汤若望的名字比他的后继人如南怀仁、戴进贤、刘松龄等较少被人提及。正如我们所知：他在天学活动中主要以实践为着眼点。天学对他是一种传教手段。他不愿为纯学术活动多花时间。而且他制造的仪器，不管怎样改进过，也还不够完善。直到南怀仁时，方才制出全新的仪器。汤若望时也缺少与欧洲学术界的联系，这种联系恰恰是促进科学进步的种种工作的前提。直到下一个世纪，天文学家才能从北京途经西伯利亚、俄国这一比较安全的邮路，与欧洲学者进行活跃的思想交流……尽管如此，汤若望在欧洲学术史上还是被誉为学者的。”<sup>①</sup>这里也谈及地理长距的阻隔，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能否及时得知故乡本土科学的最新发展也是个问号，书信很难及时完成此任，至于禁书，也就更难携入中国了。

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与中国同行们密切合作，为介绍西洋新法，从事了大量翻译、撰稿工作。对于他们工作的重要意义，徐光启曾评论说：“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洋至为详备，且又近今数十年间

---

<sup>①</sup> A. Vāth: Adam Schall von Bell, S. 334.

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随时异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sup>①</sup>徐光启的结论可以说明，他们当时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未来具有长远意义。

汤若望在主持钦天监工作过程中，成绩固然是可观的，然而他因循中国许多旧的东西，如保守、落后迷信的东西也是并不鲜见的。如当时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观候”，然后进行占卜，以测这些征候主什么，是吉是凶等等。汤若望在职期间，这方面仍然是按照老一套的程式进行的。请看清代《钦天监前三朝题本》中的两个实例：

其一为：

“掌管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等谨

题为观候事。据天文官该直博士王烨呈报：本年三月二十四日丁未申时候，天色忽变，黄气四塞，昏浊日色添白。臣等谨按观象玩占占曰：天色忽变是谓异常。四方来侵有兵战。今日躔在娄宿属鲁分缘，系观候事理谨具题知。

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监正 臣 汤若望

左监副 臣 戈承科

右监副 臣 周胤”<sup>②</sup>

例二：

“钦天监管监正事臣汤若望等谨

题为观候事。据天文科该直博士王烨呈报：

<sup>①</sup> 《崇禎历书》总目序。

<sup>②</sup> 明清档案馆藏《清代钦天监前三朝题本》，下同。

本年十一月初三日辛亥辰时候至巳时，日生半晕不成。晕上生戴气一道赤黄色。鲜明良久渐散。臣等谨按观象玩占占曰：日晕且戴，入主有德。令今日躔在箕宿属燕分缘系观候事理谨题知。

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款略）”

以上两则案例，一凶一吉，其根据无疑都是迷信的，唯心主义的，其结论因而也属无稽之谈。在这部《钦天监前三朝题本》中，类似这样的题奏俯拾皆是。这样繁琐的、一成不变的衙门式公文，当然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这种工作无论怎么辛苦，怎么日以继夜，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苛求古人，强求当时的人完全摆脱迷信是不现实的。但汤若望在这类问题上为什么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他所擅长的科学预测与分析呢？当我们在探讨汤若望在自然科学上的成绩与作为时，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科学的。他曾在钦天监进行过某些改革，而这一桩事，按理也应该列入改革之列的，或至少不该过多地重复这种荒谬的占卜。与此相反，他在任监正时，在观察星象，特别是观察预测日月食方面，都有翔实的记录载入史册。

自然界的一切运动与变化，都是出自于内在的原因，并不受人们主观意识的支配。同样，把自然界的各种变化视为吉凶祸福的征兆，视为上苍的暗示，无疑是自欺欺人。我国古代早已有天人相分之论。所谓天诛、天罚、占卜都属于这种“天命”论。中国古代的史学家、科学家对于天与人的关系，虽经过了漫长的探索，然而还没有真正得出科学结论，但他们仍不断试从神秘的“天命”羁绊中挣脱出来。而汤若望既来自欧洲，又受命于鼎革之后，按理应有新的进取，但反而完全依附于旧，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北京古观象台上目前陈放的仪器，也是与汤若望的工作不可截然分开的。有人自然会问：我们如今登台观看，并没有任何一

件仪器上标有“汤若望制”的字样。但这并不能说明汤氏与这些仪器的制作成功毫无关系。这些仪器大多在南怀仁任职期间落成。而汤是南的前任与老师。许多基础方面的工作，是由汤氏，或起码由他们共同完成的。

著述方面也有类似的例证，例如南怀仁的《仪象志》一书，就是以汤若望的著作为基础的，书中引用了汤著中的说法。一般说来，作为著作或书籍，易于查对，而作为仪器，难以一目了然。而事实是：南怀仁继承了汤氏的职务与事业，实现了汤氏未能付诸实践的愿望。在制作仪器方面，至少也继承了汤若望积累的数据材料与多年在华制器的经验。故我们不应机械地根据历史年表而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

汤若望是北京古观象台的首届外国台长，作为洋监正，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性意义。继他之后上任的，除南怀仁之外，还有洪若望 (Jean de Fontaney)、宋君荣 (Antoine Gogeisl Gaubil)、严嘉乐 (Slaviczek)，这样才得延续此职。之后又有鲍友管 (Antoine Gogeisl)、刘松龄 (August von Hallerstein)、纪理安 (Killian Stumpf) 和戴进贤 (Ignatius Kögler) 等人。

古台仪器的一一制造成功，在科学观测天象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从“明代永乐帝北迁起，直到正统间北京观象台废止，几十年内北京无观象仪器，全靠钦天监人员目视观测。”<sup>①</sup>

现在人们在北京建国门内可以看见的观象台，是明朝正统 (1436—1449 年) 初才建的。因为元朝的旧台 (据悉在今贡院东街与西街之间) 本是开元之初由元世祖忽必烈谕令修筑的。施工到元世祖十六年 (1279 年) 告竣，先命名为司天台。但经年累月，这个台到明朝时已完全报废了。于是利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的一个

---

<sup>①</sup> 伊世同《坐更台考》，载《文物》1991年第1期。

角楼，重建观象台。式样模仿了原由郭守敬（1231—1316）设计的旧台。大约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建成了观象台以及西侧的四合院，即今“晷影堂”以西“紫微殿”的所在。这才使明清两代有了适宜的观象之处，也才成为包括西方教士在内的钦天监人员的工作场所，使中外天文台长亦有了施展他们才能的舞台。而这些人包括汤若望，又以他们的工作充实了这里的设置。四合院最西侧西北角的几间小耳房，是汤若望曾经办公的地方，也是历届台长用过的工作室。房中迎面墙上是一幅十分醒目的匾，底色为海蓝，上面横书四个大金字“观察惟勤”，为小房平添了肃穆庄重的气氛。汤若望在这里任职 20 年左右，也正是以这种勤勉、审慎的态度工作的。他曾在这里批阅文件，撰写奏疏，也曾日以继夜地与监员们共同观察天象。

北京观象台上有一简仪，“简仪南端的正方案被改造成地平式日晷，改造者（日晷的设计和监制者）应该是传教士汤若望。”<sup>①</sup>据伊先生介绍：这件简仪是按照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所制的简仪仿造的。正方案是这个仪器的一个附件，其用途是用来测定方向的。从其制造时间上分析，不可能早于汤若望之前，不可能至南怀仁到职之后。而仪器上的地平式日晷装置应该是传教士们带到中国的。正方案上的日晷度盘采用了今制，即 96 刻，而中国的古制是为 100 刻的。

虽然在观象台上汤若望科学工作的遗迹已不多见，但在“台下”，在北京的文物收藏中，仍有迹可寻。如北京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他制造的象牙日晷，为袖珍式，小巧而精制美观。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他制造的青铜日晷，还有他制的浑天仪。根据专家们考证，

---

<sup>①</sup> 伊世同《几件新发现的涉及汤若望的天文仪器》，为 1992 年纪念汤若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这两种仪器不是进呈皇帝的礼品，就其用料选择、工艺精细程度以及未刻铭文等情况判断，这是汤若望顺治年间为钦天监设计和监造的实用仪器。

汤若望在明代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是翻译《坤輿格致》一书，一是绘制了星图。

《坤輿格致》这个书名，是中译者改加的。原著名为《冶金全书》，作者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著名科学家格奥尔格·鲍尔（George Bauer 1494—1555年）。他诞生于萨克森，曾学过医，通德语、希腊语、拉丁及意大利语等。这本书写于1550年，它在欧洲采矿、冶金史上有重要指导意义。耶稣会士邓玉函曾向中国同事们介绍过这本书，但他不久即去世了。

李天经接替了徐光启的工作之后，不但继续担当起修历工作，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常思忖如何为国家分忧。他在了解了这本书的梗概之后，认为确有实际意义，希望能用于指导中国开采矿物，以增加收入。为此，他特地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疏：

“微臣蒿目时难，措饷为急，每欲为生财一节，仰佐司计一筹……惟于修历之余，同修历远臣汤若望等，遵旨料理旁通诸务，以图报称。简有西洋《坤輿格致》一书，窥其大旨，亦属度数之学，于凡大地孕毓之精英，无不洞悉本源，阐发奥义，即矿脉有无利益，亦且探厥玄微，果能开采得宜，煎炼合法，则凡金银铜锡铁等类，可以取允国库用，亦或生财措饷之一端乎。”<sup>①</sup>

李天经还概括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和翻译的意义所在。勿庸置疑，是汤若望事先已给他简译了有关章节，如奏疏中谈及窥山察脉的方法，试验用的五金、药物、冶炼方式、器具等。书中有字有图，井井有条。而且强调这些知识为中国“向来所未有”。李

---

<sup>①</sup> 此段引言及译矿冶全书一事，参见《汤若望奏疏》328—334页。



天经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这书对我国的价值：可借以引进全新的开采冶炼术，“诚闻西国历年开采皆有实效……远臣携之数万里而来非臆说也。”由于崇祯看出这本书确有实用价值，所以很快就批准付诸翻译了。

不久后，汤若望与李天经及光禄寺录事杨之华、黄宏宪等，一道完成了全书第一部分的翻译工作，即开采矿藏部分，并于七月初二上疏禀报：

“先撰译绘得《坤輿格致》三卷，汇成四册，敬尘御览。尚有煎炼矿冶等诸法一卷工倍于前。匪能一朝猝办。如蒙 明俯采一面容臣督同远臣汤若望……等昼夜纂辑续进，一面敕发各镇所在开采之处一一依法采取，自可大裕国储，其裕措饷不无小补。”

崇祯帝见到奏折及译本之后，对已译冶矿书很感兴趣，嘱留下来细细阅读，还命李、汤等人继续翻译下去，他一点儿没有拖延时日，就在七月初六日及时对李天经四天前的的奏疏下达了旨谕：

“这坤輿格致书留览，余书著纂辑续进，该部知道了。”

李天经、汤若望等欣然从命，“遵旨续进”，从1639—1640年，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完成了任务。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初二报告说：

“……于今月始获卒業，为书四卷，装潢成帙，敬尘御览，倘蒙鉴察，敕发开采之臣，果能一一按图求式，依文会理，尽行其法，必可大裕国储。”

就这样，全书两大部分，分作四卷，全部翻译告竣。然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本书并没有出版。更可惜的是，“《坤輿格致》的中文稿本至今下落不明。它应包括在明崇祯末年礼部、工部等内阁部门档案中，但笔者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中一直没有找到，或许已散佚……万一能够找到原稿，并能重新出版，也算

完成了300多年前中外科技交流史中的一件未竟事业。”<sup>①</sup>

笔者也在北京的有关档案馆及善本收藏部找寻过，结果亦失望。但奏疏与谕旨均在，它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一中外合作的早期科研学术成果是应引起重视的。通过对这一成果完成过程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测天观象与修历。涉及其他有益国计民生之事，他们也热心而不辞辛苦地去完成。如果他们的设想得以实现，对那时中国采矿冶金事业的发展会大有裨益的。

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汤若望还曾关心过北京城的规划及城市布局建设工作。据《汤若望揭帖》顺治二年五月十二日，曾有这样的记载：

“都门重地，形势尊严，喜其开畅，而不喜其蔽塞，欲其宽广，而不欲其窄狭。譬诸人之心胸眉宇，不宜壅郁，此形家一定之理也。东江米巷；文德牌坊被毁，似应修竖，以培风气等因。到监该望，看得宸居重地，负阴而抱阳，阴宜敛藏，阳宜开广，此理固然。若正阳门与大清门之间，正乃诸阳之首，而棋盘街为其眉宇，岂可令有迫蹙之状哉。迹见小民聚集贸易，初犹棚席，今因惧火，易以瓦屋，蔽塞窄狭，甚非所宜。又文德武功两坊，左右相配，似宜速为修竖，以肃观瞻。在该科术数之，言或未足信，而职掌攸关，义难默隐，为此具题，伏候敕旨。”

但上述建议，是否真正出自汤若望笔下，对此笔者不能证实。一方面，这不属于他的工作范畴，汤若望为什么要在这方面如此下功夫呢？另一方面，汤氏兴趣广泛，他本人也曾设计和督建教堂，况且又“久居都门”，已自视为京华一名老住户，兼任本朝高

---

<sup>①</sup> 《阿格里柯拉的〈冶金全书〉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载《海交史研究》，1981年刊，总第3期。

官，因之对城市的远景建设很关心，这也可以理解，然而这都是设想或疑问，笔者愿以此求教于读者与专家。

汤若望曾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星象并绘制大幅星图的工作。据记载，汤若望曾两次派人向罗马的布佐神父（Pater Buzu）呈送星图。如今，他们首次绘制的大幅星图在中国国内已无从查找了，而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内今恰藏有两幅，这是否就是他们最初的共同成果呢？

为了追寻有关汤若望的历史遗迹，笔者确曾足抵罗马，但可惜对于天文星象等自然科学，完全是门外汉，故须一一请教于有专门造诣者。所幸恰曾有专家撰文对这星图作了详细的评述，这便是上海的潘鼐先生发表的《对〈见界总星图〉的考证》<sup>①</sup>一文。该文指出：这星图“是西学东渐后的第一幅新颖实测星图”。汤若望在绘制《见界总星图》时曾担任了撰文工作。文字的下款题有“极西汤若望撰，楚寿昌后学邬明著图。”据该文作者考证：邬明著绘图时，制图原理当属汤若望传授，故邬自称“后学”。另一幅图上有三方印鉴：即“通微教师”、“光禄大夫”和“汤若望印”。这星图“在我国三百多年已湮没不彰”，在《四库全书》和明清档案中都不见踪影了。潘鼐先生是设法获得梵蒂冈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胶片之后加以研究的。这位专家指出：这星图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不仅以其新的形式“突破了我国两千年的传统”，而且在星象组织上“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徐光启主持下重新测定的。这幅星图“是近代恒星天文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从此在星名表达方式、星座的组织 and 体制，恒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图的形制和表绘

---

<sup>①</sup> 潘鼐《梵蒂冈藏徐光启〈见界总星图〉考证》，载《文物》杂志，1991年第1期。

方式、星座星数的扩充等等许多方面，改进了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它使突出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国古星图，在欧洲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sup>①</sup> 根据潘鼐先生的考证与分析，汤若望正是为这划时代的星象工作出了一分力。

总而言之，汤若望在天历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述，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明末，我国知识界崇尚空谈之风颇盛，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学为草芥。对这一点，李之藻也曾发出过感叹，他感到西方传入的历算、仪象、日轨、医学、格物穷理之类的书，是我国一向所没有的，而这些书“有资实学，有裨世用……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这里的“虚骄”两字很值得斟酌；因为中国人，即便是些自视很有知识的人，也曾一味盲目固守千百年来自封的中心，固守自我封闭的陈规，认定“天如伞，地如盘”，自己则无疑是端坐在地盘正中央……而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意识到“殊方别自有烟云”，不少有头脑的人，开始去认识“天外之天，山外之山”。因而使学术界风貌顿改：“那时候学界气象，如久经严冬，一旦解冻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跃，煞是可爱。”<sup>②</sup> 而汤氏在这次学海风波激荡之中，曾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者。

---

① 见前揭潘鼐文。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二讲“清初学海风波余录”。

## 第四章 交游中士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著书多格言，结交结贤士。  
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  
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  
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  
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

上面是明季福清人叶向高写的一首小诗，题为《赠西国诸子》。全诗字里行间都是赞颂西方来的诸位传教士的。诗中先介绍了这些人的身世、他们的素养、性情、学识以及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人怀有的真挚感情。

仔细剖析一下这首诗，再对比一下汤若望的各个方面，就会感到，若望的品貌德行，处事为人与诗中的赞美是颇相吻合的。作者在这里所抒发的感情，能充分反映当时与汤若望交往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所怀有的真情挚意，故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首诗是富有代表性的。

面当时来华的诸多西士，对中国到底有怎样的印象和感觉呢？我们不妨也找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它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sup>①</sup>

这是莱布尼茨书信中阐述的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总印象，而这些印象实际上是在综合许多传教士的“东方来信”的基础上所作的概括，因而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当然，这一概括以及笔者所录的均属褒的一面，而我们这里正是要就褒的一面做些分析，因为当时西方有识之士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大多正是建立在双方良好印象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以对峙和冲突为主，交游的美谈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至于矛盾、争辩及冲突留待其他章节再述。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老先生对汤若望与中士的交情颇为欣赏。他亲自保存了一帧墨宝，这是一首排律，出自明代小有名气的书画家王铎之手。

王铎是明朝天启壬戌（1622年）进士，他也是与汤若望过从甚密的中国朋友之一，更难得的是，他与若望同年，虽然一个在西欧莱茵河畔，一个在黄河之滨河南孟津，但都是在1592年来到这个世界上。王铎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曾为明朝礼部尚书和清朝东阁大学士，他在书法上习王羲之，而又入古出古。到晚年行、草、楷、隶无不精妙。画技上效仿米芾，但又自成一体，他喜欢画梅、竹、兰、石和山水，可惜他的画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一幅水墨扇面：《山亭远岫》。画面上描绘

---

<sup>①</sup> 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23页。

的山峦茂郁苍茫，林木稠密幽深，从着墨皴点之上，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笔力与功夫。

王觉斯是汤若望前期的朋友，因为他刚到花甲之年便去世了（卒于1652年）。他对若望的学识人品都非常钦佩，请看他对汤若望所作的评价：“道未先生学贯天人，养多渊秘，心服其为人中龙象也。”故曾为若望作画赋诗。据他自己记载，他曾为汤公“画一卷”，但这一卷到底是什么内容，今已无从查考，因为它已落入“梁上君子”之手。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觉斯另外赋诗一首，并写成条幅，还诙谐地加了注脚：说如果得知了这段故事，“翁必大笑也”。这寥寥数句，道出了他们之间和谐、融洽并富有幽默感的交往关系。这幅墨迹，曾由上海文明书局影印，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乃和女士珍藏有一轴。全诗如下：

### 过访道未汤先生

#### 亭山登览阅海外诸奇

风动铃旗树影斜，漆书奇变尽堪嗟。  
他山鸟兽诸侯会，异国琳球帝子家。  
可道天枢通海眼，始知日路小瓜窪。  
需时与尔探西极，浩浩昆仑未有涯。  
殊方别自有烟峦，一叶舢舨世外观。  
地折流沙繁品物，人穷星历涉波澜。  
眉间药色三光纳，匣里龙形万壑寒。  
好向橘官廷受篆，知君定不吝琼丹。  
八万遐程燕薊中，如云弟子问鸿濛。  
惯除修蟒菁风息，屡缚雄鳍瘴雾空。  
灵药施时回物病，玉衡齐后代天工。  
幽房膳有长生诀，一笑拢髻遇苑风。

图画充櫺始撮然，何殊层阁揖真仙。  
醉吟心映群花下，闲卧情游古史前。  
琴瑟中和秋独奏，锺铎光怪夜双悬。  
欲从龙拂求灵液，只恐鸾车泛海烟。

诗的作者不愧为画家，因而他在“诗中有画”上，似表现得更为突出：汤若望的形象被他刻画得极为逼真：若望携中国朋友登亭远眺，并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介绍海外种种奇闻异事。他既有渊博的学问，又有悠闲的志趣。他的书室中画册“充櫺”，上门向他求教的人往来“如云”。而他本人的气质又是那么谦虚、潇洒，俨然一派中国的“大儒风度”。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所崇尚的。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若望身上的这种儒味已是非常地道的，表里一致的，他经历了一番深刻的自我儒化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西士一样，完全吸取了利玛窦当年几经摸索而得出的经验：利氏一开始着西式服装，在感到与中士交往不便时，又改着袈裟，但仍然不能消除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首先是表面上的隔膜。后来，他终于改为“儒冠”、“儒服”，这便很快缩短了距离。此后，西士们大多效法他这种由表及里的自我儒化作法。改装的同时，他勤奋地学习汉文汉语，苦读四书五经，经历了这一番功夫之后，终能以中文著书，这才具备了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社交的条件，才能逐步地赢得一些朋友。

着装一事在汤若望则更有特色，在他被清廷封官之后，即开始着中国官服，自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顺治帝“赐朝衣朝帽、鞋袜”，<sup>①</sup>此后，他在服饰上当然彻头彻尾地中国化了。所以柏乡进士魏裔介称他为“西海之儒，即中华之大儒。”（见道未汤

<sup>①</sup> 《清实录》卷六十六。



先生七秩寿序，载《主制群微》第三版赠言附）。汤若望深切地领悟并真正实践了利玛窦关于“交友”的许多原则。玛窦曾着重强调过他在这方面工作的意义，尤其是他所著的书《交友论》，他说：“撰写这部《交友论》给我本人及我们整个欧洲所带来的声誉，胜于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一切。”<sup>①</sup>

这一段话可以说讲到了家。在中国，谈及利玛窦及其《交友论》，是人们不感陌生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利玛窦的形象远远高于其他欧洲人士。他那美妙、温和、友好的态度符合中国的最高标准。这种天赋使他了解和赏识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他给华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许并非他所布的道，而是他独特的人品。”<sup>②</sup>

中国人对利玛窦其人的了解，与他在《交友论》一书中所作的富于人情味而又精辟的论述也有关系。他发表的见解，与中国传统的交朋友讲究信义的原则恰相符合。例如利玛窦曾经写道：“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sup>③</sup>中国的“士”坚信：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士为知己者死”，或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利玛窦、汤若望提倡“交友”，并亲自去实践这种信条，真是恰合时宜，对他们事业的成功，声望的提高大为有益。

汤若望所以擅长于交游，也与他终身做学问有关。中国自古认为，倘学无友，学必无成。所谓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就是说少不了相互探讨，切磋琢磨，乃至辩论争吵。只有这样才

---

① 利玛窦书信，1599年8月，转引自《基督教传抵中华》(Christus kam bis nach China) 苏黎世，1984年版，第164页。

② 转引自弥维礼《新文化》，第3期，原文见：L. Garrington Goudrich,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Geography 1368-1644, Newyork and London, 1976.

③ 利玛窦《交友论》，载《天学初函》第1册，第300页。

能辨明是非曲折，才能有所长进。而西方传教士在这一问题上也持有同样看法，例如利玛窦在他的《交友论》一书中做过这样的阐述：“人需要朋友，这种求偶的观念是古今中外的人性所需。”“德志相似，其友始固。”<sup>①</sup>这与中国的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出一辙。由此可见，尽管隔山隔水，尽管是不同的种族与国度，大家对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与情谊的见解却是不约而同的。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汤若望在中国找到了不少要好朋友。

汤若望与徐光启之间结下了高尚而纯厚的交情。

若望能与明廷发生直接的、密切的联系，首先要归功于徐光启的推荐。当然这里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那就是钦天监工作的需要。而邓玉函的去世又是直接起因。

邓玉函 (Johann Terrenz)，1576 年生于康斯坦茨。此人不仅博学多才，而且格外勤奋，单说语言方面，他精通德、法、英、葡萄牙、拉丁语等多种语言。1618 年春，他与金尼阁等一同前往中国。先在嘉定、杭州一带活动，1629 年才被召到京城，旋即在历局担任重要工作。他不仅精于天历，有四、五种著作，如《测天约说》二卷，《正球升度表》一卷等，而且在医学、生物学等多方面也颇有造诣，他撰写了《人身概说》(两卷本)一书，把西方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介绍到中国。而他在中国，为了研究医用草药，曾亲尝了许多花草，并作了详实的记录。他的手也很巧，亲手制造了多种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仪器等，并绘图、著书加以详尽说明，例如有名的《远西奇器图说》一书，是他与中国同行王征一同完成的<sup>②</sup>。遗憾的是：玉函已体弱多病，进京城供职只半年多便去世了。由什么人接替他的职务呢？徐光启当然作过一番谨慎、周密

---

① 利玛窦《交友论》，第十八则。

② 参见《徐光启文集》卷 4。

的思考。他选中了汤若望和罗雅谷两人。因此，在邓玉函辞世刚刚一个月，徐光启就上了一道奏疏，名为：

《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他在这里首先陈述了玉函去世后所面临的困难：

“四月初二日，臣邓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学历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忽兹倾逝，向后绪业甚长，止藉华民一臣，又有本学道业，深惧无以早完报命。”也就是说，历局工作急需有才干之人接续，正因为这样，光启及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作了很有份量的介绍：

“臣等访得诸臣同学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者，其术业与玉函相埒（liè），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sup>①</sup>

崇祯皇帝很快准奏了。前后只相隔三天时间，礼部便得到如下旨令：

“历法方在改修，汤若望等即可访用，着地方官资给前来，该衙门知道。”<sup>②</sup>

陕西西安府正是在接到这份旨谕之后，立即为汤若望置办轿子一顶，雇来轿夫，备好途中需饮用的水，还雇来驮载行李、食物的牲口数匹。这样，汤若望在妥善的护送之中，又一次千里跋涉。这回是赶往北京赴任。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徐光启看准汤若望是个难得的人才，赏识他的术业与能力，把他请到自己身边。他们后来的密切关系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提倡西洋自然科学，任用西士这一点上，徐光启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早在1629年，他就曾上一道《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公开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出过有名的十大建议，

---

① 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汤若望奏疏》。

如“历法修正”、“修历用人”、“急用仪象”、“度数旁通”等。一心劝谏皇上在中国提倡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以后在与汤若望等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在处理中、西人际关系上，徐光启始终主持公正，在工作上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态度，总是让大家一起辩论，一起参加测试，最后让事实说话，再下严谨的结论。

汤若望在撰写出版两卷本《交食考》时，得到徐光启具体的支持与协助。手稿完成后，如何找人刻印出版，这对汤若望而言，当然比较棘手。徐光启替他找到适当的人刻版，并嘱咐以优质纸张印刷。书成后，他又把一部书亲自带到礼部，因而使这书很快得到应有的影响与重视。当然，对其他西士，光启同样关怀。如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被朝廷任用，都是由徐光启力荐的。

在日常工作中，徐光启与中、西同事同甘共苦，直到高龄体弱时仍然如此。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和众人一起登观象台观测，不幸坠阶跌伤，“致伤腰膝，不能动履。在1635年（崇祯五年）5月4日那次月食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但仍然在夜间率领着钦天监的官员、博士、天文生及罗雅谷、汤若望等人一同登台，守候在仪器的旁边进行观测。”<sup>①</sup>在这方面，光启身体力行，也为汤若望等同事作出了可效法的榜样。

在诸如日常生活、冷暖温饱这些涉及个人切身的事务上，光启对若望等也是关怀备至的。汤若望初到历局时（崇祯初年），每月俸银为十两，据记载：“自二年八月至六年六月止，共四十七个月，共银四百七十两。”而当时普通儒生的俸禄一般每月只二两四钱，最多的每月得银三两。这样看来，明朝给汤若望（包括罗雅谷）的待遇不薄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据徐光启记载：给“远

---

<sup>①</sup>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臣”的报酬，“俱系辅臣自备”<sup>①</sup>，这说明，在生活费用上，汤若望得到光启等私人的贴补，也就是说，为了资助他的生活，光启是曾不吝慷慨解囊的。但是他本人一辈子生活却始终很清苦，据《明史》记载：“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

此前，当徐公作为明代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主持《崇祯历书》的撰写工作时，汤若望与西人龙华民、罗雅谷等一道参加。这一时期，光启与若望共同分担了这一繁重工作中的艰辛和喜悦。所成百卷历书中，《交食历表》二卷、《交食表》四卷以及《恒星出没表》四卷，是由汤若望完成的。<sup>②</sup>

徐公病榻前，若望曾多次前往探望。后来他干脆搬到徐家宅内陪伴他，以随时给这位卧病的老人以帮助和安慰。在后事的安排上，光启也以极大的信任与汤商谈。如他临终的圣事，委托若望全权主持。历局的工作做了安排与嘱咐。此外，谈到徐公家中的私事，如住屋怎样处理等，因他死后，是要由儿孙们送往家乡的。最后也正是由汤若望给徐光启作了终傅礼，徐光启才告别了人间，这是1633年11月8日。

而光启去世之前，也着实把汤若望、罗雅谷等人的事放在心上，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又上了一道奏疏给皇帝，一方面高度评价他们的成绩，另一方面对日后的工作安排，也向皇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写道，罗汤二人“撰译书表，制造仪器，测算交食躔度，讲教监局官生，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功应首叙。”

对这样两位鞠躬尽瘁的远臣，到底应如何予以特别的酬劳呢？徐公认为：这些人“素守学道，不愿官职，劳无可酬”，所以他建

---

① 《汤若望奏疏》。

② 参见：朱家潜《〈崇祯历书〉与〈新法历书〉》，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4期。

议“量给无碍田房，以为安身养贍之地，不惟后学攸资，而异域归忠，亦可假此为劝。”<sup>①</sup>

这是一条很可行的建议，一方面可以体现皇帝爱惜远臣的宽厚胸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华供职的外国人安心本职，效忠到底，并有了在这里安然度其晚景的保障。因而这是一条招揽贤士的妙策。

徐光启为什么能把汤若望这样一些远西贤士举荐朝廷，他又为什么从内心如此爱惜人才呢？这与光启本身的为人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清廉刚直赤心为国的人，曾有人评论他：“秉浩荡刚大之气，抱凝粹雄杰之资，其为文，闳博奇玮，峥嵘磅礴。其为学，网罗中外，闳究天人。其立身处世，沉浸乎道理之府，绝乎门户之心。”<sup>②</sup>这也就难怪他与西洋人交往同样心胸坦荡，无中外门户之界与狭隘的偏见。由于他自己潜心研究西学，因面对擅长科学的西洋教士“无一不识”，他希望这些人对中国有所贡献，希望中国从西学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为了探求宗教与科学知识，光启早年曾两次前往澳门，澳门当时成为欧洲人来华的第一站，这个城市已初具欧洲城市的风采，竖立起内地鲜见的高大洋式屋宇，高耸的尖塔式教堂。葡萄牙语等洋文在这里已很通行。光启去后不但开阔了眼界，寻求到所渴望的知识，而且结识了许多道友与学业上的同行，加上自己经年累月刻苦钻研，他很快成长为我国当时的科学精英。那时正值明代末年，国力凋敝，朝政纷乱，尽管财政已近乎枯竭，但宫廷却十分奢侈。社会风气日复一日地趋于腐败，贿赂成风，不动银钱办不成事，所谓“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受钱之人？”<sup>③</sup>多少大

---

① 见《汤若望奏疏》。

② 《增定徐文定公集》序，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参见《明史》，列传，卷146。

小官吏刚好乘此之机填饱私囊，哪管什么江山社稷，科学发展，民族兴衰。但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却有徐光启这样一些人，兢兢业业，潜心于学术，不谋求个人利益，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徐光启之孙尔觉，在给卫匡国的书作序时，曾称赞卫氏“甚乐与贤人君子为友，故必须同志者相为感应，相为气求，庶几可以广其益，一其理。”<sup>①</sup> 其实，他的祖父徐光启在对待交友方面正是如此。光启交朋友，不考虑国籍、年龄、身份、地位，他与汤若望的关系正是这样，徐光启较汤若望整整年长 30 岁，二人相识时他已官达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但对汤若望这样一个来自极西的年轻西士却相当器重，他们二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他们之间的友谊称得上是“忘年之交”。

汤若望与中国朋友的交往是否只局限于学术方面呢？并非如此，工作之余，他并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言笑的人，他和中国朋友时常开怀畅饮，畅述胸襟。他的住处也是“座上客不断，杯中酒常满”的。有关这方面，他的经历还留下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和两首生动的小诗，其中一诗为：

胡士安：“道未先生邀同行屋贰公饮和兰贡酒”；另一首为薛所蕴做：“汤先生招饮上赐和兰贡酒”。

1655 年，荷兰使节远涉重洋抵达广州，在那里等候了 7 个月，终于获准前往北京“朝贡”，正如诗中所写：

“和兰（即荷兰）轻重洋，修贡自西海。”

这一次荷兰使节带来许多奇异的海外珍贵物品，其中特别是葡萄酒，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不仅酒香，而且器美，两首诗中都有这样的描述：

“奇酿罗诸邦，瓶贮色争璀璨。”

---

<sup>①</sup>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 122 页。

“玻璃制精巧，灿灿文理具。”

当时，若望正在受宠之时，皇帝一连三次下达敕谕，对他封官加爵。他已得到“通微教师”的称号，所以皇帝把来自海外的美酒赏赐给他，怜悯他久别故土，喝到来自欧洲的洋酒，可以聊解思乡之情，即所谓：

“颁予通微师，故国味斯在。”

汤若望谢过皇恩之后，就把酒带回他的居室，室内已不觉传出一种芳香气息。如前所述，若望是个好客、好交际的人，有了好酒，自然也不喜独酌，而是约来相好者共饮，薛所蕴在诗中这样记述：

“异人汤若望，上前全拜赐。”

“叩友二三人，相延就客次。”

这里提到的是请了两三位朋友共同享用，而从现在查找到的资料分析，他邀友品尝佳酿，不仅是两三人，起码也有两三次了。对此，《客舍偶谈》一书中也有记述。<sup>①</sup>

据说，来自甬东的范吏部潞公也曾有幸受若望之邀到这里与之对饮。那时，若望把他收藏的贡酒取了出来，精制的酒瓶放在一个锦盒之中，打开锦盒，只见酒瓶很是小巧别致，只有小碗口大小，半尺来高，彩色玻璃反照得室内生辉，刚一打开瓶盖，顿觉香飘满室，令人馋涎欲滴。若望速去取来两个晶莹剔透的小白玉杯，然后对范吏部说：“我听说您酒量很大，那么似可以饮上半杯。”说着为他斟上了半杯酒。这位范先生听了很不以为然，似乎主人太轻薄他的酒量了。然而若望却微笑着说：“这种酒劲头很大，决不能喝得太猛，可要小口细细地品味呀！”

于是范公依若望所言，刚刚品了一小口，只觉得奇香沁心，五

---

<sup>①</sup> 参见：彭孙贻《客舍偶谈》。



脏六腑顿时通畅，一股暖流从头顶贯下，一直通到双足，那种感觉真是悠悠然，薰薰然，其淋漓痛快简直是不可言状，三品四品，半杯酒告罄了，他刚一瞥见玉杯见底之时，禁不住两眼也斜，瞬时成了酒仙醉翁，自觉支撑不住，歪倒在卧榻上，不多时竟入了醉乡梦境了。若望自知酒力强劲，不敢多贪，但喝过几口后不大功夫，也眼前雾起，飘飘然成了瞌头翁。

在一旁服侍的两位仆人，刚才见有这罕见奇货，又闻屋内酒香扑鼻，再也耐不住性子，于是各贪两杯，很快双双酩酊大醉了。一顿饭功夫，这里便东倒西歪，醉倒了一屋子。还是主人汤若望先行醒来，吩咐下面给每人送上一碗稀粥解酒，稀粥进肚一会儿，众人才渐渐醒过来，两个仆人虽尚带酒意，也只能步履踉跄地去送客。他们就此留下了痛饮荷兰贡酒的一段佳话。

更有意思的是，汤若望不仅以酒待客，还以饼饷友。据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甲寅……晚同张月征饮葡萄下，啖西洋饼；盖汤太常（即太常寺卿汤氏）饷朱太史者。其制蜜面和以鸡卵，丸而铁板夹之。薄如楮，大如碗。诧为殊味，月征携四枚，以示寓客。”看来，这便是汤若望自制的鸡蛋糕了。这段故事使我们得知，汤神父还有一手烹调的技艺，其人不乏风趣。因为德国男人，特别是当年，是轻易不下厨的。汤公这时已是一个年老男士，况且又是神父兼当朝一品，竟然亲自动手烘烤点心，足见他身上洋溢的生活气息以及他的平易近人。中国人那时对这种洋点心当然充满好奇感，所以品尝之后又携带回家，让朋友分享。这自然在京师又传一段小插曲。这无疑也是他性格中惹人喜爱之处。

汤若望不但与中国朋友共品甘甜，也曾与他们同茹辛苦。这方面，他同样留下过小故事。如孙元化、张焘等人蒙难下狱后，若望曾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探监。

孙元化号初阳，1581年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曾跟随徐光启搞过数学、火炮方面的研究，写过《几何体论》一卷。孙氏在明朝末中举人。后升任山东登莱巡抚，1628年到任。仅三年，就因部下孔有德背叛朝廷行为而受牵连。孔率叛军攻下了登州。孙元化因之被绑缚到京受审，之后判死刑。张焘原为李之藻门人，与之藻同受洗于利玛窦。<sup>①</sup>后来在孙元化部下为参将。在他的同僚孔有德携耿仲明、李九成共同造反时，孙元化命张率兵应急，但因措手不及，兵败于阵，以至登州失陷。因而他与孙元化一道被下狱。

为了挽救这两人性命，徐光启曾多方奔走，但没有奏效，眼看二人要受极刑了。汤神父的考虑是：怎样才能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怎么为他们作临终祈祷，因为这二人显然是无辜的。但死牢壁垒森严，闯入者有生命危险。但为了中国教友，汤神父不顾个人安危化装入狱了。

他穿上一身“煤黑子”的服装，把脸也涂黑了，又让人弄来一个煤筐，里面装上炭，俨然以一个炭贩的模样，混在打杂工的人群中潜入大牢。他在那里陪伴两人背诵圣经中的有关段落，同他们一起祈祷，以使他们“灵魂得到抚慰”。

当然，汤若望对孙元化等人的格外关照主要出于共同的信仰以及神父的责任感。况且孙、张在教友中都属有身份的人。孙列席过有关礼仪之争的嘉定会议，还在嘉定修建过天主堂和为教士们备用的住房。但我们从这故事也可以窥见汤若望做事的勇气和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换一个一般的大鼻子西洋人，是不敢斗胆冒这种风险的。

文人许之渐与汤若望的关系也是颇堪称颂的。

---

<sup>①</sup>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187页，河北献县1937年排印。

许之渐字青屿，号敢言，原籍江苏毗陵。<sup>①</sup> 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后奉旨任江西道御史。由于汤若望案件的波及，许之渐也成为被告之一，而且被公堂审讯。逼问口供的主线是《天学传概》一书序言的来龙去脉，并问及还有什么人写过此类文章。许之渐鄙视权贵，生性清高，他并不作什么申辩，只十分简单地答对：“只就我一篇文字论定是非便了，又何事旁及他人。”

根据杨光先等人的起诉，许之渐的罪状在于为利类思等人所著的《天学传概》一书写过序。为此事，杨光先特地作过一篇文章：《与许青屿先生侍御书》，这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指责请写序言者：“先生乃执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标斯书。”杨光先作此书信的用意，力图离间汤、许之间的关系，将许争取过来，并让许反戈出击，把罪名全推在利类思、汤若望身上，为此他实际上在信中向许青屿作暗示，授与他下台阶的脱身之词：“托先生之名为之序，既足以摇动天下人之心。”这很显然是逼许青屿公开说明，序言是被告者假借我的名义写成的。如果许按杨的授意行事，一则可以解脱本人，二则又给汤等人增加一层罪状：冒朝臣大名写序。但许之渐很冷静，也很磊落。他记述道：“杨光先诈伪万端，先将天学翻案，勿过余曰，天学传概序，知非公手笔。公但辩其借托，便尔并行不悖。余知其行径，值微恙杜门不应……”就此可知，许之渐无论在堂上堂下都没有按杨光先的意图行事。他“一为妄人指摘，至自隳其功名。”结果，正如许纘所记叙：“都御史佟、御史许与余三人，或系作序，或系捐银，同时罢官。”<sup>②</sup>

① 吉县郡名，相当今江苏常州、武进、丹阳一带。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册第74页。

对这件事的内情<sup>①</sup>，张宸在其所著《平圃杂记》中作了交代：说许青屿“与西洋人汤若望交，以其制度精巧，用以姿其好奇之目。从其请以为某书作叙（原文如此）则是文人结习。借天官家言以发抒其玮丽之气，非驾信其教而昌明之也。”<sup>②</sup>张宸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又身为许之渐的朋友，因而对事情的原委可能更为了解，据他记述：“余在都门与许青屿、施砚山、何黈音三人者交至忘形骸。然砚山操行严密，尺寸不苟。青屿澹于自守，疏于接物……是三人者虽志趣不同，以方寸论之则俱笃实君子也……”。<sup>③</sup>张宸对他的三个朋友一致评价为真正君子，尽管他们秉性特点各不相同。许之渐的清高洒脱的文人气质在这里也表现很充分，他对世事看得深透，预先已料到杨光先“遍布网罗，余并罹其中。”他对汤若望等，既愿为他们作序，又愿同他们共患难，决不诿罪于人洗刷自己。而且他在公堂上还敢于鸣不平，当有人斥责汤若望宣扬“邪教”时，许之渐义正词严地说：“世祖皇帝御赐碑额煌煌陈列，举朝大老词臣撰述成编。我独何人，遽敢斥为邪教？”这些话反映了许之渐一类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他们对当时政治上翻云覆雨者的反感。许之渐并非天主教徒，但他等对汤若望有好感，曾与他共过事，因而甘心与他共患难，体现出中士们的义气和气节。为了主持正义，不怕丢官。许之渐被罢黜之后返归故里，与名画家吴渔山（也是汤若望的朋友）文酒相娱，过着潇洒的田园生活。二人相视莫逆，订文章笔墨之交。直到汤若望案件平反之后，许侍御才官复原职。

汤若望的另一位友人名王徵，号了一道人，又号离叟，字良

---

① 对这件事的实情，陈垣先生认为：“其序实非之渐所作也”，详见《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1982年版，第238等页。

② 张宸《平圃杂记》。

③ 同上。

甫。陕西省泾阳鲁桥镇人。生于 1571 年，卒于 1644 年。虽然他 24 岁便中了举人，但并没有从此步入得意仕途；反之，他二十多年未有亨通之官运。这与他偏爱自然科学及小制作有关。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受人鄙薄。他描写自己“居家时不务正经学业，喜做人所不做之事。”这正是他九上公车而不遇的根本原因，待到他终于中进士时，已经 52 岁了，这才被派任广平（今河北永年）及扬州任推官。

由于陕西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又加之景教碑在这里出土，来往的东西人士云集，谒碑者不断，所以王徵早年就结识了一些西方人士。在赴京应试之际，又与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金尼阁等人接触：“丙寅冬，余补铨如都，会龙精华、邓函璞、汤道未三先生。以候旨修历，寓旧邸中。余得朝夕晤请教益，甚欢也。”

王徵自幼聪明而手脚勤快。少年时代受到家中熏陶；其父王应选是乡村教书先生，尤其善长算学，是位颇懂些自然科学的儒生。王徵儿时与他舅父接触也较多，这人手巧，会制作各式器械，这样，他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和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但学问日益渊博，实际操作本领也远近闻名。如学习拉丁文方面，他属中国的首学者。正因为他在拉丁文方面下过苦功，才使他有条件协助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kolas Trigault, 1577—1628 年）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金氏在徐光启的学生韩云之帮助下已初编成此书，王徵为他补写了《西儒耳目资释疑五十一款》，编排在全书开篇。还写了《三韵兑考》，即对明代的洪武正韵、沈韵与等韵作了分析考证，也收入耳目资的第一卷。编纂此书的初衷，在于帮助西士学中文，既可按音查字，又可按字查音，因之对耳与目都起辅助作用，故名“耳目资”。但它产生了编辑者始料之外的开拓作用：中国的汉字第一次用拉丁字母注出了读音，

为后人设计种种汉语拼音方案开创了第一个模式，它在音韵学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西学者在语言研究方面的第一次成功合作。王徵也是出版刊印此书的支持者。他的态度，反应出他有着促进文化沟通的强烈意识，因为他已具有一种朴素的中西大同思想，他曾写道：“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侏离，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以为怪。一家之人而猥云文字之不相通也，忍乎哉？”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乃至感情，他积极地主张译介异域的文化精萃。

后来，他与邓玉函合作，著《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由邓口授，王徵译绘成书，在扬州刻印。书的题目所以有“录最”两字，是因为它的内容是从千百种新奇的西方器具中精选出来。他选择相当严格：“不甚关切民生日用者不录，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不录，器之工值甚巨者不录，重繁者不录……”等，唯选其最精妙者，因而这本书的价值也颇高。

汤若望在赴西安之前，在测算工作上已和这古城“打过了交道”，1623—1624年，他两次向户部尚书张问达提供月食预测的消息。1627年抵达西安后，协助在该城的塘坊街建造了教堂。他与王徵的接触，主要是在当时小有名气的“崇一堂”，这是王徵特地为来陕西传教的西洋教士们修造的。他后来著有《崇一堂日记随笔》，其名即来源于此。

他早年已领洗，教名斐伯理。他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由衷欢迎“汤道未寓此堂中，振扬天主教。”王徵本人也常去崇一堂拜访叙谈，听汤若望讲述一段段离奇有趣的小故事，有时听得留连忘返。他曾作过如下笔记：“余间一躬旨，每留连十数日，多闻所未闻。”后来他在那里看到一本记载圣徒修行故事的小书，发现汤神父讲的许多故事，出处就在这里。王徵因而对这书兴趣油然而生，非常想把它译成中文。但当他仔细端详这书时，只见“蝇头

西字，横行密排”，他只能望洋文而兴叹了。不过王徵并未因此而却步。他主动与汤若望商量，请他口译，自己笔录。汤若望爽快地答应了。此后，这件事成为他们两人每天傍晚不可缺少的一课。

对这段经历，王徵在《崇一堂日记随笔小引》中有过记载：“先生每夕坐间，为余译述西贤苦修会中奇迹一、二段，以为日课。”初稿完成后，王徵又下一番功夫加以梳理，使其成为一本文图并茂的小册子。这是二人融洽合作的成果，王徵珍惜这段互相切磋琢磨的乐趣与成绩，又为没能继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觉得译完的内容嫌太少，盼续译完毕，这时“先生骤承钦召，以修历人都行矣。”<sup>①</sup> 圣旨既到，无人能阻拦。王徵无可奈何，只得婉惜地同汤若望分手了。出于对这位学友的怀恋与情意，他一往情深地直抒过自己的胸臆：“倘天主佑我，俾道未先生重游旧地，续成全书，是余昕夕所视，顛而企望之者，不知可能如愿与否。”从王徵热切企望重逢的心情，可见他对汤若望确实情深谊厚，非同寻常。

王徵所以对西学有执着的追求，与西士能精诚合作，这与他的指导思想很有关系。他曾明确地阐述说：“古之好学者裹粮负籍，不远千里往访。今诸贤（西儒）从绝徼数万里外赍此图书以传我辈，我辈反忍拒而不纳欤？”<sup>②</sup> 所以他不仅感谢他们传来学问技艺，而且由衷愿结交西贤为友。对学问的看法，他的原则是“凡有济于世人，不问中西”。

笔者在这里把徐光启和王徵都作为汤若望的好友加以列举，但对于有人所持的“南徐北王”之说并不赞同。这种说法，是将徐、王完全相提并论，即认为他们“同是达官，同是对中国故有的道德富有根柢，而又同是信仰天主教，同时和耶稣会来华的学

<sup>①</sup> 王徵《崇一堂日记随笔》。

<sup>②</sup> 《崇一堂日记随笔》。

者做朋友”，同时研习译著格致数理之学，只不过“一个生在江苏上海，一个生在陕西泾阳，南徐北王，可说无独有偶。”<sup>①</sup>然而，徐光启在学术上的造诣与贡献，他在中国传播西学方面的开拓作用，他对明代皇帝的影响及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教会方面的支柱形象，凡此种种，王徵与之相比，还有相当距离。

还有几位中国学人，都曾在他们的笔下对汤若望的形象、为人或学识作过生动的描述。从其文字分析，他们对汤若望同样怀有相当好感，并有过不同层次的晋接。

陈名夏，这位鼎革时期经历十分坎坷的名人，与汤若望有交。名夏为应天府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sup>②</sup>明朝末年的兵荒马乱之中，陈名夏在逃难之中，曾避入宣武门的天主教堂，绝望之中，想投环而死，据说汤若望曾前去加以阻止，这样论来，汤对名夏是有着救命之恩的。顺治二年，他投降了清朝，任吏部左侍郎等职。居官北京期间，曾数次拜访汤若望。汤若望也曾回访。所以陈名夏写过一首记叙《西洋汤道未先生来访》的五言律诗：

“一日两命驾，过我松亭前。  
执手慰老颜，不若人相怜。  
沧海十万里，来任天官篇。  
占象见端委，告君忧未然。”<sup>③</sup>

从诗的字里行间看，两人还是有事相商，相处亲密的，如一日竟两次造访，而且“执手慰老颜”。陈名夏其人恃才倨傲，在朝

---

<sup>①</sup> 《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3—4月号《王葵心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特辑》。

<sup>②</sup> 《清史列传》贰臣传乙，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13页。

<sup>③</sup> 郭则澐《十朝诗乘》，台北影印本，第三卷第18页。据原引用者分析：“时百史当国，道未当有所讽，惜其不悟……”。



中树敌，特别是大学士冯铨受到重用后，他两人水火难容，因而节外生枝。他被人参劾为“南党”头目，罪名是“党首怀奸，情事叵测”。据说他曾斗胆说过这样的话：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事：留头发，复衣冠。清代严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众所周知的。陈口出狂言，当然罪在难赦——他被判死刑。据说他在临终前，很想与汤氏老作最后诀别。在被押往刑场途中，路过宣武门教堂，他看见汤若望门前的差役时，就大声呼喊：“汝主在否？”，对方答道：出去了。于是陈名夏慷慨决然地对汤的住所大声道别说：“我行矣！”之后他在城西被处以绞刑。关于陈汤相交的小故事，见诸谈迂所著《北游录》，谈迂一生爱好历史，矢志写一部当代史，为此他不辞辛苦，不顾饥寒清贫，成年累月，爬山涉水，寻访真人真事，搜集一切诗、文、日记，终于完成《北游录》（还有其他著作）一书，但原只有手抄本，1960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中对汤若望有多处记述。根据谈迂治学的严谨态度，他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

上文提及曾与许之渐文酒相娱的吴渔山，也曾在诗文中勾画汤若望的形象，如他的《读史偶述》中，反映出汤居京时的生活画面：

“西洋馆宇逼城阴，  
巧历通玄妙匠心。  
异物每邀天一笑，  
自鸣钟应自鸣琴。”<sup>①</sup>

吴渔山即吴历，号墨井道人，原籍江苏常州。他是才学出众的人。人称他为“名贤后裔，博物工诗。行履高洁……胸中既藏

---

<sup>①</sup> 程穆衡《吴梅村诗集浅注》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万卷。”<sup>①</sup> 他的诗集留传于世的有多种版本。他的画“妙年已成独步”。晚年还探索西洋画的技法，自称“晚年作画，好用西法”。他与汤若望又是一个忘年之交，这里是汤比他年长几十年。而他们的关系较近还有一层原因：渔山早年受洗。后来加入耶稣会为修士，1688年晋升为司铎。虽然这是后话，但作为信仰，它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出自共同信仰，自然他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吴渔山在华籍主教罗文藻祝圣的中国司铎中，是“名最显、寿最高、宣教最久”者，因而被视为中国天主教内的凤毛麟角。他们都曾是耶稣会中的佼佼者。吴渔山到晚年，还刻苦学习外国语经典，甚至为此多年放弃作画吟诗（自称“且断涂鸦并废诗”）。他也曾到澳门学道，所谓“试观罗马景，横读辣<sup>②</sup>丁文”，即写这些经历。可想而知，像他这样一个年轻信徒，对汤若望是很崇敬的，因而他笔下烘托的汤若望形象，也亲切惹人喜爱，写他蓝色眼睛，微红的皮肤，乐观的侃侃而谈的姿态，见诸吴历的七言古诗《通元老人龙腹竹歌》：

“通元老人来何方，  
碧眈颊面拳毛苍。  
手披地图向我说，  
指点西极天微茫。  
视彼万里若咫尺，  
使我不得悲他乡。  
京师公卿谁旧识，  
与君异国同周行。”

---

<sup>①</sup> 《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1982年版，第226页等。另参见《励耘书屋丛刻》等，下同。

<sup>②</sup> 原文如此。

……”<sup>①</sup>

作者与汤若望有直接的接触往来，并互为相好，可以以诗为证。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方以智与汤若望的结交往来始自他在崇祯末年任职京都时候。“方以智授翰林院检讨，任定王讲官。他出入禁廷，酬酢宫苑，披阅内府秘典孤籍，见闻更广。他又有机会结交德国入华传教士汤若望……讨论医学、天文，对人体解剖、脏象经络等新知识尤有兴趣。”<sup>②</sup>

方以智 1611 年生于安徽桐城，号曼公，字密之。此人才华横溢，但一生几度浮沉。他曾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科学家、官员，晚年又避世隐居，号高座道人，但仍是明禅暗儒，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所以他与西儒结交密切，是可以理解的。他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才子。政治上也曾有抱负，与陈贞慧、侯方域等四人参加过“复社”，因之有“明季四公子”之一的称号。但他始终不得志，学术上则很有成就。因为他一生博学广采，对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医学、物理、宗教、音韵都有研究。青年时就开始撰写《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正因为这样，他对西学发生了兴趣，早年就阅读了《天学初函》，拜访过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 (Francois Sambiasi)。方以智也曾译介过其他西洋教士的著作，如利玛窦的《星土分野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他对西学的接受与评介是积极的、批判的，而不是盲目地崇拜或排斥。在探讨学问上，他认为“受益莫如择友”，所以他愿同汤若望切磋天文学，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他的儿子方中通曾有记述：汤若望

<sup>①</sup> 参见《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9月19日。

<sup>②</sup>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任道斌、方以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8页。

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方中通，号陪翁，方以智在交游西士方面对儿子也有影响。他送儿子游学京师，向传教士穆尼阁(Nikolaus, Johann, Smogulecki)请教律算<sup>①</sup>。方中通在西学上也有造诣，并与汤若望探讨过历法方面的问题，他在诗中曾有所反映：

“有书何异域，好学总同情。  
因感先生意，中怀日夕倾。”

汤若望在与人接触之中还有一点相当惹人喜爱之处，就是他的性格开朗，谈吐爽直。比如有人曾对他矢志不婚感到疑惑不解，连皇帝也是在派人考查过他的私生活之后，才相信他的操守。而熟人当中竟有人直截了当地询问他：男婚女嫁，自古以来便是人生难以禁绝的情缘。娶妻育子，传宗接代，是中国人世代代讲究的孝道之一。中国人常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像您这样飘泊异乡几十年，没有妻室儿女，家中岂不断了宗嗣，灭了香火？

汤若望对中国友人的这类疑问并不忌讳，他反而作耐心的解释：“在我的故乡，人们也有类似的信条。一般的人也要组成家庭，养育儿女。可是虔诚事奉天主的人，如果也像常人一样，就得一身兼顾两面，那么在敬神方面，一定会有疏忽。所以我宁肯放弃个人私欲与家族的义务，专一侍奉天主。”若望知道中国人很崇尚节操，就又从这一角度加以说明：中国人不是很讲究守节吗？节妇必须为她的丈夫操守终生，就是订婚未嫁的处女，如果未婚夫死了，她也要为没圆房的丈夫守节，这种贞女受到人们称颂，有口皆碑。但他们不过是守小信于匹夫，而我们是洁身守信于天主，

---

<sup>①</sup> 《清史列传》卷17，第5442页。

传播圣教，为世上众生祈福，因此放弃自身的婚娶，这岂不是更高远的志向吗？

汤若望毫不隐讳地表述了自己的矢志，不但得到中国友人的理解与信任，而且愈加受到他们的佩服和敬重。

汤若望虽然已身为朝廷高官，但在与其同事接触之中，总是平等待人，关心体谅部下。他在钦天监中，虽身为监正，却能平易近人，体察下情，关心监员的冷暖温饱。他曾给皇上上过一道奏疏，要求给员生以膏火资助<sup>①</sup>。他还要求给在观象台直接从事台上观测的人员增加薪俸，以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由于汤若望为此反复奔走，终使这些人的俸禄、俸米有所增补。

无论寒暑晴雨，汤若望经常与同事们一起观测天象。观象台地处城隅，冬日夜半登楼，寒气袭人。汤监正亲身体会同事的苦寒，他特地向皇上申请了一笔专款，命人缝制了厚厚的御寒火氈，供值夜班的监员们使用。

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人活七十古来稀”。可是汤若望直到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他当时曾对自己的老朋友说过：“快七十岁了，但我没有任何衰老的感觉。”有的中国友人描述他：“七十老人颜如丹，碧眼长鬚古衣冠”。他的性情一如既往，仍是那么活跃热情，思路还是那么敏捷清晰，名气也在全国不胫而走。有幸到京城的人，很多都想拜会他。京师第一天主堂建成后，许多京师人士以及各省来的文人官员，都想一睹这西式建筑的风采，并亲自见见这名西域异人。所以那时来客络绎不绝，致使门前车水马龙。到了他七十岁生日那一天，他的宅邸又一次宾客如云。那是1661年5月1日，农历四月初一。京师的故友同僚们纷纷前来

---

<sup>①</sup> 参见《汤若望奏疏》。

祝寿，酒席宴上高朋满座。友人们题诗作赋，各显文采。他们盛赞汤若望在中国所建的业绩，高度评价他的工作、品德与为人。留下诗文的有在朝小有名气的几位贰臣，还有当朝新的进士等官员、文人，如龚鼎孳、胡世安、金之俊、沈光裕、薛所蕴、魏裔介等等。他们所写的有寿文、荫文、诗赋等，后来汇为一册，刻印成书，名《赠言合刻》，版本也传至汤若望家乡德国，保存至今。

作为赠言的首篇，录下了明万历进士金俊明所撰《七十秩寿序》，金氏为江苏吴县人，人称“激昂奇伟之材”，工诗及古文，善画花草。他的字画很出名，不少碑版出于他的笔下。但这位两朝大文人对汤若望不吝笔墨，他写道：“君子以治历明时，帝王顺天应人，必有精思博闻之佐，应运而生。穷神尽智，以成一代钦若之宪……”他称赞汤氏“学博不以长矜，识精不以市诡，名业尊显不以形骄傲……”

崇祯进士、大兴人沈光裕的诗对汤若望形象的刻画具有概括性：

多才多艺者，吾土谓周公。  
公欲教天下，自能超世中。  
劳谦无贵贱，晋接一西东。  
如此方称圣，无令愿落空。

博颡通尼父，修髯戒长公。  
千言明一向，万国域其中。  
旨出尔行地，历成吾道东。  
君精不徒与，我信岂诚空。

署名钱洛加者，在诗中称颂汤若望堪为人之师表：

吾师从西来，大道契无始。

.....

有此天际人，诚为国之瑞。  
吾师有三绝，财色与私意。  
吾师有双绝，治历与演器。<sup>①</sup>

这些诗赋反映并渲染了人们对汤氏的印象与评价以及中西士之间的交流和情谊。然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鉴于是处在“祝寿”这一特定的背景与场合下，诗文一味歌功颂德，千篇一律，笔墨色彩过于浓重，有些则显得繁缛、造作，因而难免落入俗套。有些渲染过多，则反而有失真情挚意。但总而言之，这本赠言合刻，既流传于中国，也留传于欧洲，颇受读者钟爱。

当我们在汤若望的交际圈子里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会意识到，他所交往的人，全非等闲之辈。从皇上、太后到赫赫名臣，或饱学之士，或诗人画家，总之均为一时人俊。当我们对这些人物以及他们与汤若望的交往情况作过一些了解后，不妨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汤若望氏在中国的社交活动中，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预期目标。他从一开始，就旨在打入中国社会上层，从而有力地施加影响，这一点他终能如愿以偿。他设想通过对上层与名人的影响，大刀阔斧地传扬天主教，使众多社会名流皈依天主教，这一点，却是收效甚微，也足可见，在中国传教是多么不易。他介入中国社会如此之高，如此之深，尚且不能奏效，那么，其他人更谈何容易呢？

其次，鉴于一系列事实，我们不得不肯定汤若望是具备与这类档次的人打交道所需的雄厚资本的。他资质超群，做事干练，阅历极广，同时又性格开朗健谈，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用汉语著书立说，这当然不得不使中国人称奇，敬重他，愿同他结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汤若望的交游，更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的

---

<sup>①</sup> 以上均见《赠言合刻》或《主制群微赠言附》。

特色，也更适当地估计其人的价值。

第三，如果汤氏在交游中只是一厢情愿，那么肯定是孤掌难鸣了，那他也不可能赢得什么友人。可事实刚好相反，中国上流社会，特别是博学多才的文人雅士，非常愿意并主动与汤若望交朋友。与他交往或多有接触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有求道者，即与他探讨信仰；有求学者，即向他请教西学；有好义者，即纯属出自友情，甚至不乏好奇者，为增长见识。他们的初衷，通俗地概括一句，就是从内心“看得起他”，试想，如果中国人见到一个异族之人；就以一种鄙视异类的心理对待之，那么无论他怎么好，国人都会敬而远之。但这不是中国的国情，起码此类人极少，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真诚自白是：“有书何异域，好学总同情”。他们对于异域的学问不是排斥，而是乐于接受。大多也不因狭隘的民族情绪而鄙薄异域来客，反而愿同他们探讨，在共同求学求知之中产生了感情的共鸣。

这种发生在异国人之间的交游，实质上已经超出了汤若望个人与这些人本身的私人交际范畴，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输通的需要。比如同汤若望交朋友的中国人，他们之间可能势不两立，可能出自不同派系或属多年敌手，但他们对于汤若望这名“西海之儒”却同样饶有兴趣，这种兴趣小到他的一根拐杖，一瓶佳酿，几块西点，大到他传布的教理、天学、历法、火器、建筑等知识，可见，这不是单纯对汤若望其人的兴趣，而是对异国风情，对异种文化的求知、向往和追求，是一种吸取文化的心境。这些正是文化沟通的必要条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与这种文化上吸取、并蓄、兼容的民族心理状态是不可分割的，这对人类文化的沟通是十分有益的。



## 第五章 清天子与洋“玛法”

陈垣先生以及以往的学者，都曾持有这样一个看法：汤若望对于清世祖福临，“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初，常常把魏征召到寝宫之内，访以得失。魏征性格爽直，知无不言。贞观一代，谏臣济济，其中魏征最为杰出，因而有“魏征十谏，已成贞观之治”的说法。他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唐太宗甚有启发与警诫。他还向皇上反复阐明这样的道理：“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汤若望对于顺治，是否也曾相助如此得力呢？我们应试从历史的记载中寻找有关的答案。

在为汤若望庆贺七十寿辰时，龚鼎孳<sup>①</sup>曾撰写了一篇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寿文，盛赞汤的德、才、品。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我世祖章皇帝赐之师号，爵以上卿。夜半受釐<sup>②</sup>，时席前于前室，宸<sup>③</sup>游多暇，亦辇降于丹房。东第之冠舄如云，圣方之问

---

① 龚鼎孳：安徽省合肥人。明代崇祯甲戌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曾被授“直指使”职务。顺治元年，因迎降清人被授吏科右给事中，二年后迁太常寺卿。后因曾为李闯王效劳，被人参劾，一再降职。

② 釐 xī，指祭过神的福食。

③ 宸：chén，原指帝王宫殿，引申拟指王位，此处可理解为皇上的代称。

劳日至。鱼水之合，鹓<sup>①</sup>行所稀，先生因是感激思知，誓捐形迹。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铤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sup>②</sup>

这段文字淋漓尽致地反映了顺治皇帝与汤若望之间频繁的往来，亲密无间的关系：一个是亦信亦宠，一个是忠诚无二。只秘陈手书一事，就是颇为感人的。顺治曾对大臣发过这样的感慨：

“你们只知道说我以大志、虚荣。而若望则不然，他的奏疏都是真诚的。每当朕阅读时，就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还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不爱我，只因禄利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求恩，他已以宠眷为满足。这就是所谓不爱利禄爱君亲啊！”<sup>③</sup>

汤若望去觐见皇上时，经常是同他谈黎民百姓的疾苦，并不提什么个人的要求。他所上的奏疏禀帖达三百多件，顺治从中选出一部分放在身边，以便随时阅读。甚至在外出狩猎时，也带在身边，抽空阅读。

顺治皇上与汤若望的关系如此密切，这自然是有一番来历的。他们从相识之初，就不同于一般的君臣。这种特殊的关系应该说始于孝庄文皇太后，即顺治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她是一位性行淑娴、聪慧而又政治眼光犀利的女性，出身于蒙古科尔沁部族。13岁时，被送入沈阳宫中，封庄妃，后成为皇太极的宠妃。由于她深明大义、富有理智和魄力，所以曾辅佐三代清初的君主，即皇太极、顺治和康熙。她历经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波，很有经验，并具魄力，因而对年幼登极的福临与玄烨都曾是皇室之内有力的支

---

① 鹓：yuān，传说中与鸾凤同类的鸟，这里比喻贤士。因传说此鸟非梧桐不栖，非练实（竹）不食，非醴泉不饮。

② 见《赠言合刻》。

③ 原文出自《Historica relation》第8页。译文参见《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柱，给他们以重大影响和帮助。为了顺治的皇权以及当时围绕皇权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孝庄也曾煞费苦心，并在关键时刻发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顺治登极之前，孝庄皇太后就为他操心婚姻大事，相中了她的娘家侄女，即其兄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吴克善提前把女儿送到宫中，为的是让她早些接受宫廷的礼仪方面的教育。只待佳期来到，便举行大婚之礼。不料这位女子突然生病，百般医治无效。孝庄文皇太后便想到汤若望这个多才多艺的人。她派宫女去向汤若望求药，当然没有透露病家的身份。汤若望对来者抱歉地说，可惜他手上并无药品。但给她送了一块圣牌，并嘱咐说，把这块圣牌挂在病家的颈上，祈求天主帮助她恢复健康。没过几天，她的病果然痊愈了。宫女带来了十分贵重的礼物，并代为表示深深的谢忱之意，还把病者身份的“谜底”泄露了：原来汤若望救助的是为顺治选好的未婚妻。可见汤氏这一功非同小可。孝庄皇太后除有许多赏赐之外，还表示愿作汤若望的义女。这正是后来皇太后对汤格外敬重的前因之一。既然若望被皇太后尊为义父，那么福临便顺理成章可作为汤的义孙了。这就是后来他称汤若望为“玛法”的起因（“玛法”是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父辈或爷爷）。这简短的两个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切关系了。认一位长者为玛法本也无需过于称奇，但与满人一般的“玛法”相比，这又是一位碧眼、金发、长髯的“洋玛法”，这是历史不曾相识的一件新奇事。

由于母后对这位西国人格外敬重，不将与他的关系视为普通的君臣，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亲眷，所以汤若望也自然成了年轻皇上身边的一位难得的，温和而又博学的长辈。小皇帝在他而前不用那般拘谨，不必被“皇上”这副架子所束缚，完全可以以少年的本来面目而出现，这就使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使他

们长、幼二人间有可能产生一种自然、真诚的感情。虽然他们一个是东方大国年幼的君主，一个是来自“极西”的年迈的远臣，但他们首先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在这种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中，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亲切的情感——一位慈善而又博学的老先生，和一名好学而又性格执拗的少年之间的忘年之交。

福临正处在渴求知识的年龄，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像汤若望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博闻多能的人，当然对他很有吸引力。西学方面的知识，当时中国人还是十分陌生的，因此格外感到新奇。福临对于天文、地理，特别是若望所熟悉的星象学问，都很感兴趣。他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好奇心，不断提出种种问题。玛法就一个接一个深入浅出地加以解释。这样有问有答，也就难怪说：“圣方之问劳日至”了。少年福临越发感到，玛法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问题都能予以答复，而且他的答案大多是闻所未闻的。

他们之间频繁地往来，每逢汤若望进宫，皇帝就命人招待他。不但不需预先禀报求见，而且免去三跪九叩之礼，并马上赐茶，赐坐。他们常常盘着腿，面对面坐在炕上，汤若望也练出了这个“功夫”。还学会怎么把长袍子遮在腿上。为了怕他受凉，福临甚至把自己的皮褥子拿给他垫着。每逢召见交谈之后，福临就命人驾马车送玛法返回住所。

天主教教理当然是他们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若望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不厌其烦地向福临讲述耶稣受难以及诸使徒苦修等故事，也向他介绍天主教的婚、葬、嫁、娶等礼仪和风俗。尽管少年福临曾听得入神，若望也始终幻想能给这年轻的君主洗礼，然而这一愿望却终难如愿以偿。

顺治也常常出入于玛法的住处。有时只带几个侍者，微服而

至。有时则在大队侍从护卫的簇拥之下，浩荡而来，致使若望宅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据魏特神甫考证，在1656到1657年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对此，《清史编年》也有详细记载，如：“顺治十四年正月三十日癸酉（1657年3月14日），顺治帝访钦天监监正、天主教士汤若望于其家中……顺治帝为庆生日（正月三十日），宴请王公大臣于汤若望馆舍。”<sup>①</sup>命在天主教堂前立碑也正是在这一天确定的。更有趣的是，小皇上到了玛法住处，不拘泥于皇家的规矩，完全同普通的访亲、探友一样，随便攀谈、进食，有时还向玛法要东西吃（任何人都是不敢随意向皇上提供食物的，这一点是可以想象的）。顺治到玛法住所作客的日子，对这个平时禁锢在紫禁城里的少年皇帝，简直可以说是难得的“解放”与自由的享受。

顺治元年，汤若望曾向皇上进呈他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及望远镜等。这些稀罕物在宫中引起了极大兴趣。宫中人不但对这种科学、精巧的洋玩意儿感到耳目一新，而且对汤若望其人的多才多艺有了了解，这也更引起顺治对他的敬慕。况且顺治本人也并非是个毫无才气的昏君，只不过登极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使他个人的许多雅兴、情趣都被压抑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棘手朝政的夹缝中，拨冗于他的嗜好。他浏览了大量汉文书籍，不但阅读了唐、宋乃至西汉、先秦的作品，而且“雅意古文，游艺翰墨，所绘山水丹青，颇得宋人三昧。”他除了阅读小说、戏剧之外，在绘画方面，传说他善长指头画。<sup>②</sup>后来，顺治还向汤若望赠送了他的绘画作品——两把自绘的扇子。这使汤若望由衷高兴。

---

<sup>①</sup> 《清史编年》（顺治朝）第一卷，第471页。

<sup>②</sup> 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自从中国文化、工艺品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对来自东方古国的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包括扇子在内的工艺品十分钟爱，这些远道而来的精工巧制的物件，价格昂贵，最初只有宫廷及达官贵胄才能享用。而若望所得的这两把扇子，出自满清皇上的手笔，又印有圣上御玺，自然是价值连城了。只是时光荏苒，不知这两件珍重的赠品是否流传在世。笔者曾在汤氏家族现存的三个支系中探询，可惜无人知道下落。

后来，为让福临能顺利地亲掌朝纲，若望也曾帮助他排除一些阻力，那是在摄政王多尔袞去世之后，宫中俗称作五爷的英亲王<sup>①</sup>很想自己再出面摄政，理由是皇上还年轻。各位皇族和朝臣都不敢站出来直言不讳地阻止，只怕得罪了这位皇叔，就连孝庄文皇太后，也感到棘手：她既想让儿子早日亲政，又恐怕她的小叔子那边节外生枝，使她为难。这时她想到汤公是一位耿直爽快的人，不妨求他游说五爷。这样皇太后正式召见了汤若望，委之以重任：让他将太后的意见转告英亲王。汤若望深知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鉴于事关重大，他本人也衷心希望年轻的皇上早日当朝理政，又鉴于往常皇太后对他的厚恩，汤若望毫不迟疑地为之奔走。

五爷听说汤若望来拜访，“欣然延入，礼遇甚厚。谈际，殷勤向若望叩问来意。若望素性直谅，即以实告。五爷默默不语者久之。若望乃乘机力劝五爷顾全大局，勿怀异心。皇上明年十五，例可亲政。百官和衷，国家之福也。说得五爷憬然大悟。即日上朝，

---

<sup>①</sup> 参见：萧司铎《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献县，1937年版，第278页。此页所写的是“豫亲王”，笔者引用了这一事实，但将“豫亲王”改为“英亲王”，因据历史记载：孝庄皇太后为儿子顺治的皇位，曾周旋于睿亲王多尔袞与英亲王阿济格之间。又据清史列传：豫通亲王多铎，太祖第十五子，四年进封为辅政淑德豫亲王。六年三月以痘薨，年三十六。就是说，他死于多尔袞之前，不可能继多尔袞之后再争摄政王之权。

倡率百官，疏请皇上亲政。从此人心大定，朝野翕然。”

顺治亲政后，对汤若望殊加恩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顺治八年八月（1651年9月），顺治颁诏加恩，汤若望连续获得皇上授予的三个头衔：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和太常寺卿，从而成为清朝的三品大官。

“顺治十年三月初二日戊辰（西历1653年3月30日），授予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以‘通玄教师’的称号，加俸一倍。”<sup>①</sup>为此，特颁一道盛赞汤若望的谕旨。第二年初春，又赐他以地亩，作为“日后窀窆之所”。

清兵入主中原时，顺治仍然稚气十足。1643年，在盛京举行登极典礼时，他刚刚6岁。第二年（即顺治元年），他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又到北京城南的圜丘祭告天地，告知满人已定鼎京师。这些礼节仪式，尽管他全然不懂，但有人指点，小皇上听人摆布也就罢了。但对他说来，真正的苦恼还在于从读书走向理政这一简直是痛苦的过程；据顺治本人说，他当时“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为此，他苦读了《四书》、《五经》、《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在这种时候，他迫切需要有人指点，出主意。可实际上，幼主完全被冷落了。据他回忆：“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sup>②</sup>摄政王多尔袞，完全不把福临放在眼中。非但如此，就连多尔袞手下之人也敢于公然对小皇上冷嘲热讽，找机会挖苦他。有一次，他们陪他狩猎，故意把他带上艰险陡峭的小路，小皇帝不得不下马步行，随从于是冷言冷语地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

---

① 史松、林铁钧《清史编年》（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8。

步行耶？”<sup>①</sup> 这样的奚落使小皇帝十分恼火，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当时多尔袞言出即法，颐指气使，初时称摄政王，不久改称“皇叔摄政王”，三年后又加号“皇父摄政王”。

“皇父”这一称号的来历可能与“太后下嫁”<sup>②</sup> 一说有关，即传说孝庄皇太后曾下嫁给睿亲王多尔袞。但迄今为止，这仍然是清史上的一个疑案。而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若确有其事，那么孝庄的初衷正在于以这种方式对付宫廷的权势斗争，以稳固她的儿子时时受到威胁的皇位。她拟以改嫁的方式，从礼俗上、心理上扼制多尔袞的篡位企图。所以即使孝庄真的下嫁了，也是她一番忍辱负重的苦心，无需多加指摘，也不必讳莫如深。孝庄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政治，这是一个伟大女性的果敢决策。她对皇太极的忠诚，正表现在她不遗余力地扶持两个幼主——儿子福临和孙子玄烨。况且，多尔袞与她成婚，也是符合满人习俗的：所谓“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当然这种联姻会给福临酿成难言之隐，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儿皇帝”。福临内心既恨这个皇父，但又奈何他不得。况且多尔袞在开国之初，也确实功业昭著。他也正因此“恃功专权，政令一出，生杀任情”，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乃至朝廷上下，包括百姓，“唯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

福临的心情与处境得到玛法的理解和同情。玛法竟敢于在他面前公开点出皇叔的专权，还私下向他预言：皇叔将不久于人世。汤若望说出这种话，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也足以说明皇上与玛

---

① 《清世祖实录》卷63。

② 关于太后下嫁一说，曾有文人留下这样的诗句：“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迎太后婚”。但这种以文学作品形式出现的说法，不足为证。而分析孝庄皇后本人对她死后安葬的处理，却能说明一定问题。她曾嘱康熙：“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可能因改嫁一事，自觉愧与太复合葬。另据蒋良骥《东华录》记载：“多尔袞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后半句很值得斟酌，因当时是无人敢于随便涉足皇宫内院的。



法之间的充分信任。可巧的是，时隔不久，摄政王真的遭遇一场暴病。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在狩猎时张强弩过力，伤内吐血，不久就死去了（1651年）。这使少年顺治对汤若望的话更加信服了，也更将他视为知己。

少年顺治奋发上进的愿望也受到玛法的鼓励。据顺治自己回述：“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即指多尔衮死去）方始观政。”这时，他才为自己连奏疏都看不懂而着急，才真正发奋念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专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sup>①</sup>

而汤若望正是一再劝谏他，作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君主，应该随时增益自己的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顺治在位期间，凡涉及重大问题，玛法对他一向是直言不讳的。他看宫中太监们的作风甚不入眼。他们气焰嚣张，令许多朝臣敢怒而不敢言。汤若望就直接提醒顺治不要让太监掌握过多的权力乃至专权<sup>②</sup>。这些劝告是相当有份量的。因那时大太监吴良辅在宫中的权势已相当可观。遗憾的是，顺治当时忽略了这样的劝诫，以至他后来十分懊悔，因而他在遗诏中谦虚地作了自责：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一罪也。”<sup>③</sup>

顺治死后，吴良辅被处极刑，与上述遗诏不无关系，也进一步说明汤若望当时对皇上所进是逆耳忠言。

① 《清史编年》第1卷，第411页。

② *Historica relation*，第241页。

③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402页。

顺治的性格倔强暴躁，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汤若望的劝解，他还颇能听得入耳。顺治十一年（1654年）国事纷繁，民间又发生了饥荒，饥馑流亡者不乏其人。东北的诸王贝勒平定未久，那一带局势并不十分安稳。在这种情况下，顺治却表示他要归省祭祖、谒陵。几位近臣出面相劝，但皇上概不理睬，执意前往辽宁。大臣们担心：万一发生不测，后果将难以收拾。可顺治说：他返归故里的愿望由来已久，如不能去，就坐不安席，卧不安眠，并轻率地讲：我走后，天下由你们掌管。年轻的皇上还没能真正领悟“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汤若望看到此事干系重大，因而也前来劝阻。他还说明，已经查阅过历书，出远门实属不吉祥。顺治听了玛法的意见，放弃了东北之行。此事不但见诸汤若望《回忆录》一书，而且在《北游集》中也有类似记载：“上之东巡满洲也，积念久矣。累为宗勋所留。去岁弥切。甲午春（顺治十一年）锐意四月往，通玄教师汤若望以象纬止之，面终未嫌也。”<sup>①</sup>以中西史料的记载相对照，可见其相互佐证，从而更可说明这一记载的历史真实性。

以上情景，正如龚鼎孳所评价的：皇上“独于先生危言极论，化吁咈为都俞。止辇转圜，欣然乐受。”<sup>②</sup>劝阻御驾亲征抵抗郑成功，更是明显的一例。

在郑成功（1624—1662年）的抗清活动中，顺治暴躁、怯懦的缺点暴露得相当充分。他的脾气平常就火性十足，动辄鞭扑左右。此时逢遇大的变故，越发难以自制。

1658年5月，被封为“南明延平王”的郑成功，势力已大大发展，他率兵自崇明溯江西上，已据4府、3州、24个县。7月2

---

<sup>①</sup> 转引自谈迁《北游集》，第373页。

<sup>②</sup> 见《赠言合刻》。

日，进围南京城，清廷为之震恐。面对这危难形势，年轻孱弱的顺治皇上，很担心这位鼎鼎大名的明朝“国姓爷”会长驱北上，直攻京城。因而他整日坐立不安，想退回关外，据守盛京。他的母亲孝庄文皇太后得知后，非常恼恨儿子的无能、无胆、无识，指斥他不该想丢失祖宗创下的业绩。这使福临恼羞成怒，突然暴跳如雷，拔出宝剑，劈开了御座，以示要与郑成功疆场上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这个局面使满朝惊恐万状，却无一人再敢出面劝解。因为皇太后的话居然无法使他平静下来，还有什么人敢于不自量力呢？

然而，万一皇上御驾亲征而又出了什么三长两短，那么大清的江山社稷将如何是好？在这危难关头，好几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想到玛法，纷纷来求汤若望劝慰皇上。若望当然明白这并非一件易事，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顾触怒龙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大胆向顺治进言了。当然这时皇上已平静些了，而玛法的劝告也真的奏效了。顺治最后放弃了亲自出征的念头，一场轩然大波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后来，镇守崇明的梁化凤率部偷袭郑成功军营，夺回城池，又乘胜进攻，大败郑军，这一风险才算最后消除。

皇帝和他的另一次谈话也很有意思，他问汤若望：“玛法，您说这是什么原因，朕的一些朝臣为什么那么懈怠，朕对他们已经是十分容忍了。”汤若望回答说：“陛下，我想原因可能在于，大家都想效仿陛下的所作所为。也许他们发觉，陛下对有些事也难免疏忽……”年轻的皇上听后显得有些窘，踱步走开了。但并没有处置他。以后反而对他比先前更亲近了。<sup>①</sup>这里可以看出，顺治

---

<sup>①</sup> 《Lebensbilder deutscher Jesuiten in auswaertigen Missionen》，Paderborn 1862，第232—233页。

皇上虽然尚没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但他还是肯纳忠言的，喜欢听人讲真话。

福临，这皇位上的少年，本来正值青春年华，加上宫廷骄奢淫逸生活的放纵，以及某些心怀叵测的太监的引诱，使他渐渐沉醉温情，常常嬉戏无度。玛法观察到这一点，很是忧虑。特别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中国宫廷这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习俗格外反感。他既然希望皇上皈依天主教，也就由衷希望他戒掉这种不良的习俗。但这种事在皇上面前，本来是难于启口的。这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于触及的话题。而汤若望出于“玛法”的身份，竟郑重其事地向他的皇帝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为劝谏他，着实花了一番功夫。

汤若望说：天主教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只有这样，才能家庭和美，生育繁盛，子孙健康，传宗接代。福临平常习惯了周围人对“天子”特权的灌输。他本人前后有三个皇后，十四个具有名位的嫔妃，如今竟要求他也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一点他根本无法理解。可汤若望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他的臣民作榜样。他还进一步向皇上讲述了“天主十诫”，如，作为教徒，要守瞻礼主日，要朝拜天主，惟独事奉他。若望特别解释了天主的第六条诫命：勿行邪淫。第九条诫命：勿贪恋他人之妻。福临乍一听，只觉得逆耳难熬。他拂袖而起，转身离开了这个房间。汤若望颇为担心，以为这回皇上真的和他动了气。没料想过了片刻，皇上转了一圈，又回到玛法身边说：朕以为，玛法所讲，天下人很难作到。汤若望于是强调，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作为一条严格的诫命。他的这番话不仅是就事论事，而且是具有弦外之音的。

顺治在刚刚亲政的那年秋天，便举行了大婚之礼。娶的正是上文提到的皇太后的侄女儿，蒙古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的女儿。顺治虽然身为至尊至上的皇上，但他也像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一样，

选后的终身大事，并不遂愿。“合番之夜，意即不协”。两年之中，皇后一直被“隐谪冷宫”。勉强到了第三年，福临提出“废皇后为静妃”，他向礼部下达了一条旨谕：

“皇后乃睿亲王（多尔衮）于朕幼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宫闱参商，已历三载，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顺治指责这位皇后“僻嗜奢侈，多猜嫉。”他认为自己喜节俭，而皇后好奢，使他无法容忍。

皇帝擅自作出如此重大决定，这惊动了满朝文武。大学士冯铨等十四、五个人出来劝谏，但他丝毫也听不进去。顺治十一年，他又聘了一位皇后，这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但皇上对她也较疏远。与此同时，顺治热恋上他的弟媳：这是他最年幼的一个弟弟——襄亲王博穆博古尔的妻子董鄂。她是满族大臣鄂硕的女儿。襄亲王不堪忍受这样的耻辱，既羞又愤，不久即身死。董鄂仅仅在为丈夫服孝满二十七天后，就被接到皇宫里。福临对于这个董鄂妃，确实可以说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了。进宫后，先册封为“贤妃”，一个多月后，即被晋为皇贵妃。顺治为此特地下了诏书。还颁布了皇恩大赦令，诏书写道：

“朕尊圣母皇太后，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予。逢兹庆典。恩赦特颁……”

董鄂进宫一年后，即1657年（顺治十四年），便生了一位皇子，这就是皇四子荣亲王<sup>①</sup>。福临对这个皇子十分怜爱，允诺以后立他为太子。令人遗憾的是：天公不作美，皇四子没过多久就夭折了。董贵妃由于过度伤心，原本娇弱的身子禁不住意外的打击，

<sup>①</sup> 魏特《汤若望传》中文版第323页记：董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此疑误。据清世祖本世年表：皇四子荣亲王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卒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日。

一病不起，仅二十二芳龄便过早仙逝了，时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地点是故宫中的承乾宫……

福临的这段“贪他人妻”的故事就此以悲剧告终。可见汤若望对他的告诫并非无的放矢。也许有人要说，顺治的这段爱情故事不该受到指斥，因为按照满族人当初的风俗（后来这些风俗有的更改），是准许“治栖”的，意思是许可纳嫂子、弟媳、侄媳、继母或婶婶为妻。然而，这应该理解为是在兄、弟、侄等人死后，将他们的未亡人纳为妾。而决不是当她们的原配偶仍健在之时，就爱恋她，甚至将其夫君置于死地。因而我们说，汤若望的话不仅极其必要，而且切中要害。这个结论仍可为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因为这段姻缘对福临实在贻害非浅。

董贵妃辞别人世之后，皇上痛不欲生。一是置大清江山社稷子不顾，只想自己去削发受戒；二是对董鄂厚葬厚殓，达到惊人地步。深深受宠于顺治的江南和尚茆溪森，被召到京城主持全部丧葬仪式。不但在董鄂妃生前居住的承乾宫举办种种繁琐的丧仪，而且还在景山寿椿殿内，大作道场。兴师动众，热闹非凡。对这一过程。茆溪长老在他留下的《茆溪语录》中作过详尽而生动的记述：

“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纲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敬，耑申供养董皇后，呵呵。”<sup>①</sup>

上引文中已称董妃为“董皇后”，这是因为她去世之后，皇上认为她“佐理内政、淑德彰闻”，特用追封，加之谥号，为“孝敬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不但由顺治皇帝亲自为她立了“董

---

<sup>①</sup> / 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页。

后行状”，还由大学士金之俊为她撰写皇后传记。为了让她在“另一个世界”不至于太孤单寂寞，要有人侍奉和陪伴，于是命数名太监与宫女殉葬。还谕令全国为董后举葬，平头百姓三天，官员一个月服丧。此外，还令八旗二品与三品官员轮流昇柩……

自从董鄂农历八月十九日去世，直至十月初八日，在这“七期”（每期七天）四十九天之中，各种大型葬事活动，顺治都亲临致祭，弄得疲惫不堪。加上悲伤过度，万念俱灰，已萌生的出家念头越来越强烈了。几年前，在他与汤若望的关系最密切时，顺治曾表现出对于天主教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出于两方面原因渐渐淡漠了：其一是他与汤若望的关系日渐疏远。由于他俩的接触，在中国历史上先例鲜见，既超乎寻常之规，又太频繁亲密，所以格外惹人眼目，招来不少人的嫉恨。朝中大臣纷纷出来谏阻：“诸臣以皇上频幸若望宅第，有褻至尊，上书谏静。”从此顺治帝惮于人言，微服私幸之事始少。当然他对若望敬爱的感情并没有变。每次召进内廷，与之晤语，仍然是“不拘礼节，如家人父子，异常欢洽。”但是，两人的接触毕竟少多了。

自顺治十三年以后，皇上与佛教僧人的来往明显增多，一说他受到董鄂妃的影响，据说这女子自幼颖慧过人，知书尤笃信佛教。特别是顺治十五年正月以后，由于董妃生的皇四子荣亲王早逝，顺治郁郁寡欢，于是从南方召来多名僧徒，并“广购佛像”，请僧人讲经。来者之中，有上述茆溪森的师父，浙江天目山寺的住持玉林通秀（1614—1675年），他又向皇上推荐了木陈道忞，号山翁（1596—1677年）。这三个僧人对顺治的影响最大。甚至使他相信自己上辈子也是出家人。后来他渐渐对禅宗笃信不疑。时常召上述长老师父到京，驻万寿殿，与他们谈论禅机。痛失爱妃与皇子的打击，加上僧人的潜移默化，使顺治渐渐难以自拔。这一点，他直到临终时才有所省悟，才看到自己不能自拔的惨痛后果，

故他曾在遗诏中加以自责：“端敬皇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兹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一罪也。”<sup>①</sup>

但最后的悔恨已晚，他在遁入禅机时，已一发不可收拾，他不顾皇太后等许多人的苦苦劝阻，下了决心，必要削发为僧了。对此，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留下了记录。他说：“皇帝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只是由于孝庄皇太后最后严厉训斥与百般设法阻拦，他才出家未遂。

当然，此事在细节上说法可能略有出入。另一种说法是：来自惠州的长老茆溪森为皇上净了发，并为他取法名“行痴”，因为皇上与这位老和尚从初次见面时，就谈得十分投机，自己选定由他为自己剃度。但事有凑巧，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刚好在这时抵达北京，听说自己的弟子竟敢为大清皇上剃度，怒不可遏，他命令众僧徒们堆起一大堆干柴，要把这个不肖弟子活活烧死。顺治皇上得知这一情况后，才勉强答应再把头发蓄起来。记载国师玉林琇事略的《玉林年谱》，对这一幕戏也作了诙谐、隐晦的描述：

“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寿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此文最可注意处，是相视而笑四字，盖是时上首已秃也。”<sup>②</sup>

这个场面，细细琢磨一下，也实在是相当滑稽的：一个秃顶的和尚，面对着一个刚刚剃秃了顶的万岁爷，不要说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就是有第三者在场，或今天的读者想象这般情景，也会令人忍俊不禁的。堂堂大清国君

<sup>①</sup>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402页。

<sup>②</sup> 《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页。



主，竟然要遁入空门了！足见皇子早亡，贵妃仙逝对他造成的内心创伤已难以愈治，佛教、僧人对他产生的影响已如冰冻三尺。

而这一切举动，对汤若望说来，却是一出悲剧。因为这光秃的头顶，意味着若望多年来所下的功夫，都付诸东流了。多年来，他要使这个中国皇帝皈依天主教的幻想，到此完全破灭了。到那时，汤若望抵达中国已三十多年，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无论是观测天象，制作历法，交结中士，或为皇上精心地写奏疏，讲教理等等，他的每一项活动，都是以最终能影响中国皇帝为目的。可惜，最后还是由一名和尚在这“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了。虽然剃度并没有最后成功，但顺治出家的念头却再也没有打消。这一切，说明他确实早已“彻悟”了。可惜汤若望直到此时此刻才对这一结局真正“彻悟”。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信念太虔诚了。他对自己寻求的目标孜孜以求，却没有反复掂量这一使命的艰巨性。其实，顺治早在为南堂题写御制天主堂碑记时，就已直抒其胸臆了：他明明白白地表示：

“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精一执中之理……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

问题在于，那时汤若望对顺治皇帝的这个表态，并没有透彻的理解，或者说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热烈愿望。当然这充分表现了汤若望“事神尽虔，事君尽职”的品德，体现了他始终不渝地履行耶稣会宗旨的一片苦心。若望对其信仰与矢愿赤诚固然甚是可嘉，但他身负的使命毕竟太艰巨了：东方与西方道德文化传统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使这样一位东方大国权力顶峰上的人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信仰，谈何容易呢？更何况他并非一个独立的孤零零的人，作为一个帝王，他与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不可能任凭汤若望这样一个外国人对她施加影响。

到此为止，清天子与洋玛法的缘分，只剩下最后一幕了。

顺治身染重疾了；痛失董妃的悲恸，频频举哀的疲惫，削发蓄发的波折，都是他羸弱的身体，萎靡的精神所不能承受的。他本来体质就弱，自以为只可以支撑到而立之年。不料经过这一连串的挫折与打击，他已日感心衰力竭，如他自己所描述：“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心譙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可以想见，他的身体已是弱不禁风。因而宫中对种种病邪严加防范。如宫里若有人出了水痘，皇上就得躲到宫外避难，称“避疹”。据记载，他在“己未冬十一月”，就曾到南海子暂避，因为“中宫染疹”。如果城里有水痘病人，四周就得用绳子围起来，不可随便出入，官员更是严禁入内，以防把病带到宫内。可见人们当时对这种病真是谈虎色变，却不料仍是防不胜防，越是怕，越是染上了——皇上得了天花，这个灾难般的消息弄得朝中上下惴惴不安。那时正值顺治十七年底，京城已在张灯结彩，但为了祈祝皇上平安度过大难，官里供奉了痘神娘娘。传统的过节风俗：已贴的门神，对联，挂的彩灯全部被撤掉。同时谕令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布了大赦之令。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皇上发着烧，卧于病榻之上。

然而，就是卧病之中的天子，也并没有忘记玛法，他派人到汤若望的住处，向他询问，在最后的时刻应该作些什么。若望让来人转告他：愿为他做一切该作之事，一定会给皇上以最后的帮助。

若望一直想去看望他。但皇上病笃之际，既不会上朝，也不会轻易召见臣属了。怎样才能再见一面呢？若望反复思忖之后，决定还是自己进宫一趟。顺治尽管已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但还是想见到玛法。太监宣旨召见，他们把汤若望带到养心殿，皇上示意免跪拜之礼，并命左右给玛法倒茶。若望以低微的声音，祷

告的语气，深沉地说：“要使这迷途的羔羊，重新走上归路……以往对后妃的过宠，实在是一种‘毒剂’，希望皇帝恢复健康之后，万勿重蹈覆辙。喇嘛僧人的话不可听信……”<sup>①</sup>

顺治默不作声，他还想与玛法谈些什么，但已力不从心了。只是以手示意送玛法回家。汤若望看出皇上确实已历日无多了，忧悒而归。他是顺治皇上临终前召见的很少几个人之一，更是唯一的外国人。

顺治勉强挨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天。在垂危之际，他趁自己一息尚存的几个时辰，留下了遗诏。他命近臣王熙与麻吉勒作了记录，二人连夜整理、抄写完毕，跪呈皇上过目。从这篇遗诏中可以看出，临终的顺治皇上，对国事忧心忡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了诚恳的自责，对利弊作了理智的分析。而其中一些，正是汤若望曾经力谏过的。

1661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七），顺治皇帝驾崩于故宫养心殿，可惜年仅24岁。<sup>②</sup>先在乾清宫为他设立灵堂，后又在寿皇殿（景山内）停灵百日，和尚道士日夜诵经。最后由他十分信任的和尚茆溪森为他主持了火化仪式。百日之后，被葬于北京东北部遵化县所建的孝陵，今也称清东陵。与他最宠爱的董鄂妃并葬，还有一名妃子——贞妃殉葬。

顺治共生过八个皇子，六个公主。可惜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嗣。两子已夭折，两个还在襁褓之中，可选择继位的只有皇二子福全和皇三子玄烨。究竟由哪位皇子继承其位呢？朝中意见不一。据记载，有内臣秉承孝庄皇太后的意思，去询问汤公的意见。这当

---

<sup>①</sup> 《Historica relation》，第298页。（《1581—1669年正教在中国传播伊始与继续》，1672年累根斯堡版）

<sup>②</sup> 另一说为：顺治未死，唯因董妃事伤心过度，而出家五台山，故东陵中顺治的墓为空坟。

然出于皇太后对汤公一向的尊重与格外的信任。因而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汤若望才有资格陈述自己的见解。恰巧皇太后及朝中一些要人与汤若望所见略同：他们都对皇三子玄烨颇为中意。也因为他已得过天花，足见天花这种病对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威胁。立嗣之事就这样确定了。

在清代乃至历史上许多朝代，皇位的更迭往往要伴随一场惊心动魄甚至流血的斗争。而这一次继位之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了。汤若望在这关键时刻，直陈己见，这对立皇子一事的及时、果断决策是不无裨益的。无怪乎后来龚鼎孳赞叹说：“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这位文人并进一步借古喻今称颂汤氏说：“如司马公之累表待罪，范忠宣之头须尽白。血诚轮囷。早见长虑，方诸古人，殆有过之。”

继承清世祖顺治皇上之位的，正是玄烨——后来的清圣祖康熙（1654—1722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后来他不但为汤若望所蒙受的冤案昭雪，而且身体力行，倡导西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顺治是满族人主中原、定鼎京师后的第一位统治者，他的业绩之艰难，可想而知。满族原是个游牧民族，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族。要想稳固其统治的基础，自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以开创基业。而大凡“开创之主，类皆英明权变，豁达大度，故能崛起一方，手定大业。独满朝之顺治，乃以童稚得之……福临自亲政以后，锐意图治，经营建置，不遗余力。其措施虽容有未当，而规模大略，粗已具备。青年为此，未可厚非也。”<sup>①</sup>

这是对年轻的顺治皇帝充分而公正的肯定。尽管上文提及少

---

<sup>①</sup>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388页。

年顺治时，涉及其性格与作为上的许多不成熟不妥当之处，但他那时毕竟还是一名“童稚”，后来，也不过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而以他亲政后，“亲宗万几，孜孜求治”的精神，是十分可赞的。而前期，诸位开国良辅对他的帮助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人中，睿亲王多尔袞在定鼎之初所效的大力是举足轻重的。其次还有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等满人。汉官当中，如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而除了这些满人、汉人之外，应该提及的，恐怕就要数“远臣”汤若望了。

要统治中原，这一历史发展的需要，构成了这位清朝开国天子与自荐上门的西洋人关系的背景。因为满人要开创新朝的基业，为证实“天运已新”，正需要新的历法。而汤若望正具备这方面独特的、出类拔萃的才能。所以顺治说这是“天生圣贤，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可见，若望在开国之初为清朝所作的贡献是及时、重要的，也是有目共睹的。既然上文所列举的满汉文武诸臣，后来纷纷受封加封，那么对汤若望加官进爵，也就大可不必多加指责了。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是相距天壤，褒贬不一的。这才酿成了汤若望冤案和他的一场惨痛的遭遇。汤若望作为有功之臣，又该怎么对待这些荣典呢？这包括对他本人的以及对他家祖孙三代的诰封。对这一切，汤若望本人取何态度为宜呢？

一说是，“不应贵此诰封”。但笔者愚见：这并不能取决于汤若望本人。在是否接受诰封三代这一事上，汤若望是被动的。假如清世祖无意诰封，若望的愿望就是再迫切，也是无济于事的。还有一层原因是：汤若望的目的是到这里传播天主福音，以至劝说中国皇帝皈依天主教。所以他一切行为的主旨必然是要取信于、取悦于中国朝廷。如果一味与皇上的意愿背道而驰，那么他如何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倘如此，他不但不可能如愿以偿，还可能连

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所以尽管他是教士，理应不婚不宦，但若望可以说是一名头脑并不僵滞的开明教士。看到在特定的异国环境里，“不宦”不能达到目的，也就随机而应变，步入了仕途。而他的宗旨仍然不变，只是通过仕途，以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传教的目的。总之，立誓不宦而宦了，此事是可以理解的，符合当时客观环境对他的要求。

但另外一事则更加引起人们对他声誉的争论，即收养义孙。他立誓不婚，但却认了一个孙子，而后，又“荫一义孙入太学”，这就值得商榷了。

当然，此事源于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格外宠爱：念他“矢志贞修，终身不娶。孑然羈旅，苦独无依。令其抚养一幼童。作为义孙。”后来，朝廷又降谕：“汤若望系外国之人，效力年久。原无妻室。不必拘例。其过继之孙汤士宏著入监肄业。”<sup>①</sup>这也是顺治的破格恩典。

就这样，汤若望收了他的门人潘尽孝的儿子为义孙，改名汤士宏。在他过了七十大寿之后，又接受了这一皇恩，送他的义孙汤士宏到国子监入太学。

如果说汤若望为官是出于不得已，过继义孙也非如此不可吗？倘若在世俗人，为了养老送终，传宗接代，那么还合乎逻辑，而在汤公，则大无必要。至于皇上施恩，特准这个义孙不经过国家考试就进入太学。对这种独特的恩惠，传教士则以不接受为妥了。靠品级，靠权势，靠“走皇上的后门”，使子孙荣升，这并不值得羡慕。如果汤若望当年回绝这一荣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sup>①</sup> 黄伯禄《正教事襄》，第43张。

## 第六章 中荷初交中的“通事”

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十三年（顺治）六月，国王（荷兰）……遣陪臣杯突高啮（Peter de Goyer）、惹诺皆色（Jacob de Keyer）赍表朝贡，并请贡道。经礼部复议……应五年一贡，由广东入。”

“得旨，‘荷兰可八年一贡，以示体恤远人之意’。”

从以上礼部的决定与皇上的圣旨可以看出，两者的态度存在一定分歧。当然最后必定是照旨行事。而且顺治皇上的旨谕中还写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

顺治皇上为什么没有采纳礼部的建议，为什么只准荷兰贡使八年来中国一次，这幕后有什么背景？是的，其间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655年3月，荷兰使团一行17人，携带大量贡品和其他礼品货物，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一心要打开对华贸易的途径。荷兰当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开展对清朝的商务活动呢？这还要从荷兰历史的发展上追溯。

16世纪前期，荷兰还处在西班牙的控制下，政治上与宗教信仰上都受到压迫，西班牙信仰天主教，而荷兰在路德时代即已开始宗教改革。财政上荷兰受到盘剥，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因而荷兰人展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1581年宣布独立，成立了尼德兰共

和国。历史上许多欧洲国家都是通过葡萄牙城市里斯本对东方进行贸易的。但后来西班牙兼并了葡萄牙，里斯本城也自然置于西班牙控制之下。西班牙人宣布，禁止荷兰人到里斯本从事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不得不自觅海外贸易的途径。

17世纪初，荷兰人占据了爪哇岛，驱逐了原来盘踞该岛的葡萄牙人，设立了巴达维亚首府（今雅加达），并以此为据点，在亚洲扩张他们的势力和商务活动。1622年，荷兰人试图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澳门，但未能遂愿，因为澳门的防御工事十分牢固。这时荷兰人意识到，要想大规模展开对中国的贸易，需要通过官方签订公开协议的办法，因而急于到北京去磋商。

而荷兰人恰在这一时期热衷于派代表去北京，也与卫匡国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卫匡国神甫（Martini, Martin 1614—1661）是于1638年赴亚洲，而于1643年到中国的。此时因为“礼仪之争”一事，受在华耶稣会的派遣，前往罗马作申辩的。但在途中被荷兰人劫往巴达维亚。驻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从卫匡国口中得知了中国发展的最新情况：清朝的建立以及与中国通商的可能性。荷兰总督很快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成为该公司可以利用的最新的的重要情报。卫匡国从巴达维亚搭乘荷兰海船先驶往阿姆斯特丹。此后不久，他的两本重要著作《鞑靼战纪》和《中国新图》相继在荷兰出版。这使荷兰人及时掌握了关于中国的书面资料，打算依据这些新情报，迅速拓开对华贸易的途径。

早在1653年（顺治十年），荷兰就作过第一次尝试，派使臣弗里德里克·谢德尔（Fredrick Schedel），乘“波伦尼斯”号航船到广州，与那里的两位藩王即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交涉通商事宜：“巡抚李栖凤见使臣既无表文又无贡品严词拒绝。两位藩王也劝使臣回去告诉巴达维亚总督，遵照中国的规矩携带表文和贡品，乘便贸易。使臣表示愿意马上派人回去备办表文和贡物，



并请允留几人暂住省城。结果，顺治皇帝以无表无贡，诚敬不昭，拒绝通纳。”<sup>①</sup>

第二次，他们在表文贡品上下了一番功夫，不惜工本，置办了一批丰厚礼物，以馈赠皇宫及各级官员。据悉，单是这一行人携带的货物行李，就需九百人搬运。这是指他们翻越大庾岭时所雇用的背夫，因为这行人北上的路线是经过广州到北京的传统贡道。他们“沿水陆驿道北行，沿途皆有水驿提供食、宿、夫、船。先从广州到三水，然后溯北江而上，到南雄州下船，再由州官征集夫役，把礼物背过大庾岭。大庾岭有梅关古道，向来是中原通广东的交通要道。所有经此道南来北往的客商货物，都在此经马背人驼翻越山隘……”<sup>②</sup>而从雇来九百个劳力搬东西这一点，也可看出荷兰官商队伍的规模。后来他们从江西沿鄱阳湖下扬州，经山东、河北赴首都。

1656年7月，这一使团抵达北京，这是中荷交往的开端。使团除彼得·德·高耶（旧译杯突高啮）和雅可布·德·凯塞尔（惹诺皆色）外，还有一位画家兼该团总管，名尼霍夫（Johann Niehof，亦译纽霍夫），此人的任务之一，是把中国所见的重要景观与场面，以速写的形式画下来，以真实地向荷兰方面反映。尼霍夫原来已是一名出色的画师，经他的一位担任市长的老朋友竭力推荐，而被筛选到这个重要使团之中。他在中国之行中，随手画了大量速写，归国后，又联系自己的印象把这些画加工为速描。以后又有人依据他的速写加以改动而制成铜版，印刷出来。这些画以后在欧洲流传甚广，成为欧洲人获得的最早的中国形象。可惜由于几经改动，并添加了加工者的想象，有些东西已走样了。尼

---

<sup>①</sup> 见《清代全史》卷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382页。

<sup>②</sup>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霍夫又根据自己 1655—1657 年在中国的经历，写下了《东印度公司荷使晋谒鞑鞑大汗》。此书于 1665 年出版。

汤若望参与了中荷初交中的这一外交活动，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荷兰人早在来华之前，就听说过汤若望和龙华民这两个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供职。汤若望是科隆人，该城毗邻荷兰，他也能操荷兰语，荷兰人又大多都会德语。所以他们之间似有些乡情。在荷兰使团向清宫呈递礼品时，初次面见了这名久违的同乡。尼霍夫对汤当时的形象作了逼真的描述：

“他是一位年龄很老，胸飘长须的人物，照满洲习俗，薙发垂辮，而着满洲服装。”<sup>①</sup>“礼部尚书和一位西洋通事一件件清点礼物，并询问荷兰人，是否这些礼物真是来自荷兰，荷兰国家状况如何等，这位通事就是有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他当时深得顺治皇帝信任，任钦天监监正。又因其谙熟西语，在清初与西洋各国来往时，常以他为通事。”<sup>②</sup>据尼霍夫刻画，当时汤在北京十分得志，并对他们很友好：说他坐一顶四人抬的轿子，还有几个神气活现的人骑马随行，使臣阁下一路上和这位耶稣会士不断交谈……后来他写信给使团的秘书，说是想请使团的人去他住处作客，但清朝人不允许。

荷兰使团于 1655 年 8 月 19 日向中国朝廷呈递了国书。国书不外乎两重意思，第一是修好：“奉贺大清国皇帝御体安和，万事如意……闻大清国皇帝每得大胜，做了中国之主，此皆天主选任之恩。我要来奉贺。”<sup>③</sup>

对于这样的奉承与修好言辞，中国皇上当然一向喜闻；但荷

---

①② 前引《〈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 38 页。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 4 册，第 377 页。

兰人国书中所表述的另一层意思，则不是皇上轻易能应允的，荷人要求：

“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一者是天主所定，一者各国规矩皆然，且令中国人民，兼得利益……”<sup>①</sup>

这一提法，直接触及到当时中国的海禁政策，自明朝，中国即封海疆，清朝继续推行不变。况且，郑成功在沿海势力的发展，正是顺治皇上心中一患，所以一直严查海外来船在海边的交易，唯恐海盗暗算。这样的大事怎会随便依荷兰人的愿望为转移呢？荷兰使团成员对此缺乏透彻的了解，以为完全是由于汤若望从中作梗，他们说：

“汤若望在礼部大进谗言，说荷兰人是海盗，生活在小海岛上，所带的礼物是抢劫来的，力劝礼部拒绝荷兰人前来贸易，因此礼部官员多次查问荷使，是否荷兰人没有陆地，像海盗一样生活在海上？所带来的礼品是否来自荷兰？甚至因同样的问题来问了九次。荷使凯塞尔甚至这样报告公司：‘由于这些神甫或耶稣会士的大肆诽谤造谣，我们被描绘得不像人，鬼不像鬼。’”<sup>②</sup>

然而，从汤若望的角度，与其这样公开地去礼部讲“同乡”的坏话，还不如在顺治皇帝面前施加影响。他所采取的对策，恐怕主要是后者。他作为“玛法”，完全可以在顺治跟前直抒己见。汤若望在这个事件上，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地位与作用。顺治帝对欧洲的情况，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的轮廓。他要听“荷兰概况”这一课，自然全凭汤若望讲述。汤若望正是抓住上述两点，大力向顺治灌输了自己的意思，而且，他所加上去的，都是“沉重的砝码”。

<sup>①</sup> 《明清史料》丙编，第4册，第377页。

<sup>②</sup> 前引《〈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42页。

他说：荷兰人一但在中国得有根据地，必将作军事行动。他们现在于沿途上，已经窥测了一切。任何一个地方一经朝廷指给他们为居留地，他们必先作军事防御工事。荷兰人“背叛了他们名正言顺的国王，从此他们行踪不定地漂泊在海上……他们无论住在哪里，都要修建碉堡，扩大他们的权势，并骚扰邻近的民族……”。<sup>①</sup>这些话当然是致命的：逆臣贼子与军事图谋两点，毫无疑问是任何国君所深深憎恶的。这构成了顺治不采纳礼部建议的背景。

但汤若望并没有完全左右事态的发展，也就是说，皇上并没有完全否决礼部的决议。这是因为顺治一则听取汤若望的介绍，另则还会听取他的朝臣的禀报。

当时，镇守南大门的是在清初开国建过功业的两个辽宁人，被封为平南王的尚可喜与靖南王的耿继茂。在荷兰使团入境时两位便予以接见，对他们产生了初步的良好印象，尚、耿二人在给朝廷写的奏折中认为：荷兰人携贡物上访，“乃朝廷德威远被，仁泽覃敷，是以梯山航海，愿觀光天化日，实兴朝盛事也……”<sup>②</sup>他们将这看作是“远夷景仰上国”的表现。而中国无论是朝臣还是皇上，在这种观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皇帝历来自称天子，乐于接受四海称臣朝贡，其指导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恰是出于这种正统思想，顺治帝下达了如下旨谕：

“贡使杯突高啮，惹诺皆色，虔修职贡，地逾万里，怀忠抱义。朕甚嘉之。用是优加锡赉。大蟒缎二匹，妆缎二匹，倭缎二匹，闪缎四匹，蓝花缎四匹，青花缎四匹，蓝素缎四匹，帽缎四匹，衣素缎四匹，綾十匹，纺丝十匹，罗十匹。银三百两，以报孚忱。”<sup>③</sup>

① Alfons Vāth; Adam Schall von Bell, Köln 1933, Kap. 1 P. 228.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4册，第382页。

③ 前引《〈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40页。

皇上不但没有把荷使拒之门外，反而有优厚赏赐。从“怀忠抱义，朕甚嘉之”这样的措词，可以看出他的十足的宗主国口吻，故自然愿意荷兰人以后再来朝贡，而没有完全接受汤若望的建议，特别是汤的奏折。汤若望不但口头上重申自己的见解，还不止一次地秘奏皇上，一是说荷兰人的货物，许多并非国货，而是在印度或其他国弄来的，说他们是受印度长官之派而来的（参见魏特书，下同）；二是明确表示：与其签订条约并让其使臣按期到北京来朝，是不合乎国家惯例的，只可给他们些恩惠，以表示皇上的恩泽。换言之，即打发他们离去了事。这一建议显然是相当偏激了，顺治皇上也没有采纳。

汤若望为什么对荷兰人抱有如此深的成见呢？这主要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荷兰人大多数信仰加尔文宗。这是由于继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发生了瑞士人约翰·加尔文（Johannes Calvin, 1509—1564）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苏格兰以及荷兰的声势尤其浩大，荷兰的新教信仰者于1566年前后毁坏过圣像，拆毁过教堂，因为他们从理论上不崇偶像，也不相信在圣餐中存在耶稣的真体血。这在旧教徒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天主教徒们对此行动恨之人骨。而新教的信仰和追随者，把这视为可歌可泣的改革行动。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1608—1609年形成的旧教与新教的两大对抗性组织，一直发展到1618—1648年殃及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汤若望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特别是作为已矢愿传布其信仰的耶稣会士，当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天主教的一切教规与传统，他与荷兰来客在信仰上的分歧是冰炭难容的，并不是什么“乡情”所能缓和的：“两派敌意极深，而且汤若望害怕，如果荷兰人像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那样也得到在中国贸易的权利，葡萄牙人独揽对华贸易的局而就会被打破，而这种贸易所得的暴利正是罗马天

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财力基础”。<sup>①</sup>而且，如果荷兰人在中国获得自由通商的许可，他们也会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新教，假使荷兰人的商务乃至教会势力在中国得到发展，势必影响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活动，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这一点，是汤若望及其耶稣会士们决不可能轻易退让一步的。

正由于上述原因，在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争夺澳门时，传教士们曾不惜赴汤蹈火地加入战斗。1622年，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为实现同中国通商，下令必须夺取澳门这个得天独厚的小城。6月份，荷兰舰队一行十余艘，大举向澳门发动进攻。葡萄牙人与之短兵相接，打得很激烈。

这里要插入叙述的，是当年恰逢汤若望、布鲁诺、罗雅谷等神甫逗留澳门，因而亲临战场、参与激战的故事。为了不给荷兰人以驻足澳门的机会，神甫们竟然都拿起了武器，与荷兰军人在阵前兵戎相见。

这些天主教耶稣会士们竟也是有勇有谋的，他们与葡萄牙人密切配合，首先占据了澳门市的一块居高临下的阵地，即位于市中心的小山，在山上架设了大炮。布鲁诺神甫发射炮弹几乎是百发百中。所以大显葡军之威。炮弹连续几颗落入荷军营垒之中，立即打乱了该军的部署。不少荷兰士兵或受伤或中弹身亡，剩下的人向海边逃窜。耶稣会士们且战且追。汤若望机警敏捷，一马当先，冲杀到最前面，一举捉住了荷兰军队的头领。

据悉，被俘虏的是一位荷兰上尉队长，身边带了六、七个兵卒，一行人同时落网。荷兰人对这一损失深感惋惜。所以提出了一个交换俘虏的办法：愿用他们手上的三百名葡萄牙人换取这一名军官——显然这是荷兰军队的一名“爱将”了。没料想葡方竟

---

① 前引《〈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42页。

然拒绝了，足见这个人物的格外重要价值，也可以从中看出，汤若望勇擒敌首，这一功劳也是非同小可了。他与同会的兄弟们，能与葡萄牙人并肩，舍身忘死，作这一白刃之战，从中可以窥见神甫们精神面貌之一瞥：鉴于信仰关系，他们与荷兰人不共戴天，与葡萄牙人生死与共，相互依据。

荷兰人损兵折将，当然很不甘心，但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败退下来。但他们即乘此机会占据了澎湖。到1624年，又将其势力扩展到台湾。

台湾岛自古便有中国人在上面活动。隋朝以前称之为夷洲。三国时曾有中国人率甲士上岛。1624年荷兰人强占台湾，已构成对中国的威胁。“至明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于明，乃以台湾借红毛（指荷兰人）为互市所”。本来“以为好而相假”，<sup>①</sup>但荷兰人再不肯轻易放弃此宝岛，直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用兵力把荷兰人赶走。而在荷兰人朝贡北京时，中国人对荷兰在这一问题上，正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可能再让荷兰人在沿海另觅泊船地点，从而把沿海的祸水引入内地。中国当时的海疆政策是十分明确的：“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这是中国海防的既定政策，不管荷兰人是否大馈其礼，不管汤若望是否从中作梗，这一封疆政策是不会随意改动的。海疆及台湾岛这些重大问题，是顺治决定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些自然不会与通商使臣面谈。朝廷只是以十分婉转的外交辞令，把荷兰人的“热切”愿望回绝了。

顺治的谕旨中写道：“但念道路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费可悯。若期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

---

<sup>①</sup> 孟森《清代通史》，香港1962年版，第144页。

一次来朝……”<sup>①</sup>“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

这样的措词，显得既“体恤远人”，又胸怀博大。中国皇上很会作文章，荷兰人碰了软钉子，十分沮丧。但客观的说，此事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各种因素交织，汤若望在其中施加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与行动已表现相当充分。但他并不能左右整个事态的发展。种种历史因素的作用决定了这一结局。

---

<sup>①</sup> 包乐史《中荷交往史》，路口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 第七章 传布教义

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理想,原始自圣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他一生历经种种艰辛,到东方传播福音。1549年,他踏上了日本九州的鹿儿岛,从而留下了天主教传教史上新的历史记录——他成为第一名踏上日本国土的西方传教士。在日本的实际经验使他了解到,中国在亚洲国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日本人称中国为“上国”,当他宣讲圣教福音时,日本人表述的一种见解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天主教确实有崇高的价值,文明的中国早就信奉了。”这使他意识到,要真正获得在亚洲传教的成功,一定要不畏千难万险,首先设法叩开中国的大门。

那时中国明朝实行海禁,严令:外国人不得登岸入境。连中国人飘泊洋外的,也要一一登记,办理繁琐的离境、入境手续。这时沙勿略抵达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岛,与中国的大陆隔海相望,却不能如愿以偿。由于长年跋涉,沙勿略积劳成疾,最后贫病交加,心力尽瘁,在1552年死于中国大门口的小岛上。他弥留之际,还虔诚地表达了宁愿为这一理想奉献自己的衷情。在他留下的信件中也叙述了他的遗愿:他“信赖天主的护佑,要向前去,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能进入中国。我高兴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

真正卓有成效地去实现这一理想的人,是利玛窦。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多年来已倍受各方面的赞许。他获得成功的诸种因素中,十

分重要的一点是，他很快就明智地悟出：西方的异物珍品，虽能一时令人叹为观止，但决非传教的持久依靠，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邦，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方面都已处于高度发展的阶段。艺术和科学有幸受到推崇，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晋升为国家官员。”<sup>①</sup> 在中国，真正受到普遍尊重的，是儒学和儒士。于是他决心不惜一切努力以跻身儒林。他开始奋志汉学，结交儒士，这才与徐光启等等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交了朋友。在信仰上对他们施加了重大影响。正因为这样，对利玛窦在这方面所创出的成绩，史家曾有如下评论：

“玛窦入京后，不数年，信徒至二百余，朝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辈，并服习其说，折节与游。玛窦能属文，常有所论述；其布教专斟酌中国习俗思想而调和之，故成就有足观者。玛窦又译述几何原本，乾坤礼义，测量法义等书，以授光启之藻等；是为泰西科学输入之始。盖当时士夫，对于宗教，非所信仰；特以西洋学术之精审，欲就教士研究之；而玛窦等亦以鼓吹学术为传道之方法，务与中国思想，不相抵触，期渐感化。”<sup>②</sup>

西方学术界也有类似的想法：“学术曾一度作为诱饵，但与此同时，学术也对宗教的真谛予以证实……到17世纪初叶，许多学者都对耶稣会士表示尊重和欣赏。这出自多方面的原因：由于耶稣会士们把有用的知识带入了中国；由于他们有严格的道德操守；由于他们看来在试图让中国人联想到自己的宗教传统。”<sup>③</sup>

此后，不但徐光启本人、其全家乃至后代，成为虔诚的甚至有作为的天主教徒，而且他的朋友圈中，也产生了天主教中举足轻重

---

① Anton Huonder, Die Verdienste der katholischen Heidenmission ... Aachen 1923, 第70页。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674页。

③ J. 让内特《基督教传抵中国》，1984年苏黎世版，第70—71页。

的人物，如杨廷筠和李之藻等人。

杨廷筠(1557—1627年)，号淇园，又号郑圃居士，杭州人。他笃信天主，为此在55岁时摒弃爱妾而领了洗。以后，在教案发生时，曾不止一次地保护过教士。晚年，又把杭州大方井自己的祖传莹地献给了教会，以致这里成为一块重要的传教士墓地。

李之藻(1565—1630年)，号凉庵居士，也是杭州人。他学识超群，对天文、地理、哲学、理、数、宗教、水利乃至音乐，都颇通晓。他所编《天学初函》一书，是对天主教的一个特别贡献。他还在自家宅旁建起小圣堂，以供虔修。徐、杨、李三人一方面在学术上与利玛窦等西士精诚合作，另一方面在传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早期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从他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利玛窦结交名士的成绩。

有一点遗憾的是，利玛窦在北京大约住了十年，但始终未能与万历皇上谋过一面。那时据说万历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除了太监和妃子之外，不与他人见面。因此，利玛窦就是再有本事，也无用武之地了，他和教士们无法找到劝化他的机会。

到利玛窦去世前后，中国的受洗者大约达到2000人。除了原在广州之外，继而在韶州、南昌、北京、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都先后开了教。

总之，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汤若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为天主教再建功勋的。据说，利玛窦卧病时，曾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当然你们要煞费苦心，也有很多危险的。”<sup>①</sup> 汤若望与当时抵华的另一一些传教士，正是步入了这座敞开之门。

在这一时期，大秦景教碑在西安的出土，对传教事业的进展起

---

<sup>①</sup> 云先、克鲁宁《西泰子来华记》，思果译，香港公教真理会1964年版，第241页。

了很大推动作用。“景教碑发现于天启三年(或云五年),或言长安民掘地而得,或言西安守埋葬死儿时所获。此碑在景教考证上最有价值,明季天主教士目为至宝。……细研碑文,既可见当时景教之盛,如寺满百城,法流十道等句。”<sup>①</sup>

这一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现使人们得知,早在唐贞观九年,就有阿罗本氏在中国传播过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这是由于唐代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如与波斯、大食等国都曾有诸多往来。明代人有感于碑文所记:既然早在盛唐时期这一宗教信仰已有广泛传布,那么在当代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认可便自然顺理成章了。

凭借这一有利的气氛,天主教的传播成效显著。这时,汤若望等教士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如果能使上层,特别是皇亲国戚乃至皇帝本人皈依天主教,教会定能取得势如破竹的发展。正是出于这层考虑,他们着重在这方面下功夫。如由传教士龙华民,给太监庞天寿授了洗礼。这对于传教紫禁城的意义不言而喻。汤若望本人先曾力求对崇祯皇上施加影响,他敬献《进呈书像》的用意即在此。这是一本羊皮纸书,绘有耶稣的经历和事迹,全书共150页,封底和封面各为一块轻巧的银版,全书精制考究。汤若望将原书中的说明译成了汉文,因而书上清楚地注有这样一行字:“崇祯十三年岁次庚辰孟冬朔后一日耶稣会士汤若望撰。”

汤若望还向明朝这位帝王敬呈了另一件珍品,即蜡制的三王朝拜耶稣圣婴的像。这些东西原来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备好要传教士们携来转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只是没有契机相送。后来汤若望有幸得到一个机会——奉旨进皇宫去为崇祯皇帝修理一架西洋琴,这是当年利玛窦进呈的。未料事后数年,崇祯皇上

<sup>①</sup> 《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突然饶有兴味地想欣赏西乐。但这架琴多年来束之高阁，琴弦需要重新调理。汤若望正是借这一机会使皇上感受到了弦外之音。这重重背景与当事者的用意，在《进呈书像》的前言中也有所表述：

“皇上留心钦若修改历法，录用余友邓玉函。未几，而玉函积劳身殒，上纳廷议徵望及望友罗雅谷继之。十余年来，赉予优渥。襄纶沛加，望等感恩图报……今年春，奉上传发玛竇所进西琴一具命望修整，并译琴座所载西文及考其意义。原系西古圣贤赞诵天主词章。望念大道弘传……圣天子勤勤问察，至意恐未尽当也，乃将本国西书一部悉译华文及天主圣像一函，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同修整原琴并进御览，而望另著有书像解略一册，附陈大要……”

下面的署名为：“耶稣会远臣汤若望译著。”

这本书，与绘图相配合，十分简略地叙述了一些教理，如对“天主”的解释，在“天主正道解略”一节中写道：

“天主者，天上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

汤若望译介这些天主教道理的章句，当然是寄希望于皇上对此发生兴趣，这些内容，正是基督教道理的核心。就连钢琴架上镌刻的一行小字，也是赞美天主的：Singt dem Herrn ein neues Lied.意思是：请你们为天主演唱一曲新歌吧！这正是上文所说：皇上“命译琴座所载西文”的内容了。

就这样，崇祯皇上不但欣赏到欧洲旧式钢琴的韵味，而且初览了《进呈书像》这部图文并茂的教理著述。然而，汤若望这一番功夫的结果如何呢？对此说法不一。

据《圣教史略》一书认为：由于汤若望1640年进呈了三王来朝像并上书劝毅宗信教，再加上宫里前后已有数人领洗。这一切颇使皇上动心：“皇上因左右不乏奉教之人，已习闻其说，阅若望奏本，颇为心动。虽未能毅然信从，而于圣教之真正，异端之无根，固已灼

有所见。有一事可证,时有以军饷乏绝告急者,皇上即命将宫中多年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军饷。远近哄传崇祯皇上弃绝异端,要奉天主教了。”

上文的作者,虽然甚为庆幸皇上的弃佛从西教的表现。但与此大相径庭的说法,也是不难枚举的。据《烈皇小识》一书写道: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徐光启,上海教中人,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供养诸铜佛像,尽行毁碎,至是悼灵王病笃,上临观之,王指九莲花娘娘,现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极力挽回,亦无及矣。”<sup>①</sup>

由此看来,有关皇宫中佛像的供奉与撤销的种种记载,确实出入较大。也有的说,佛像并没有根本撤掉,只不过是移动了地点:

“崇祯六年(西历 1633 年),乾清宫德隆殿所供神佛铜佛,尽移于朝天宫大隆善寺。”

“毅宗撤像之地,为玉皇殿、英华殿、德隆殿、乾清宫,皆万历以来建醮诵经之所。毅宗撤其像,则其时不建醮诵经可知。”<sup>②</sup>

总而言之,单纯地从皇宫之内佛像地点的变动来推断崇祯宗教信仰的变化是不妥当的。况且,汤若望等人以后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向明毅宗施加影响。故毅宗皈依天主教的可能是个很大的问号。“《汤若望传》引汤若望回忆录,于李自成之入京师,颇为愤惜。以为使非毅宗殉国,其领洗奉教乃旦夕间事。实则崇祯十三年前,毅宗尚有奉教之可能。十三年后,则悉反前之所为,去主教愈远。纵不遭李自成之祸,亦难期其为信徒矣。”<sup>③</sup>

① 文秉著《烈皇小识》,1967年台北版第51页。

② 王世德《崇祯遗录》。转引自:牟润孙《崇祯帝之撤像及信仰》,载《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一期,第64、65页(1939年)。

③ 同上,第69页。

然而,除了皇上本人之外,当时天主教在上层社会和皇宫中确实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太监庞天寿领洗之后,由他间接把福音传给宫中的命妇。这些几乎是终身被幽禁深宫的女辈们当然不可能接触外界的陌生人,更何况男性?由太监直接同她们打交道是名正言顺的事,故由太监继续传送这信仰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由此更可以看出为太监授洗的重要性。而传教士们向太监们传教,主要是利用了给宫内侍者,尤其是管理天文仪器的侍者介绍天文知识的机会。后来宫中建立了一个小教堂,宫里领过洗的人可以去作弥撒。据悉,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sup>①</sup>

上述这些传教方面的成绩,与汤若望神甫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的。教会方面对汤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评价。如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曾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sup>②</sup>

据教会1639年的年度报告说,汤若望“除了做科学工作和接待来访者之外,不仅在大教堂中,也在小礼拜堂中作弥撒,讲道理和听取忏悔。如果他不是体魄那么强健,能操那么娴熟的语言,他

① 参见: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②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资料 Jap-Sin, 第161, 228号, 傅汎济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信。

是不可能对此应付自如的。”<sup>①</sup>

通过这些书信报告我们可以看出,为了传教,汤若望当时是怎样孜孜不倦地工作,怎样日益取得显著成绩的。

对地方上的传教事业,汤若望神甫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陕西省等地。

在河北省,河间府逐渐发展为天主教的兴旺传教点,在这里的传教史上,也记录了汤神甫的到来。

1638年,耶稣会写往罗马的总结中,也报道了汤若望神甫在这年春天前往河北省传教的情况。这个地方地处河北省中部,在大清河及海河以南,由于河水常常泛滥成灾,对百姓贻害不浅,这地方既非理想的富饶之乡,也非地处交通要道,但却成为全省闻名的天主教传播点,成为众多教友的聚集之所。这与献县教堂的建立不无关系。献县距北京城只有300里路程,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古县城,其名来历与位于此地的汉代献王陵墓有关。献县天主堂属于河北省最早兴建的教堂之一。传说曾有一对富有的老夫妇,他们早年就在献县置下地亩、房产。老头儿原在朝供事,归省之后,别无他求,只矢志愿一心供奉天主。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贡献出来,用其在这地方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天主教堂。

汤神甫在1638年4月来到河间。其时正值“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春光。汤神甫在大堂讲道,附近县城村落的教友们,一一闻讯赶来谛听。听说这位西洋神甫将在此为人们授洗,这也惊动了远近的教友和乡亲,不少人起早贪黑赶来献县,以一睹这位碧眼洋神甫的风采。这一行中,汤若望共为五十多人授了洗。由于他的同志罗雅谷恰恰在这时去世,所以汤若望又急匆匆赶回北京,以主持罗雅谷的葬礼。

---

<sup>①</sup>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资料,文件号码 Jap Sin,第121号。



汤若望神甫的到来,在河间传教史上成为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一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天主教生活传统。每逢礼拜弥撒,无论严寒酷暑,教友们都从数十里外赶来。为了赶赴早弥撒,有的是手提灯笼、扶老携幼,披星戴月赶到教堂,有的则备好简单的行李,在前堂宿一夜。次日,与众教友一道,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接受圣体。

献县天主堂以后长期有主教坐堂,后来又配备起很大的图书馆。汤若望等人的多种出版物的原版、善本,也曾收藏这儿的图书馆内。以后,顺治皇帝颁赐汤若望的诏书原件,还有康熙皇上御赐的匾额“万有真源”的原件,都存放在献县教堂的另一大厅中。从那时起,凡有宗教的以及世俗的要人足抵献县城,都要前往拜谒,对皇上的手迹行礼膜拜。

19世纪末献县教堂重新翻造。此堂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在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教堂遭到一场致命的洗劫。红卫兵拉走了整整两卡车图书,作为“四旧”加以“横扫”,无疑,这儿多年收藏的、难以估价的文物,已绝版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文革”过后,不少人期望再找到一些东西的下落,但迄今所有东西渺无踪迹可寻。可以想见,这些东西或被“砸个稀巴烂”,或被大火毁为灰烬,或早进了造纸厂,这一笔文化遗产上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了。

80年代,这里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教堂内部设置也多重新配备或彻底修复,每逢礼拜,乡间大道上又可见到教友络绎不绝了。<sup>①</sup>

西安是汤氏抵华早期的传教地点。

汤神甫是天启七年(1627年)到达西安府的。当时那里的传教

---

<sup>①</sup> 此段部分材料为作者采访刘定汉主教及献县教友们时收集的。

气氛并不理想,传教没有适宜场所,教士没有下榻之处,老百姓对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产生过误解和微词。汤神甫靠他的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他在王徵的帮助下,先建造了一处小教堂。王徵慷慨捐出五十两银子,以支付建筑费用。小堂落成后,方便了附近居民前来作弥撒、听道理。以后这一带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神甫一人所付予洗礼的,那两年就有50名。以后教内教外人士纷纷捐助布教活动,没过多久,汤神甫又为建筑另一大教堂备齐了资金。经多方努力,一座新的教堂拔地而起。据悉,这就是西安城塘坊街天主堂的前身。这样,原来的小教堂用来专供女界使用,使妇女有更方便的场所参加弥撒。新堂的顶端竖起一个镀金的铁十字架。大堂内,正中安放了耶稣圣像,下面是祭坛。侧面还有一个小礼拜堂,里面奉有圣母玛丽亚的像,十分安详美丽。新教堂建成了,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颇感新奇,消息不胫而走,致使前来观望者络绎不绝,汤若望曾和蔼亲切地接待他们。

汤若望关于宗教方面的著述,包括由他撰写,经他译编,或经他参与校订过的,总括起来,大约有七、八种,即《进呈书像》、《主教缘起》、《主制群微》、《真福训诂》、《崇一堂日记随笔》、《哀矜行诂》、《灵魂道体说》以及《圣母堂记》。其中,《主制群微》与《主教缘起》为他这方面的力著。

汤若望作《主制群微》(Über die G<sup>ö</sup>ttliche Vorsehung)一书的立意,在于全面深入阐述天主教教义。天主教传入中国,虽然已非一日,但民间对这个宗教的认识,显然还属肤浅,或仅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当然是就中国的版图与人口而言),或因隔朝隔代而隔断了认识;正如《重刊主制群微序》中所言:

“天主教在唐称景教,景有大公加特力之义。在元称十字教。十字者,救世主耶稣之麾帜。合三者之称而究其理,在明曰天学。然则天学与哲学,其客观,其向界壹是以研索所以然为职志者也

……”汤若望作这部书，试图从宇宙万物的不同角度，说明“由天主主宰一切”这一他的核心观点：“盖即万有万物之固然者，推极于天主至大至公之所以然也……天主实即万有真原”。<sup>①</sup>

汤若望在谈及万物都受到一种主宰时，认为：“天下万国、各有定教、祭祀诵祈、概所不废、岂不以万物之上、必有主者、视听于无形无声、决赏罚、判善恶、一一不爽乎、彼虽不知孰者是主、奥夫主一或多、主无形或有形、主无始或有始、要莫不存戒谨之心者、且此心非由学得、率性而行、不得不尔、是必实有主者在上、而人为其属、故其性然耳、如实无主、则是其性自陷其心、悖理甚矣。”<sup>②</sup>

他还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造物者”的“灵”，如“能承万模，以成万体，万体之中，万性附焉。”第二，认为“凡造异体性之物者，必躬兼所造之微妙而蕴含之，今夫生者、觉者、灵者，体性各异，万有不齐，则造者之广智大能，从可知矣。”第三，认为造物者“其明悟爱欲，非复可量。”

有关《主制群微》一书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请见“传播西学”一章中所作的交代。《主制群微》的初版是1629年，在山西省绛州刻印。以后又曾出过两版，是由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龙华民和罗雅谷共同校订的。这三人以“耶稣会中同学”共署名，对此，在目录之末尾作了如下交代：

“遵教规，凡译经著书，必三次看详，方允付梓。兹并镌订阅姓名于后。”

《主教缘起》(Über den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一书，初版为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刻于北京。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天主教

① 《主制群微》重刊序，原署：乙卯四月马良序于京师培根学校。

② 《主制群微》卷之下：五，以世人同心微。

的起源。材料基本上是根据圣经旧约中所介绍的历史渊源。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天主确实存在。第二卷讲人的灵魂及性体。第三卷阐述人死后还会经受赏罚。第四卷讲述圣母玛丽亚及耶稣的降生。

对《灵魂道体说》与《哀矜行论》两书，汤氏只参加了校订。前一书是由龙华民撰稿。汤若望与傅汎济(Franz Furtado,即傅体斋)、罗雅谷一起校订。以阐述人的灵魂与躯体的相互关系为主。后一书是罗雅谷原著,汤若望与龙华民、高一志共订。

据陈垣教授在《重刊主制群微序》(即第三版序言)中说,他曾亲自见过(“仆所得见者”)的汤著还有《圣母堂记》,可惜笔者迄今尚未找到有关文字。

至于《真福训论》(Über die acht Seligkeit)又名《真福经典》一书,主要是根据新约马太福音第五部分加以解释。它以浅显的语言,阐述了真福八端的内容,如人对真福的寻求与误解,世界上真福何在,最终阐明,信仰耶稣才是求真福之道。

以上书籍在梵蒂冈图书馆均有收藏。

关于汤若望在华传教时期天主教发展的具体情况,各种资料所提供的数字出入较大,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妨多引用一些说法,以便互为借鉴与补充;据王戎笙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二卷中所列,明末到清初的这一阶段信徒发展情况为:

|               |          |
|---------------|----------|
|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 | 13,000人  |
| 1636年(崇祯九年)   | 38,200人  |
| 1650年(顺治七年)   | 150,000人 |
| 1664年(康熙三年)   | 248,180人 |
| 1667年(康熙六年)   | 256,880人 |

1667年,全国已有耶稣会士所设教堂159所,教士住院41处。<sup>①</sup>

魏特《汤若望传》中只统计了每年受洗人数:

“耶稣会传教士所付洗礼人数:

|       |                     |
|-------|---------------------|
| 1634年 | 2 870次              |
| 1637年 | 4 000次              |
| 1638年 | 3 504次              |
| 1639年 | 5 480次              |
| 1641年 | 5 400次              |
| 1643年 | 4 820次 <sup>②</sup> |

以上不含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所付洗礼的人次。关于中国基督教徒的数字,各方面统计数字出入较大。据贡道夫统计,1650年中国有15万基督教信徒,至1675年增至30万人。<sup>③</sup>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明季之世,奉教者逮数千人,及康熙初年,教士所到之处,信徒大增;广东有教堂七所,江南百余所。余省亦复二三十所,奉教者至达十万以上云。”<sup>④</sup>

由于汤若望那时被任命为北京教区区长,所以教会的发展与他的工作均有直接和间接关系。从总的趋势看来,这一阶段天主教的传布颇有成效,教堂增建,教友人数渐增。耶稣会传教士几乎每年给较多的望教者授了洗。

汤若望对顺治皇帝的影响,当然要比对崇祯的影响可观多了。清朝统治者虽然来自关外,但他们从主观上接受并继承中国传统

---

① 王戎笙编《清代全史》第二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② 魏特《汤若望传》,卷上,第196—197页。

③ Hubert Gundolf: *China zwischen Kreuz und Drachen*, Moedling, 1969, p. 107.

④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701页。

文化与思想,如相信天象关系到国家的治理,有好的历法则可以正确地测出天象,因而及时准确地获悉“天戒”。他们认为,帝王抚御万方,勤求治理,有赖于阴阳顺序,和气迎庥。清世祖与清圣祖因处开国伊始,对这方面尤其重视。汤若望正是凭着他在观测天象与治历著书方面的本领,获得了世宗的格外青睐。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这位满人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统治者结下了个人之间的美好关系,有了难得的直接接触的许多机会,这才便于他对之施加影响,这种机会是传教士们久已企盼的。他们到中国后,就曾苦心揣摩过中国人乃至中国皇帝的心理状态,利玛窦在写往罗马的信中就曾说过:“中国人和外国人少有往来,对于外国人常怀疑心,时常害怕,尤其是中国皇帝。唯一的明智途径,是慢慢取得中国人的信服,排除他们的疑心,然后再劝他们进教。”<sup>①</sup> 这一设想,正是由汤若望付诸实践了。

当然,汤若望的专注于上层,也与各教团有着不同的分工有关。在华传教虽然是由耶稣会在 1582 年首先揭开序幕,但其他教团不久也接踵而来。所以在 1632 年以后,即在多明我会、托钵僧等相继来到后,达成一项共识:耶稣会士主要是在中国上层,即学者与宫廷中传教,多明我会和托钵僧大多在下层民众中宣教。<sup>②</sup>

另一方面,从顺治皇帝本人的思想发展来看,他在信仰方面,在探讨各种宗教学问方面还是乐于去寻求去认识的。他把教士、和尚都请到宫中讲授,同他们作种种探讨。从他的思想烙印上也可以找到他受基督教以及僧徒的影响,包括年轻时受到来自汤若望的影响。例如,他经常对自己“痛自刻责”,临终时更是作了深深的毫不留情的自我兴师问罪。“他认为自己是有‘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

<sup>①</sup> 罗光《利玛窦传》,台湾学生书局 1979 年版,第 95—96 页。

<sup>②</sup> Claudia von Collani: *Studia Leibnitiana*, 特刊第 18 号第 11 页,斯图加特 1989 年。

之寄托,虚皇太后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所以不得不‘抒忱引咎’,并下令以后元旦、冬至、寿节时,‘天下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这种自我忏悔的性格,可能同他深受天主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有关。”<sup>①</sup>当然,这里所说的天主教的影  
响,基本上是指来自汤若望神甫的。顺治对汤若望在信仰方面的笃诚,是由衷信服的,称赞他“敬慎蠲洁”、“事神尽虔”,这是最好的明证。对于汤若望事奉天主的诚心,和殷实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传教精神,不仅是国君,而且连朝臣(包括不信教的朝臣)也是十分感佩的,大臣魏裔介赞许他:

“异端久溺虚无内,圣教还由敬慎来。

凜凜心源思奉事,昭昭帝鉴在胚胎。

堪怜愤愤多时辈,谁向洪钟叩几回。”<sup>②</sup>

由于学识与思想境界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赏识,治历的成就得到朝野的公认,才能与为人使皇上敬爱有加,这各方面的合力,才使汤若望把天主教信仰的传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京师第一天主堂的再兴建与御制天主堂碑记的诞生,这二者可以说构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传布的鼎盛时期,这段小史也是汤若望在华布教史上的骄傲。

顺治七年(1650年),“上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天主堂侧隙地一方,以资重建圣堂。”<sup>③</sup>这里所谓天主堂侧,是指原来利玛窦所建教堂的旁边。这个教堂起源在公元1605年,即明万历三十五年,是明朝皇帝特许修筑的。当时,明“神宗念其远来,馆饩之,礼遇甚厚。次年,复给以天主堂,即今北京南堂之起原也……”<sup>④</sup>此后利玛窦神

① 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编第一卷,第51页。

② 《赠言今刻》,魏裔介《题扇》。

③ 黄伯禄《止教本衷》第25张。

④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674页。

甫曾在这里传教十年。对这个堂的外观,《帝京景物略》一书曾作如下描述:“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廩,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sup>①</sup>

而在这个教堂的左侧隔壁,曾是京师开设最早的讲学之所,名“首善书院”。明朝人已很崇尚集体探讨学问,所谓:“天下不以人为守,人不以心为固,心不以学为明,乌可哉!”而当时“都门讲学,始首善书院。”这里的讲学活动,开始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阅月二十,至天启四年六月,讲罢。”然而这块地方,却仍保留为作学问场所——被用作研究历法的地方:礼部侍郎徐光启带领一批人,其中先有龙华民,后来又有罗雅谷和汤若望等众人,“借院修历”,“暂署曰历局”。为了与魏文奎等人所在的历局相区别,这里被称作西局。因而从那时起,汤若望就一方面在历局从事他的天文历法研究与著述,另一方面在隔壁的教堂中传教并作一切神事。

在明清两朝交替的动荡岁月里,汤若望曾与这块地方共存亡,这里为他的身心、事业所系。因之顺治皇上又恩赐在这儿建堂也格外有意义。汤若望对此欣然领受,他兴致勃勃地投入了建堂工作。

新教堂的设计构图,是由汤若望本人担任的。施工过程中,亦由他总监。为建新堂,孝庄文皇太后、顺治帝以及几位亲王都捐赐了银两。京城的一些官绅也予以资助。

圣堂图纸绘好之后,于1650年春正式开始施工。据目击者叙述:“顺治七年,岁在析木,日在鹑火,孟秋之望,肇国过从泰西先生所,闻匠石声叩之,云稍新堂构以事天主……”(弘文院刘学士赠天

<sup>①</sup>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国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153页。



主堂记,载《赠言合刻》)。这工程大约进行了一年,即告竣。新教堂命名为“无玷始胎圣母堂”,因而堂的正中供奉的是圣母玛丽亚像。在大堂正门的楣额上,刻下了《建堂碑记》,其原文如下:

#### “都门建堂碑记

自西汉时。有宗徒圣多默者。初入中国。传天主正教。次则唐贞观以后。有大秦西教士数人。入中国传教。又次明嘉靖时。圣方济各入中国界传教。至万历时西士利玛窦等。先后接踵入中国传教者译有经典。著有书籍。传衍至今。荷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历务。告竣。谨于都城宣武门内。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时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为大清顺治七年岁次庚寅。

#### 修正历法汤若望记”

据刘松龄神父寄往欧洲的信件描述:汤若望设计的北京教堂壮美、舒适而且宽敞,还富有中国的风格。<sup>①</sup>大堂落成后,顺治皇帝御笔亲书了“通玄佳境”四个字。人们恭敬地送往南堂悬挂,各方人士前来致贺。北京城南一带,瞻仰者络绎不绝,赞叹声不绝于耳。

据记载,当时在教堂院中还建有天文台、仪器室后院还设有藏书楼。“原堂前有大理石牌楼一座。楼之里面署曰:‘此楼专为虔事天主敬礼圣母而建。以昭感谢之诚’”<sup>②</sup>。谈迁在游历京城时,也作了类似的记载,他曾亲自到南堂一览,见到汤若望本人,并登过楼。他写道:

“癸巳。晨入宣武门。稍左天主堂。访西人汤道未……年六十

① 《Welt Boot》Pater Hallerstein; 刘松龄神父信件,1743年写于北京。

② 《燕京开教略》,1905年教世堂印制。中篇第21页。

有三。霜髯拂领……登其楼。筒平仪、候钟、远镜、天琴之属。钟仪具铜质。远镜以玻璃。琴以铁丝……其书叠架。茧纸精莹。劈鹅翎注墨横书。自左而右。汉人不能辨。”<sup>①</sup>

然而，恐怕汤若望神甫也很难预料，在他离世之后，他亲手建起的教堂，比他本人还要经历更多的磨难：

教堂曾两次蒙受火灾。其中较严重的是1775年（乾隆四十年）2月13日一场大火的吞噬。旧建筑群几乎焚烧一尽。由乾隆皇帝赐银一万两，以资重建。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重建的教堂再次受到损坏。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次重建。工程延续两年，1904年新堂落成。其门面是古朴庄重的青砖色雕。花纹仍保留了旧堂的巴洛克建筑风格。堂顶为拱券形。堂中共有十四根方形立柱，排列成两行。整个教堂看上去气派雄浑。大堂两面窗子上镶嵌的各色彩色玻璃，给大堂平添了一种庄严而堂皇的气氛。

然而，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南堂不得不又一次罹难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造反”者们潮水般涌入南堂。目击记回忆说：祭坛上的摆设都被砸坏了。管风琴被从楼上一块块扔了下来。更有“勇敢者”爬上大门正面的青砖墙上，去捣毁上面的装饰和门楣上的拉丁字母。神职人员被驱逐了。教友们再不敢进堂作弥撒。<sup>②</sup>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京师第一天主堂面目全非。几年之内，这里竟然成了一片荒疏之地……

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终于过去了。南堂有幸再次得到修葺。1979年，它被确认为首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这堂成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府，也是天主教爱国会的所在地。弥撒活动在此频频举行。

---

①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1版（纪邮上），第45—46页。

② 以上是笔者访问目击者Z先生时，听他作的回忆。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教友前往拜谒，旅游者们饶有兴致地观赏南堂的雄姿，聆听它的曲折的、起伏跌宕的历史。这一切对于汤神父的在天之灵，莫不是最大的欣慰……

顺治皇上敕建天主堂落成之后，这位皇上本人曾多次光顾，与汤若望促膝而谈。公元1657年，这位清世祖御赐了《天主堂碑记》。

碑身是一整块白色大理石，高两米余，宽近一米，厚度约三十三厘米。碑的顶端、两侧及碑文的四周，都刻有飞龙和云朵。碑记全文如下：

#### 御制天主堂碑记

易序卦。革而受之以鼎。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鼎之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是以帝王膺承历数。协和万邦。所事者。皆敬天勤民之事。而其要莫先于治历。定四时以成岁功。抚五辰而熙庶绩。使雨暘时若。民物咸亨。道必由之。矧开创之初。昭式九围。貽谋奕叶。则治历明时。固正位凝命之先务也。粤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农分八节。黄帝综六术。颛顼命二正。自时厥后。尧钦历象。舜察玑衡。三统迭兴。代有损益。见于经传。彰矣。而其法皆不传。若夫汉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时。俱号近天。元历尤为精密。然用既之久。亦多疏而不合。盖积岁而为历。积月而为岁。积日而为月。积分而为日。凡物与数之成于积者。不能无差。故语有之曰。铢铢而称之。至石必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况天体之运行。日月星辰之升降迟疾。未始有

穷。而度以一定之法。是以久则差。差则敝而不可用。凡历之立法虽精。而后不能无修改。亦理势之必然也。<sup>①</sup>自汉以还。迄于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创法者十有三家。至于明代。虽改元授时历为大统之名。而积分之术。实仍其旧。洎乎晚季。分至渐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学者。雅善推步。于时汤若望航海而来。理数兼畅。被荐召试。设局授餐。奈众议纷纭。终莫能用。岁在甲申。朕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创制历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命时宪。颁行远迩。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仍赐以通微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城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饗所储。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见之。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赏涉猎。而旨

---

<sup>①</sup> 魏特《汤若望传》第315页没有录以上这段文字。经实地查证，这段文字确实是存在于碑上的。

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微佳境。而为之记。铭曰。大圜在上。周回不已。七精之动。经纬有理。庶绩百工。于焉终始。有器有法。爰观爰纪。惟此远臣。西国之良。测天治历。克殫其长。敬业奉神。笃守弗忘。乃陈仪像。乃构堂皇。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矜式。

顺治十有四年岁在丁酉二月朔日。”<sup>①</sup>

顺治帝这篇碑记言简意赅，综述了汤若望来到中国后的经历，回顾了中国天历简史，表彰了汤氏在治历上的突出成就，从而表明这正是皇上重用他的原因。最后写下了皇帝本人对他的评价。碑文中也明朗地表述了顺治对天主教所持的态度。这一篇经过字斟句酌的洗炼文字，不但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而且蕴含着浓重的感情色彩。这一碑记是经得起后人的推敲和历史的考验的。

---

<sup>①</sup> 此碑今在北京南堂仍可见。但碑顶部与基部已严重损坏、残缺。加之天长日久，日晒雨淋，碑身已经严重风化，字迹因之模糊不清了，笔者经悉心辨认，琢磨，并与有关文献作了核对，录之如上。

## 第八章 冤狱与昭雪

两个不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是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汉唐之间儒释两道之从诋诌到融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之从矛盾到调和，皆有相互启发之效用。儒家传统亦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有所警悟以及变化，传衍中兼有化生，因而再发一流，更进一境。

“当然，在两种不同文化接触的初期，因误会与成见而产生争持抗辩，甚而至于冲突逼迫而流血者，亦在所不鲜。”<sup>①</sup> 汤若望正是在清初的历法之争中险些喋血于京城的一个人物。

汤若望的晚年遭遇，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前面曾叙及他与中国士大夫间美好的晋接，这无疑给他的生平事业锦上添花。但两种文化的冲突，同时给他的生活经历投下了阴霾暗影。

“在中国士大夫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误解的、不友好的看法以及难以核实的批评也是始终存在的。基督教因被视为非中国的、外来的权威教条之物而被疏远，乃至被看作是文化侵略的一种现象……”。<sup>②</sup> 汤若望就曾被视为这样一种从事颠覆活动的角色。

作为一个外国人，汤若望在中国获得的尊重与荣誉，帝王的恩宠和高官显位，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然而另一方面，他晚年在中国不幸遭到的挫折与磨难也是鲜见的。

---

<sup>①</sup> 参见《九州学刊》第3卷第1期，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编。

<sup>②</sup> Claudia von Collani: Die Figuristen der Chinamission, Frankfurt/M., 1981, 第52页。

自清世祖亲政后，“玛法”的地位有如青云直上，不仅自己连升几级，而且父祖三辈，接连受封。尽管远在大洋彼岸科隆市的沙尔家族还迟迟未能得悉中国皇帝的特别恩赉，尽管汤若望的祖父与曾祖们，终生没有福气感受与歆享中国皇上的厚恩，然而在中国本土，这一切在社会上，在人们心理上所激起的浪花，足以酿成一场轩然大波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汤若望已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个“长须碧眼”的异类，竟身着绣鹤朝服，出入于宫廷内外，独掌钦天监大印，钦天监中上上下下大小七十名职位，听凭他调遣。修改历法，也由这名洋人主持，这在一些人看来简直不成体统，确实难以容忍。他们心中的嫉恨与怨气，与日俱增，到头来，终于难以再按捺下去。这场风波的爆发早已有先兆。而这场恩怨，不仅涉及历法，也涉及宗教信仰、新与旧、国策的开明与保守、国家的开放与封闭，这是一场政见之争，一场矛盾交织、错综复杂、生死攸关的斗争。

当然，汤若望出任钦天监正之后，在采取某些改革措施时，也难以避免地直接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反对他的人始终不断，只是一时还未酿成大气候罢了。比如，他撤销原回回科的作法，就为日后的大难埋下了隐患。原担任回回科秋官正的吴明炫与吴明烜两兄弟，<sup>①</sup>就是革新的坚决反对者，他们“素嫉西士能，处心积虑”。这两个人出身于穆斯林天文工作者世家。据他们自己叙述：“臣祖默河亦里等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随开皇己未抱其学泽来朝，

---

<sup>①</sup> 另一说认为：吴明炫与吴明烜实为一人。见：黄一农《吴明炫与吴明烜——清初与西法相抗争的一对回回天文家兄弟？》，载《大陆杂志》第84卷第4期。作者认为：两人为兄弟之说——虽见诸《清史稿》，“但经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属清史馆的传包及传稿中，并未发现任何支持此说的原始资料”。“作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在顺治末攻讦西法但遭失败的吴明炫，于康熙即位时，或为避帝讳而主动更名为明烜，并在杨光先掀起‘历狱’时重获起用，但由革职前原任的回回科秋官正升任监副。亦即明烜即明炫。”（该文的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授为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sup>①</sup>这样一个天学世家的子弟，一朝被革职，其心中的不平，可想而知。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们就上疏举报汤若望的天算错误，如“遗漏紫气，颠倒觜参……”等等。在奏疏中，他们指责“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但他们却都已观察到水星的出现。为此，皇上命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仍然不见。这样，吴绛炫上告未成，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虽说吴氏初告没有成功，但这些事实说明，汤若望的地位正被人撼撼，只不过撼之未动而已。

汤若望的另一名劲敌是杨光先。

杨光先字长公，是安徽歙县人。家中世袭新安卫官。后来他把世职让给了弟弟杨光弼，自己作为“布衣”闯到京城。因为弹劾武举人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sup>②</sup>然而史书对杨光先其人的评述，也是毁誉各异的。

据悉“光先的亲长除武事外，亦颇重学问……光先亦尝称其父‘日严督臣读书’。由于在中国古代兵学著作中，常夹杂与天文、星占、禳择、卜算等相关的内容，并为武官应具备的基础知识之一，或受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光先对天算、术数之学亦颇多涉猎，提供了在清初与天主教天学家抗争的论据基础。”<sup>③</sup>

他的一生也是数经浮沉的。明末，在崇祯有意广招人材时，经人推举，他这个武将世家出身的人已经马上准封为“大将军”。可惜他武运不佳，恰在这时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杨光先施展其才能的机会遂成泡影。所以到后来，他还是仍以较为浅薄的天学知识为官。

① 《清史稿》：《时宪书》。

② 王士琦，《池北偶谈》卷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3页。

③ 转引自：黄一农《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



对于他的脾气秉性，他自己曾经毫不讳言地加以描述：“与人言事，无论兵刑礼乐，上下尊卑，必高声怒目，如争似斗。”<sup>①</sup> 这一点，与彭孙贻《客舍偶闻》当中的叙述似相吻合：

“歙人杨光先好高论大言”。关于他与吴明烜的关系，该书也曾有过交代，因杨光先“稍通历法，与同郡吴明烜（烜）善，明烜自谓知历，每言若望历短，光先闻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

清朝初年颁用新历，并明确提出“依西洋新法”。这时，杨光先确实觉得忍无可忍。不久后他即上疏加以反对。但礼部在决策时，并没有采纳杨氏的见解，只决定将《时宪书》封面加以改动，去掉守旧派视为眼中之钉的“依西洋新法”几个字，代之以“准奏”。这说明，皇上是支持新历的，杨的意图当时是难以实现的。

这以后，杨光先并未甘心，他对汤若望必逐之而后快。他又从攻击天主教教义入手，斥责教士们在散布“妖书”、“邪说”。为此，他作了《辟邪论》一书，印数达到 5000 本，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他广为散发，竭力从感情上煽动人们对天主教的愤恨。利玛窦当年曾入情入理地列举分析了中国儒学与天主教义精神的相吻合之处。而杨氏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他笔下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严厉斥责天主教亵渎儒教。他曾写道：“今日之天主堂，即当年之首善书院也，若望乘魏珙之焰夺而有之，毁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木主践于粪秽之内，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马冯元颺之所以切齿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sup>②</sup>

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因为广泛吸取各种文化之长，而杨光先却从狭隘的心理，肤浅的见地出发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加以攻击，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天下之人知

---

① 杨光先《不得已》。

② 杨光先《辟邪论》，上卷。

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爱虎豹之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

杨光先在作论时，一时感情相当冲动，因而措辞比喻也就难免显得偏颇好笑。如他类比说：“耶稣得为圣人，则汉之黄巾，明之白莲，皆可称圣人矣。耶稣既钉死十字架上，则其教必为彼国所禁，以彼国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之恶矣……”<sup>①</sup>结果，他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教士和教友们自然不服他的气，于是引起了双方的一场论战。利类思神父及汤若望的弟子李祖白等，又作了一部《天学传概》，对杨加以驳斥。而该书在宣传其教义时，有些提法也是十分伤众的，毫不尊重民族文化与感情。如在提及中国的哲学时，竟说“与基督教赫赫之光相比”，它似如萤火之明。这当然使本来尊重或不干预基督教的人们产生了反感，客观上对杨光先争取舆论支持有利。杨光先也刚好趁着这个火候，及时发表了《不得已》一书，顾名思义，它表示作者实在是忍无可忍才著书申明己见的。而只要对这书略加浏览，便会发现，杨氏写书的着眼点，并不完全出自对历法的歧见。在许多地方矛头直接指向人。他写道：“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这感慨，一言以蔽之：洋人在此就是祸水，要防祸患就得赶走洋人。对于从利子到众教士来华的目的，他作了如下概括：

“自利玛窦入中国以来，其徒党皆藉历法，以阴行其天主之教于中土。今开堂京师宣武门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广东之香

---

<sup>①</sup> 杨光先《辟邪论》下卷。

山澳，盈数万人，盘踞其间，成一大都会。以暗地送往迎来，而棋布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

所以据他的分析，外国人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聚众造反。从这个逻辑出发，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有所作为，也不能允许他们长久居留。他认为：“无论其交食不准之甚，即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旁，岂容若辈鼾睡耶？”<sup>①</sup>

《不得已》一书发表后，流传相当广泛，造成了对杨光先等人甚为有利的舆论。此外，杨光先还写下了《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选择议》、《摘谬十论》等。这几篇东西相互配合，已渲染出一种气氛，造成了再次状告汤若望的舆论准备。而客观政治背景当时对杨光先的行动也颇为有利。

顺治皇帝的去世，对汤若望有如天柱倾倒，而对杨光先等，却造成了有利之机。因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向不喜欢西士，只是在世祖面前未敢轻举妄动罢了。

鳌拜本来并非出自清廷宗室，他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年轻时弓马娴熟，屡建战功。顺治皇帝念他“军绩颇多，且为国效力之处，其功甚懋”，就把鳌拜从一等侯超升为二等公。此外，“他的弟弟穆里玛封靖西将军，是八旗著名将领。他的儿子与顺治帝的女儿结婚，封额附，一门贵幸无比”。<sup>②</sup> 鉴于此，他更居功自傲，不可一世。顺治去世前，遗命中定鳌拜为四辅政大臣之一。除他而外，还有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和遏必隆。这四人中，号称智囊的索尼已年老体弱，遏必隆庸懦而缺乏主见。鳌拜渐渐大权独揽。由于政见的相同，鳌拜成了杨光先的后台，有鳌拜作主，杨光先上告时才有恃无恐。

① 以上均见于杨光先《不得已》。

②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页。

1664年（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参劾汤若望。他在《请诛邪教疏》中，指责明臣徐光启借鉴西方科学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之名，阴行邪教”。指责汤等人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而且《时宪书》的封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要求将汤等人“依律正法”。

杨光先等共列举了汤若望等人的三条大罪：

其一是潜谋造反，

其二是邪说惑人，

其三是历法荒谬。

首次列到状纸上的被告有：

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中国人有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和许保禄。

辅政大臣鳌拜等接到递上去的状子，心中暗喜，他们早就想除掉汤若望等一批西士。现在既有了契机，他们又大权在握，说话是能算数的。种种条件决定，审判汤若望一行人，势在必行。

就在这一年9月，大堂开审。8名被告被带到堂上。可怜这时汤若望年过古稀，重病在身，他已久患痰厥，肢体瘫痪，言语不清，然而仍不可免于出堂受审。由于他讲话很困难，只能设法由南怀仁代言。有时，要把问题写在纸上，他看后，可以小声与南怀仁用德语或其他语交谈一下，再由南怀仁对大堂发言。几个同伴，都带上了刑具，锁上了铁链，汤若望因还是朝廷命官，暂时没有加上脚镣手铐，其实他的肢体已不能灵活转动，就是无人看管，这老人也不能逃走的。

第一条罪状的审理延续了多日。据原告说：教友们所佩戴的圣像和每户粘贴在门口的瞻礼单，就是阴谋造反的标记。在澳门一带，还聚集着几万人，随时准备暴动。杨光先还提出，教士们

在中国的居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自古至今，有不奉本国的派遣，不得到我国的准许就越过边境，到人家国土上搞煽惑的吗？

为此，特地查找了外国教士们是否都有入境许可。结果，每名传教士的文书都找到了，证明他们确属得到中国皇帝的允许才来华的。办理案件的人又十分严肃地派遣人员前往澳门，察看是否有作为军事据点的迹象，是否纠集了几万人马，待命发往大陆实行颠覆。事实证明这是无稽之谈。既然如此，那么在华的总共二、三十名教士，而且散居于各个省份，又没有兵器和组织，如何能聚众起兵呢？最后由于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这一条罪无法成立，只有不了了之。

关于“邪说惑众”这一条，却是汤若望无法逃脱的了。因为杨光先指斥天主教书籍教义为妖书、邪说的舆论，已经无孔不入。审判官也明显是持此见解的。在审理这一条时，连续过了十二堂，南怀仁等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但竟毫无用处，庭审结果认定他们的宣传是荒诞不经、蛊惑人心的。一个月之后进行宣判，先把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三人投入监狱。然后宣布汤若望为散布邪说的“首犯”，立即革职并判为死刑。其余人，包括受牵连的许之渐、许瓚、佟国器等入，有官的予以革职，之后各责四十庭杖，发配远方。同时下令各省，把在本省传教的西洋教士一律押送到北京，听候审判处理。

一经宣布，立即实行。汤若望与“同案犯”挂着刑枷铁链，一并被送入刑部大狱。这里关押的多是死囚重犯。各种刑具，各种刑罚，骇人听闻。被折磨至死的人不计其数。汤若望在这里也吃尽了苦头。他的囹圄生活，每况愈下。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囚牢中，狱卒“吃”犯人的事本属司空见惯。只要犯人家中或亲朋好友有力出资，那么犯人就可以少受许多罪。汤若望初入狱时，还身为一品大官，拿着俸禄。他尽可以把钱拿出来，让家中仆人烧了饭

菜送入监中，还可以给狱卒们分食。这之外，再给他们些小恩小惠，加上教友们常送些实用东西，狱卒们被堵住了嘴，手下也就自然留情多了。可后来，若望的官职被革除，孑然一人，一无所有，作为大案要犯从礼部监狱押入刑部大牢，九链加身，只待行刑，狱中哪里还有人对他加以怜悯。他食不果腹，夜不能寐，瘫痪的肢体难以支撑自己。可怜他清苦一生，漂泊万里，治历有功，始终虔诚地恪守着自己的信念，却要蒙受这样一场冤案，这实在是普通人肉体上、心灵上所难以承受的。而汤若望以他的信仰为精神支柱，所以他不悲不戚，不怨不恨，他自信这是天主对他过失的惩罚。他怪自己平时因为琐事缠身，连祈祷都耽误了。所以他心平气和地承受这种磨难，只为自己的过失而忏悔，并不为自己到东方传教而受苦受难感到懊悔。他的虔诚的心，他的高度的修养是难能可贵的。

周围的人都很清楚，汤公不会久留人世了，然而杨光先等人对此当然不会有恻隐之心。他们再动心计，如何使汤若望罪加一等，如何使汤若望代表的西洋天历一蹶不振。

最后他们决定再追究汤若望的天算“荒谬”，以至贻祸于大清朝廷的“罪过”。他们抛出的材料是骇人听闻的。

杨光先提出：“君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而若望进二百年历，其罪曷可胜诛？”又控告他：在为襁褓中夭折的荣亲王（即董妃所生的皇子）选择葬期时，不用正五行，误用“洪范五行”，这大不吉利，以至祸及董贵妃，她不久就大病不起，一命归西，接着又殃及世祖皇帝，致使他年仅二十四岁就早离人世。这两项罪名，顿使满朝大哗。按照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情节而论，汤若望的罪孽类似于弑君，确属十恶不赦，决难以宽宥。即使再有人忿忿不平或对若望怀有同情之心，也不敢再轻易开口了。各方人上到这时都确信汤若望是必被处死无疑了。

然而他们并未急于行刑。因为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们还有另外一层顾虑——担心日后翻案。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他们再作运筹，决定举行规模较大的朝臣公议，当众定案，这样就是日后皇上亲政，再加追究，也怪罪不得什么人了。次年农历四月初一，公议隆重举行。会议场面之大，气氛之严肃是不多见的。参加者竟达二百人之多，历时四、五个时辰。会上，真正表现出同情汤若望并略能为他鸣不平的，仅是极少数。据有的书籍反映：杨光先在控告过程中大施了贿赂手段，他花费了白银四十万两，买通了许多办案官员，还施惠宝珠十八颗，堵住了一些人的口。财神爷的神通帮了他的忙，更造成了众人缄口的局面。所以说，这个公议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形式罢了。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最后定案的过程中，竟还加演了一场当众观测天象的戏，以“用事实证明西洋新法的荒谬”。为了做到这一点，杨光先等让中国、回回、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登台表演，因预测这一年一月十六有日食。三家都事先报告了自己所测出的日食准确时间。回回历所测的钟点最早，大统历的要晚十五分钟，南怀仁预测的时间比回回历的晚半小时。众人登上观测台不久，司仪宣布：回回历所测日食时间已到。但日食却并无踪影。又过了十五分钟，显然是大统历法报告的时间了，日食却仍然没有发生。当宣布南怀仁预测的钟点已到时，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一看，果见日已有食！这样的结果是令人信服的。可惜，这一结果并没有减轻对汤若望等人的判刑，预测错误的人，按规定应予论罪，但也未受任何处罚。

这次现场验证的目的何在，也就很清楚了：如果南怀仁等的测算出了错，那么必加之罪是无疑的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们早已内定，要借这一机会，贬低西洋新法。杨光先等人先是盲目地相信自己的人必胜，但退一步讲，就是不胜，预测错了，也

有人作主——历法乃至学术之争，自然是卷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的。由于汤若望是作为首犯被控告的，既然他的罪名是宣传邪教，那么其他西教司铎们自然属于他的同案犯，所以在汤等人被审期间，全国各省的传教士们，如西班牙教士栗安当等，也被拘禁，多数押解到北京，其中几人同时受到过传讯。后来曾暂时被禁于东堂。

1665年4月中旬，这桩大案的最后判决宣布了：对汤若望的处理决定实属置之死地尚不满足，还要对他处以凌迟。这是中国当时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审理第三条罪证时又牵扯到7名被告，他们是：刻漏科杜如予、五品掣壶正杨宏亮、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这7人也一律判为凌迟。前面涉及的李祖白等7人，论罪均斩，妻子流徙，家产被没收。这冤情，这十几条人命看来都难以寻到转机了。

正在这时，北京突然发生了一场地震。一霎时内，只觉地动山摇，四城之内，墙倒屋塌，人们吓得失魂落魄，可惜谁也无计逃命。有迷信意识的官员们深信这是上天的警告，尤其是对冤屈汤若望一行人的惩处。第二天，颁布了一项谕旨，要行皇恩大赦，狱中所押的一大批犯人，包括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许保禄等，都被释放出来，只有汤若望的案情最为重大，作为要案首犯，不能轻易宽宥。

辅政大臣及他们所控制的刑部庭审机构，首先不愿赦汤若望之罪。另外他们也很怕在全国大失体面，自打耳光。可是这场地震过后，余震不断发生，人心惶惑，纷纷议论说，这是上天的惩罚，这丧尽天良的冤案，招致了天怒，如果不尽早更正，恐会有更大祸降临。

这种局面使冤案的制造者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不愿也不肯对汤若望减刑或开释，但又害怕引火烧身，他们时时还在



担心太皇太后会不会怪罪下来。但这一点又恰恰提醒他们从棘手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干脆把矛盾上交给太皇太后。于是，几位辅政大臣一起去面见孝庄文太皇太后，口称：“汤若望罪案，须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这几个人害怕遭到训斥，他们明知道当年孝庄皇太后曾认若望为义父，曾捐资修建天主堂，知道她与先帝都 与若望过从甚密。所以几人心中有如装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但“上天的警戒”逼得他们别无良策，只有硬着头皮前去了。

太皇太后一见他们的奏折，立即面露愠色，待到他们上前叩见后，孝庄太皇太后恼火地嗔怪说：“先帝当初十分信任汤若望，你们难道都忘得一干二净？先帝自称汤公为玛法，你们如此胆大包天，想处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能容忍吗？”几人吓得哪敢哼声，连连叩头称是。归来之后，及时就把汤若望从大牢中开释，准他回归南堂。为了挽回两分面子，刑部又作出一种解释，说是选择荣亲王葬期的事，并非汤若望亲自经手，况且他是观天象的，不擅占卜。又有太皇太后怜他年老，格外加恩开释，他的仆人潘尽孝也就情有可原，免去一死。但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五人，因为荣亲王的事，只免去凌迟，仍按原判处死。许之渐等人被罢黜，回归故里。许十分鄙视朝中当权者的行径。返回江苏老家后，与老朋友共度桃源生涯。

汤若望回到南堂后，已是瘦骨嶙峋，心力交瘁。许多教友一一前来探望他。在精神上给他以极大宽慰。然而杨光先等人，并未善罢甘休。他在康熙四年（1665年）已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为了显示新监正的威风，杨光先执意逐出汤若望，自己住进南堂。他派人砸毁了堂中的耶稣像及御赐汤若望的“通玄

教师”的牌匾，把汤公驱赶到东堂<sup>①</sup>。自己搬了进来。而若望在东堂，虽说能与利类思、安文思等人相伴，但这里居室简陋，对他这风烛残年的老人，又增多了一层困难。汤若望在这儿又挨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四个月，他为教会写下了忏悔书，由他口述，南怀仁执笔。最后他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时间为1665年7月21日。

在这份悔过书中，汤若望作了深刻的忏悔。当然这里很自然地牵扯到汤若望与其同会兄弟之间所发生的矛盾。他的所作所为曾引起一些教士的反感，反对与抨击。例如在是否接受中国皇帝之命去任天文官一事上，他与时为教区头头傅汎济之间就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虽然傅汎济曾命最初持回绝态度的汤若望接受钦天监正的职务”。但后来，“在1649年，他却又签署了由安文思起草的，要求汤若望辞掉该职务的敦促书。”傅汎济等人声称：“如果这项圣教的正式警告不发生作用的话，那么曾发过四个矢愿的汤神甫就将作为不愿修正错误和不服从会规的人而被开除出耶稣会。”<sup>②</sup>对此态度，汤若望感到怒不可遏。他毅然在顺治元年十二月初二接受了任命。当然此后他们之间又达成谅解。而到此时此刻，汤若望无疑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检讨。

他自责说，自己没能严格遵守誓愿中关于操守清贫和服从上级的许诺。他说，过去几年中“我在诸多方面作了不良示范，这尤其是给我的上司们带来烦恼。我没能始终遵从他们的规劝与警告。我的言行多次冒犯了他们的权威。”涉及到过继义孙一事，他

---

<sup>①</sup> 东堂又名圣约瑟堂，在今北京王府大街。建于1655年，是由利类思操持修建的。1814年及1900年两次遭火烧。1905年重建。

<sup>②</sup> Felix Plattner; Der grosse Doktor Tang (伟大的汤博士), Saarbruecken, 1935年版，第30页。

也作了自责：“我意识到，由于过继我的仆人之子为我的孙子，铸成了不明智之举而使我犯了一件令人忿恨的过失……”这份自我检讨的文字，可能是当着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兄弟们宣读，然后才寄往罗马的。因他在文中多次深表歉意地悔恨自己，由于过纵过宠自己的仆人而使同会会友恼怒，由于仆人的贪婪，而使会友弟兄们没能享用他们需要的东西；由于他的过错使大家经受了一场苦难。汤若望本人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的忏悔也是深刻的。经过这样的忏悔，他获得了心灵上的平静，但却仍然忍受着疾病折磨的痛苦。他在东堂的病榻上，又挨过一年多时日，1666年8月，他病情恶化，由同会司铎为他作了终傅礼。8月15日，即农历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辞别了人世，这一天是西历圣母玛利亚升天节，而中国农历恰恰是京城荷灯节——祭告死者的传统日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光先心想事成，因之踌躇满志。可惜的是，他对治历方面并不精通，不免依样画葫芦。因为康熙五、六、七年的历法，汤若望等已基本上造出来了，他不再需要费力气，可是到了康熙八年，他所进之历，错误甚多。更有甚者，他把戊申岁的闰月竟推错了，他所呈的历书中，这一年当闰十二月。历书颁布之后，忽然发现这推算有问题，还想更改，可皇历已公布于全国，追悔莫及了，唯一的挽救办法，是由皇帝出面更正，于是不得不颁布圣旨一道，宣布“停止闰月”。杨光先的不佳声誉不胫而走，貽笑大方，皇上也因之有失光彩。那时皇上还没有亲政，大权仍操在辅政大臣手中。

康熙皇帝14岁这一年（1667年，康熙六年）临朝亲政。他虽然初躬朝政，但超群的才智与气魄，已显露端倪。鳌拜一伙利令智昏，不但毫不收敛，反而愈加专横，在少年天子面前恣意妄为，有时甚至托病不去上朝。当年轻的康熙前往探望时，他竟然在卧榻前偷藏利刀。康熙看透鳌拜居心叵测，表面上不动声色，暗

自设计擒拿他。康熙选择了一批强壮的小内监，“日习布库”（每日练摔跤）。等到他们的武功相当纯熟之后，有一天，当鳌拜入宫时，乘其不意，命众小童一拥而上，把他活活捉拿。可怜鳌拜一介武将，曾有万夫不当之勇，这时却落在一群小孩子手里。接着，康熙宣布了鳌拜的三条大罪。依罪理应问斩，但念他往日的战功，仅免一死，处以终生幽禁。

康熙皇帝在旨谕中概括地罗列了他的罪状及处理决定：

“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欲尽出伊门下，与穆里玛等结成同党，凡事在家定议后施行，且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与伊合者荐拔之，不合者陷害之。朕念鳌拜旧臣，望其改恶悔过，今乃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所犯重大拟以正法……但念鳌拜在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革职，籍没仍行拘禁。”<sup>①</sup>

鳌拜被处置之后，杨光先等人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后台。汤若望冤案的重新审理，也有了一线希望。

还在皇上躬躬朝政之前，孝庄文太皇太后和康熙的生母皇太后（佟佳氏），都曾多次向皇上谈及汤公的为人以及先帝对汤公的特别信任，她们认为汤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指摘的，其案必有冤情，是受人诬陷的。康熙帝感到言之成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太皇太后的干预对汤若望案件的昭雪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康熙帝与这位深受爱戴的祖母之间的关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孝庄太皇太后是康熙的抚养人和保护者。传教士白晋在他写的《康熙大帝》中讲：“由于年老的太皇太后独身为康熙帝的教育而操劳，因此皇上对太皇太后是唯

---

<sup>①</sup> 《清史列传》卷6，页10。

唯诺诺，百依百顺，其顺从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一点，中国的史料则反映得更为清楚与深刻。康熙曾亲自作过这样的表白：“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夙蒙慈养。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

正是出于这样的深情，康熙平时就格外孝敬祖母。他出巡山海关盛京一带祖母故乡，每次有新鲜品味，如白果、松子、柿饼、核桃等，或有野味、活鱼，就让人稍加醃制，速送京城慈宁宫太皇太后品尝。他陪同祖母去赤城汤泉时，在山路上“随辇步行”，他说：“此处道险，必扶辇于心始安”。后来，在太皇太后病危时，“皇上朝夕在慈宁宫席地奉侍，亲调药饵，寝食俱废。”由于多方医治无效，康熙甚至亲率群臣，到天坛去为祖母祈寿，他泣泪交加地祷告苍天“宁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寿”。<sup>①</sup> 皇上的诚心使在场的群臣无不感动而泪下。可想而知，对祖母在汤案上的提醒，康熙自然格外重视，更何况他也认为言之有理。因而命人速行审察。

一日半夜，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三神父作完晚弥撒，刚要睡觉，突然有人来访，说明他们是皇上内侍，接着详细询问了有关的情况，要神父们细察杨光先历法中的错误。

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皇上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谕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安文思、利类思、南怀仁：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同时还要

<sup>①</sup> 参见《清列朝后妃传稿》。

求他们：“尔等同礼部尚书布颜、郝惟纳去测验日影……”<sup>①</sup>

这份封建帝王的圣旨，虽说事隔三百多年，但今天读来，仍然可以深切地感觉出，康熙对待臣属的态度是何等坦诚，对待科学又是何等严谨，完全主张尊重客观事实，不带任何偏见。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既务实又有远见的指导思想，中国天历上的这一大谬误才得以更正，汤若望的案子才有可能纠正。当然事情并非一番风顺，还有个戏剧性的过程。

就在圣旨颁布以后第二天，内院大学士李蔚、学士多诺、吴格塞、卓令安、范承谟，带着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一同来到观象台。传旨让他们当众分别测验和推算正午日影所到之处，礼部尚书布颜、郝惟纳也在场。而这时候，素以“敢言”而在京城闻名的杨光先却怯阵了，他推辞说：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日后才能算出来的。在场的官员对他的话感到愕然，他们很不客气地质问他：你们不是早就声称可以测日影的吗？怎么能这样当众自食其言？杨光先身为监正，十分尴尬，不敢临阵逃脱，只有硬着头皮上台测试。但他的测量误差很大。

南怀仁艺高胆大，他通过制造“木表”的办法，把当天中午的日影清晰地画在木表上。待到中午，众人一起来观看，他的推测分厘不爽，众官员心中暗暗称赞。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非常严肃慎重地再作验证。第二个测试地点是紫禁城午门前。在这个庄重的场地上，南怀仁标出的线条，与正午的日影恰相吻合，这立即引起在场者的轻声喝彩（在这里是没人敢大声喧哗的）。这还不算了结，这一组人马又经过第三次比试。之后众人对南怀仁工作的出色心服口服。而测试的过程又是严格遵照康熙帝的要求做的。这一结果如实地禀告到皇帝那里，康熙

---

<sup>①</sup> 《熙朝定案》手抄本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皇上又下了一道谕旨：

“将吴明烜所算七政及民历，着南怀仁验看，差错之处写出。俟报部之日，尔等议奏。”<sup>①</sup>

康熙的这一步棋是十分高明的：类似通过批阅试卷看考官的水平。经受“考核”的这几天，按照欧洲日历，正是圣诞节前后，而这样紧张地度过圣诞节对南怀仁等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没有什么空闲去享受节日的愉快，一面进行精密的测算，一面仔细审阅吴明烜等人编写的《七政民历》。他越看越断定这是个错误百出的拙劣之作，于是他又抓紧时间给皇上写一份奏折。

且说杨光先那边，并没有睡大觉。他为自己处境的狼狈而惶惶不安，不甘心如此败下阵来，急忙设法为自己辩护。他绞尽脑汁写了一篇奏疏，深为感叹地写道：

“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夫西洋至我大清国，相去八万里。星宿官度，自然各别。岂可以八万里之外国，而毁我尧舜之仪器哉。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此其人只可称制器精巧之工匠，而不贯穿于圣贤之道理。只知说无根之大话，而不知合理数之精微，若用其人，臣来见可也。”<sup>②</sup>

这段陈词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机械推理，缺乏能真正说服人的有力证据，又想强使皇上接受他的主张，于是便以尊尧舜来压皇上，斗胆作了一番训示：要尊尧舜，你就必须取缔西人西

① 《正教奉褒》第48张。

② 《熙朝定案》，第6—7页。

历；要行西历，就是祖宗的叛徒。所以康熙皇帝读了他的奏章之后，心里很是不快。但他并没有显露帝王的威严。他自然看清了杨光先的轻狂与浅薄，竟敢在皇上面前卖弄，其实康熙帝无论对诗书礼义，对自然科学，对宋明理学，非但一点儿不外行，而且极有功底。他称赞中国的诗书礼义，“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兵燹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他挑选了有学识、有见地的文臣，每日都在“懋勤殿”讲学，还亲自制定了《日讲四书解义序》。他后来曾对臣属们说：“尔等每日悉心讲解，朕之典学，虽不能媲古帝王，而此心朝夕懋勉，未尝稍懈也。”在这样一位帝王面前，杨光先的训示口吻岂不太过分了吗？

再说南怀仁的奏折，送到康熙面前，两相比较，康熙帝对南怀仁的谦虚、务实颇欣赏。南的奏疏中说：

皇上“着臣查对差错。窃念臣远方孤旅，荷蒙皇上特知之隆，敢不竭力殚心，以求无负我皇上宪天授时之至意。今以臣所推历法，查对本历所载，相去甚远。臣自幼学道，口不言人之短，兹奉上谕，以七政民历着臣查对，不敢不据实开晰明白，免蹈失实之咎。谨将列册一本并钦发七政民历二本，一并缴呈御览。仰凭乾断。”

康熙阅过这些奏章之后，心数已十有八九，但他仍然没有急于下结论。他让众官员再进行一次实际的考察和议论。这就到了康熙八年正月下旬，他派 20 名大臣与南怀仁、吴明烜等一同登上观象台测试日影。结果，南怀仁的测验，“逐款皆符”，而吴明烜的测验，“逐款皆错”。礼部在写给皇上的报告中，除报道上述结果外还建议：既然南怀仁所使用的九十六刻度法合乎天象，那么从明年就应采用。过去杨光先竭力强调：“以百刻推算，系中国之法，以九十六刻推算，系西洋之法。”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就会使“国祚短了”，“不利子孙”。杨光先身为监正，自己推算的错误百



出，别人推算的，他又坚持不用。这样“妄称国祚，情罪重大”，应该予以革职，交给刑部，从重处理。<sup>①</sup>

但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康熙是既严厉，又着重务实的。他先已严肃地指出：杨光先“若实有所见，应于众议之处说出”，我已经明确指出了历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再嘱咐你们不得固执己见。可是杨光先拒不实行，还强词夺理地要朕不得任用别人，这种作法“殊为可恶”。理应从重处理。但皇上本着宽大为怀，仅予革职。

康熙对吴明烜的处理也是宽厚的。康熙在1669年2月29日的谕旨中写道：

吴明烜“本当依议革职，从重治罪。如从宽免，仍留原任。以后着更改前非，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若复颠倒是非，明知其能而忌嫉之，从重治罪，钦此。”但后来吴明烜的表现果不出所料，真的再次颠倒是非，在后来的一次测验中，竟胆大妄为地欺骗皇上，谎称自己会推天象，最后露出了马脚。本应将他重责不准折赎，妻子流徙宁古塔。但最后，只让他挨了四十大板，其他都被宽恕免去了。

杨光先被革职后，钦天监监正空缺了。谁是称职的角色呢？有人建议提拔原监副胡振铎任正职。但康熙已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历法天文由南怀仁料理。”

南怀仁得知后，立即上疏表态：“惊闻宠命，感惧交集……莫知所以。窃念臣本西陲鄙儒，观光上国。蒙世祖章皇帝以臣通晓天文历法，钦取来京，兹何皇上不弃朴樾散材，特授司天之职。臣捐躯磨踵，宁能图报。但臣弃家九万里，惟澹泊修身为务。一切世荣，久已谢绝。况受禄服官，非所克任。用是仰赖皇上含宏，俯

---

<sup>①</sup> 见《正教奉褒》，第52张。

鉴臣愚，不谙世务，容臣辞监副职衔。”

从以上可以看出，南怀仁的中心思想是不愿当官。但皇上驳回了他的辞呈，要他遵旨供职，不必抗辞。

不料南怀仁仍不愿接受这个职务，他又上了一份奏疏，十分诚恳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情。他的行文富于感情，不但表述了对皇帝的忠诚，也陈述了自己愿为天历事务竭尽所能的诚意，只是官位不愿接受：

“臣生长极西，自幼矢志不婚不宦，惟以学道修身为务，业今三十余年。荷蒙皇上不弃庸材，特异简用。犬马尚知报主，臣非木石，敢不勉力以答高深。臣一疏再疏，抗辞官职，出于臣至情，非敢勉强渎陈。至于历法天文一切事务，敢不竭蹶管理，宁惮烦劳。如唐一行亦任修历法，而未尝授职，伏乞皇上悯臣之心，察臣之悃，允臣微志……”。

对南怀仁这份奏疏，皇帝也颇受感动，所以他的批语为“情词恳切，准其所请”，对南怀仁暂不授职。但他承担钦天监的一切职责，皇上特下旨让他享用监副的俸禄。但他始终没有正式接受头衔。他在钦天监担任主要负责人多年，也始终没有以正、副监正自居。

南怀仁的态度如此坚决，当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他当年矢志不婚不宦，愿终生履行自己的诺言，可以理解。另一方面，汤若望的坎坷经历，不会不对他产生重大影响。若望如此尽职尽责，最后蒙受那么大的委屈，南怀仁目睹这一切，对中国官场的实情内幕也一览无余，他不愿重蹈教中兄长汤氏的覆辙，这一层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汤氏竭尽其所能，希望博得中国朝廷的信任，以利日后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但是在教会内部，教士们也是相互争执，莫衷一是。许多人坚决反对汤若望出任满清官员。当汤氏接受官衔后，他们上告到罗马，以至罗马出面加以谴责。正因为

这样，他最后才痛心地写下了忏悔书。这一层教训，南怀仁出于理智，也自然需要接受的。这里也可以看出，如果汤案不翻，南怀仁及其后许多人在华供职，都存有心理障碍。他们会在中外受到夹击，这是一片可怕的阴影。

鉴于各方面的原因，仍处于冤情阴霾中的汤若望，终于有希望重见天日了。利类思等人决心为死去的会友鸣冤申诉。他们写了一份催人泪下的奏章，陈述他们与汤若望共同遭遇的不幸，这实际上是一份状子，他们写道：

“思等同乡远臣汤若望，来自西洋，住京四十八载。在故明时，即奉旨修历。恭逢我朝廷鼎新。荷蒙皇恩。钦敕修历二十余载……乃先帝数十年勋劳荃臣。罗织拟死。使忠魂含恨……乃为光先所诬。火其书而毁其居。思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狐死兔悲。情难容也。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冒恳天恩，俯鉴覆盆。恩赐昭雪。以表忠魂。生死衔恩。”状纸中还罗列了他们被人诬告的不实之词，如杨光先曾指新法为舛谬等。他们申明，自己所宣传的宗教教义是敬天爱人，主张尽忠孝廉洁，所以受到中国公卿的爱慕。连世祖章皇帝也“数幸堂宇，赐银修造”，并有御制碑文，门额上还曾书写了“通微佳境”。如果是“邪教”，那么先帝不是早加禁止了吗？其次，他们申明，“图谋造反”这一条罪是人强加的。因为他们“远籍西洋。跋涉三年。程途九万余里。在中国者不过二十余人。生于西而卒于东。有何羽翼。足以谋国。”<sup>①</sup>

这一案情，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重视。朝廷派遣专人对案情、对杨的控告作了详实的核察。

杨曾状告汤若望、李祖白等误用“洪范五行”，并声称“洪范系灭蛮经，用之不吉。”但经过查实证明，“洪范五行。历代用之。

---

<sup>①</sup> 参见《正教奉褒》57、58等张。

并未闻有斥其非者……自古以来历代悉皆用之，并无因碍不用”。<sup>①</sup>但正因为这条骇人的罪名，已杀掉了李祖白等几名官员，他们的妻小遭到放逐，因而酿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杨曾状告西洋人图谋造反，造好兵器，藏在香山澳，还布邪党于二十多个城市，如济南、上海、福州、南昌、广州、西安等，而汤若望本人藏身金门，窥视朝廷秘密。<sup>②</sup>但现在详加盘问，有关者却支吾其词，查则子虚乌有。另外，杨见教友家门都挂了金牌，就认为这是“要反了”，这牌是谋反的信号。实际上这是出于对天主教的无知。审核的最后结论是：一系列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杨光先其人，在他出任钦天监监正的短暂时期内，却不乏令人指摘之处。1667年，杨光先曾上奏疏一道，说江南有古代修筑的一个观象台，台上放置着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铸造的“六合仪”，并称这部仪器对他如何重要，急需运到京城。礼部因而批准了。为运此仪，江南督抚及其下属官员忙得不可开交。差役、沿途经过的车马驿站，弄得手忙脚乱，多少人长途跋涉，费尽辛苦，才把这古董运到京城。结果根本无法使用，无端浪费了许多银两、人力和粮草，当差人也弄得啼笑皆非。

由于杨光先“但知历理，不知历数”，所以在治历上出了不少差错。他与吴明烜所造的“康熙八年七政民历内，本年十二月闰，应移置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有两春分、两秋分等差错。”<sup>③</sup>特别是已颁历书中闰月的错误，害得全国为之尴尬，最后不得不由皇上下达诏书，命“停止闰月”。<sup>④</sup>这些类似事例，使杨光先自己损

---

① 《熙朝定案》。

② 杨光先《请诛邪教状》，参见《清朝柔远记》第17、2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清圣祖实录》第28卷，第24页。

④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

坏了自己的声誉。

另外，在汤若望案件的处理上，虽然汤公本人及仆人潘尽孝后因地震被赦免一死，但由于杨光先等人依附鳌拜势力，造成清朝初年这一大冤案。鳌拜及同党倾覆后，一系列蒙受不公正处理的官员，均有亲朋、好友代他们上奏，申明原案中的种种不实之词，或被处死、或流徙或罢官，并牵连家小，定案并无实据，确实含有冤情，企盼皇上明鉴。

康熙帝在派人一一查清了案情之后，对杨光先等人的行为很是恼火，对汤若望等人的遭遇，也甚感不平。但礼部在接到三位神父的鸣冤诉讼之后，却予以驳回。皇上于是又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重新议定此案。这等于是一次各方会审，会议甚至举行了六次之多。最后，由和硕康亲王傑淑等人将复行审议的结果报告了皇上。他们提出的处置建议要点大致如下：

第一，汤若望并没有结党谋乱的意图。供奉天主是他们自家的信仰。并不是引人作恶。

第二，汤若望确实通晓历法，治历有功，先帝所授的官职，所赐的“通微<sup>①</sup>教师”的嘉名都应恢复。所占用他的教堂、墓地应归还。

第三，原朝廷官员许之渐、许纘、佟国器等人或因为入天主教，或为修建教堂捐资，或应邀为《天学传概》一书写序，都被罢了官，现在应给还原职。

第四，李祖白等几名官员已被正法，子弟被流徙，这都确属冤情，应照原官位恩恤。允许他们的家属重返京城，有官职的恢复原职。

第五，允许信奉天主教。对被押解广州的 25 名教士，重新作

---

<sup>①</sup> 原为“通玄教师”，但因康熙字玄烨，为避讳这个字，改“玄”为“微”。

了处理。对此，朝廷是有特别颁发的文件的，其中写道：“因天主教缘由解送广东西洋人二十五名，行令该督抚差人解送来京……”

关于这 25 名教士，那时皆因汤案被拘押，有的甚至是放在木笼囚车上被解送广州的。他们是：

|       |     |      |     |     |
|-------|-----|------|-----|-----|
| “山东省堂 | 栗安当 | 汪汝望  |     |     |
| 山西省堂  | 金弥格 | 恩礼格  |     |     |
| 江南省堂  | 张玛诺 | 鲁日满  | 毕嘉  | 潘国光 |
|       | 刘迪我 | 成际理  | 柏应理 |     |
| 湖广省堂  | 穆迪我 |      |     |     |
| 江西省堂  | 聂仲迂 | 聂伯多  | 殷铎泽 |     |
| 浙江省堂  | 洪度真 | 闵明我  | 费里白 | 白道明 |
| 福建省堂  | 何大化 | 郭纳爵  |     |     |
| 陕西省堂  | 李方西 | 穆格我  |     |     |
| 广东省堂  | 瞿笃德 | 陆安德” |     |     |

在下达这一解送命令时，朝廷还特地旨令广东总督查明：“内有通晓历法的几名，即行起送来京，其不知历法者，即令各归各省本堂可也。”康熙十年正月十八日，兵部行咨各省总督抚院。

根据这项旨令，教士们得以各即其位，擅长天文历法的几名，被留在北京，从而能发挥其所长，余者到各省继续传教，因此，各省教堂的波动，也即此中止。

为此，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教士，对皇上的宽厚柔远的情怀都十分感沛，他们在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所上奏折中表述：

“臣等自幼弃家学道，生虽西洋，歿则中国。自明迄今已将百年，世祖皇帝深知天主教无敬，故赐堂赐匾御制碑文。屡次圣驾临堂……皇上垂浩大之恩，容臣等各居本堂焚修……得生归本堂，老

归本墓，以继世祖皇帝柔远之仁，则诸臣有生之年，皆皇上再造之德也……”<sup>①</sup>

最后一点，是对于杨光先的处理，确认他并不通晓历法。对于杨光先的发落，初决如下：

“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得恶人杨光先捏词诬告汤若望，情罪重大，议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sup>②</sup>但康熙皇上下达旨谕免其死罪：“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

结案后，杨光先在返回故乡时死亡。

关于杨光先之死，史书记载出入较大，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光先邀蒙恩免（正教奉褒），放归卒于途（徽州府志又畴人传）：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谈则称论大辟。其实，光先盖论大辟，免死归卒者也。又正教奉褒：出京回家，行至山东德州地方病发背死。”<sup>③</sup>

关于“病发于背”的详情，却还有书作过详细叙述：“光先出京归家，行至德州地方，病疽发背，肌肉溃腐，脱落成穴；越七日，毒攻内腹旋即溃烂，前后腹背贯穿洞开，脏腑倾出，号叫数日。现世之恶报如此最显……”<sup>④</sup>

以上说法中，“西人毒死”一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自然留下种种疑点。而“现世恶报”之说，由于对背疽的渲染笔墨色彩过重，反而有失真之嫌。因而对于杨光先之死的真情，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杨光先其人，除了他一生固执的政见为众所周知外，在

---

① 以上据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手迹收藏部，文件号码：Cod Sin 31。

② 《熙朝定案》第11页。

③ 《不得已》。

④ 《崇正必辩》，《杨光先恶死事实》。转引自：黄一农《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

思想方法上，他确有失之偏颇的一面。连他本人为自己刻画形象时也说：“禀不中和，气质粗暴，毫无雍容敬谨之风，纯是卤莽灭裂之气。”所以他的父母曾告诫他说：“汝此性像若居官必致杀身”。<sup>①</sup> 这话可以说是一言言中——知子莫过父。杨光先在参劾大学士温体仁时，竟然抬着棺材到大厅广众之中，以示将生死置之度外。此举未免过分。他在攻讦汤若望时，措词也时常相当偏激，如“汤若望之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谬。”他辛辣地比喻西洋人“譬如猩猩鹦鹉虽能人言，然实不免其为禽兽也。”“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针对杨前前后后的表现，鲁迅先生曾幽默地评论其人道：“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杨）痛哭流涕地来劾洋人汤若望……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也学不好的。”<sup>②</sup> 然而杨光先的性格大概也正属于心直口快一类。例如当皇上要授予他钦天监监正职务时，他多次谢辞，并直率地说自己：“聋老昏愤，记性全消，精神耗钝，冒死必辞。”<sup>③</sup> 他虽一连数次力辞，但朝廷未准，因而最后才出任监正。

这一案件中牵连的李祖白等，都以予“照原官恩恤，其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各复原职”。<sup>④</sup>

汤若望冤狱终于昭雪了。中西交通史上的一段是非曲直也算大体上分明了。礼部在重议此事时，对汤若望的处理为：

---

① 《不得已》。

②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版，第184页。

③ 《不得已》。

④ 《正教奉褒》第61张。



“通微教师之名，复行给还。照伊原品级赐恤。应照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汤若望给予合葬之价。并给予一品致祭银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内院撰拟……”这篇祭文的全文如下：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可歆享。

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sup>①</sup>

这篇祭文篆刻在汤若望墓碑的正面右侧。碑的正中书有“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几个大字。祭文的满文译文刻于左侧。背后有拉丁文译文。

这碑现仍立于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三塔寺今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这里旧称栅栏墓地。

三塔寺墓地随时可供来客凭吊游览，因为除了汤若望茔墓外，还有人来此一谒并排的利子与南怀仁坟茔墓碑，以及另一围墙中的七、八十块来华传教士等人的墓碑。并听导游者简述这里的曲折变迁。因为这块旧称滕公栅栏的传教士陵园，三百多年来经历了一幕幕戏剧性的演变，这里顺便叙述一下“栅栏”墓地小史。

说起这滕公栅栏，还颇有一番来历。有人说，这里因埋葬着滕公而得名，他是16世纪明隆庆皇帝（穆宗，1567—1572年）所宠信的一个太监。但也有人说，滕公之墓实际上在西郊香山的后

---

<sup>①</sup> 碑文见汤若望墓碑。碑身疑为重新放置时将正、背面颠倒。因为其他两碑均拉丁文在背后。

面，这里不过假称滕公墓之名，因为这块地方原来是滕家的一处园子，真正埋在这里的是明代大奸臣魏忠贤，据悉魏当初在世时已把滕公栅栏庄园据为己有。这名称来历的原委大抵如此，无需细考了。而这里曾为明万历皇上钦赐的利玛窦坟地，却是确凿无疑，有据可查的。

1610年5月11日，利子在北京去世。庞迪我、熊三拔等传教士给明神宗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朝廷赐茔地一块，以使玛窦能安葬北京，不再像以往的传教士那样移葬澳门。奏折的言辞十分恳切，追述了他们来华的初衷，他写道：“我、利玛窦及五教士，夙闻贵国政治昌明，万分仰慕，时历三年，不辞跋涉远道而来……已在中国居住多年，亦可望是忠于陛下的臣民了，既然活着能食皇家俸禄，那么死后，也望皇上隆恩，体恤远人，准赐一席长眠之地，亦是利子生前之素愿也……如蒙皇上垂怜俞允，我等将永世感戴陛下……”<sup>①</sup>

这时，朝中诸公也纷纷为之议请葬地。李之藻、叶向高等人从中相助，最后明神宗下达旨谕：“查给地亩，收葬安插，昭我圣朝柔远之仁。”<sup>②</sup>此后“帝即将阜成门（初名平则门）外滕公栅栏官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赐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茔葬，并改建堂宇……为供奉天主及祝釐之所。”<sup>③</sup>

据说，教士们为得到这块地，又费了不少周折，因为这地亩的原主人犯了死罪，财产应充公。但为了保住这宗家产，他在这块地上修了一处佛庙，取名“慈寿寺”，可惜这主人不谙国法，按规定，庙宇一律不得归私人所有。因此这地反而成了名副其实的

---

<sup>①</sup> 引自曹增友《利玛窦墓地及丧仪》，载《中国地方史志·走向中国》1982年第4期。

<sup>②</sup> 《国朝柔远记》。

<sup>③</sup>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6张。

官地，连住庙和尚也只好迁出让位了。

1610年10月，在这新赐基地上为利玛窦举行了安葬仪式。因他死后，已停灵一年。之后，修士们先后搬了进来。

据记载，利玛窦墓地居这块莹地的中部，“墓首有八角亭一座，南北有石墁甬路一条。由修士宅院可以直达利玛窦坟。后来邓玉函、罗雅谷去世之后，就埋葬在靠近利玛窦坟地的两旁。二墓之后，即系龙华民与圣多明我之修士郭多明之墓。”<sup>①</sup>

自利玛窦安葬之后，这里蔚为城西一景。从当年直至如今，前来拜谒者不计其数，前人还曾留下一首题为《过利西泰墓》，诗中概括地反映了西方教士的一片苦衷和中华民族的柔远精神，特录如下：

来从绝域老长安，    分得城西土一棺。  
斫地呼天心自苦，    挟山超海事非难。  
私将礼乐攻人短，    别有聪明用物残。  
行尽松楸中国大，    不教奇骨任荒寒。

这首诗原为谭元春所作。小诗收入《帝京景物略》一书。该书也记述了玛窦及其坟墓的简况：

“玛窦紫冉碧眼，面色如朝华。既入中国，袭衣冠，译语言，躬揖拜，皆习。越庚戌，玛窦卒，诏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嘉兴观之右……”<sup>②</sup>

汤若望平反昭雪之后，康熙皇帝除了重申恢复他的原官衔之外，又重赐“通微教师”之称，此外，还发帑银五百二十四两，以修筑坟墓。康熙帝还赐给他的墓地两扇石门，置于汤墓的入口处，因之这一带地方又有了“石门”之称。在旧北京，提起石门教堂、

<sup>①</sup> 《燕京开教略》第30张。

<sup>②</sup>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

石门坟地，百姓远近皆知。因朝廷赐的银两都用作修墓，而且墓的款式规格都是按照一品大官的品级而建造，所以当时汤若望的墓显得十分讲究而壮观。样式是按照地道的中国风格。具体位置在利子墓西墙外，独为一所。

利玛窦的墓“由半圆形的土岗围绕。“墓长一丈余，宽六尺有奇，皆以方石砌成。墓前有大理石碑一通。高一丈二尺……碑前有供案一面。上陈盘果等物。案前复有五供。即香炉一座，灯烛一对，供瓶一对，连座高六尺有余。”<sup>①</sup> 据记载，石供的前面还有两匹石马，两尊石人。石人手里捧着“象笏”。这些东西都是用大理石精雕细镂而成。

除了汤若望的墓之外，以后这里又建有耶稣会士罗启明、安文思、利类思的陵墓。南怀仁的墓也是自为一处的，但仍然是利玛窦墓地的西墙之内，直到1780年，徐日昇去世后，才葬到墙西，从这以后，两块坟地并为一道，原来的西墙成为甬路。以后其他修士亡后，也就顺序在甬路两旁埋葬。到鸦片战争之前，滕公栅栏墓地已葬有外国传教士80人左右。

然而从那时到鸦片战争爆发，洋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至1840年前后，中国确如一片桑叶在被蚕食。西方列强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许多条约都以“准许传教”作为一个附加条款。这样，以枪炮为后盾的传教活动开始了：“西教开禁之后，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华民人教者，亦日增月盛。”<sup>②</sup> 许多来华传教士的目的不局限于传播其信仰。他们当中有的人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马前卒或帮凶。有的勾结地方

① 《燕京开教略》第32页等。

② 《清德宗实录》第413卷，第15页。

士绅官府，盘剥欺压中国百姓，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义和团提出了“诛锄西教扶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出于对洋人在华为非作歹的仇恨，在全国各地捣毁了多座教堂，滕公栅栏墓地由于是西洋教士葬埋与活动的集中地点，因而也是义和团行动的目标之一。庚子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鏖战，各教士的墓碑多被推倒或砸毁，坟被掘开，栅栏墓地被夷为平地。

诚然，义和团的行动具有笼统的排外性和历史的局恨性，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带有偏激性的反抗运动。但是，当他们的斗争处于如火如荼之时，一定要求他们区分开哪些洋人是曾在中国有过贡献的，哪些是曾为非作歹的，哪些是功大于过的，哪些反之，从而分别处置其坟墓，这当然是极不现实的。就是在作为学问探讨之时，也难一下子辨别得如此明了，如此恰如其分。

在八国联军践踏北京之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竟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sup>①</sup>的媚外宗旨。据此，清政府在1903年拿出1万两白银重新修复滕公栅栏墓。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的态度并非是为了纪念一些曾在中西交通史上作过好事的西洋人。仓惶出逃的慈禧太后一伙，哪里有闲心顾及利玛窦、汤若望当年有过什么作为？！他们彼时彼刻几近丧家之犬，忙向帝国主义乞怜，他们的态度是“疾愚暴之无知，念列邦之见谅”。<sup>②</sup> 所以其出银修墓地的意图，是向洗劫北京的八国列强“谢罪”，表示“悔过”，使他们自己尽量保住险些失去的天堂。为了表示其意之真，他们答应在这块墓地上立一块“纪念碑”，这实际上是一块耻辱碑，上面写道：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6页。

“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原文如此）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迨议合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秋月立”<sup>①</sup>

这碑文上说为人雪耻，实际上是为自己记耻，记下了清政府在庚子年、辛丑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耻辱。

所幸的是，有几具原来的墓碑并没有完全毁坏，其中包括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徐日昇等人的。事过之后，他们的墓碑被重新竖起安放，这才把利子、汤公、南怀仁三块碑并排放在一起，玛窦居中，汤、南立于左右。周围修起一圈青砖花墙，墙高1.5米。从这个并起的新墓直向正南方向走，是原诸公教堂所在地。因该堂也夷为平地，根据达成的赐银协议，又修建了一座名为“致命圣教堂”的新堂。那些经过庚子鏖战或断或损，一片散乱的石碑，都被砌在新教堂的墙壁里。

1949年之后，这块地方再次经历了一番变化。因为需要充分利用城市空地，大兴土木工程，有关部门出资迁移坟墓到京郊西北旺，这里盖起了几幢大楼，也成为北京市委党校的所在地。而利子、汤、南的墓碑秋毫无犯，它们坐落在校园中心，周围绿树成荫，显得幽雅而宁静。

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破坏之时，这块地方无疑是在劫难逃了。这一年本应是汤若望的一个大祭日，因为他刚好作古300年。但既然汤氏选择了中国大地为自己的归宿，那么他就必然要与这里的人们共命运了。尽管他的人生旅程已结束，但还要继续经历中国历史变迁的重重波澜。他的名字随之浮沉，他的墓碑再次被

---

<sup>①</sup> 碑文现见于市委党校传教士墓地围墙上。

拉倒。难能可贵的，在“破四旧”的风口浪尖，就在党校的工作人员中，确有有眼光、有心计的人。他们约集一部分同事，在“横扫四旧”的名义下，自己用绳子把汤若望等三个人的墓碑稳妥地放倒，用土掩埋起来。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小将们冲杀过来的时候，这里的“四旧”已破除了，不需他们再动手“砸个稀巴烂”了。就这样，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块墓碑被保存下来。今天，当我们重悼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个历史人物时，应该感谢常润华等一批具有历史眼光、善于因势利导的人。他们在当时的胆量与智慧殊为可敬。

现在，环视这片地方，已是面目一新。在80—90年代，利、汤、南墓地逐步修葺整洁。周围环境也经过绿化。建起油漆彩画的小凉亭，铺设了石子甬路。大院内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伴随着土木工程的兴建，原砌在旧教堂墙中的石碑，有幸得到十分妥善的保护，这次在拆迁中也重见天日。有关部门在上述莹地的右侧，又设置了一处碑园，把七十六块（主要是）西方传教士的墓碑井井有条、错落不齐地竖立在那里。四围用矮墙圈起，苍翠的树木映衬着这片新的碑林，气氛显得宁静肃穆。近年来，寻访者、考察者络绎不绝。

可惜的是，原华丽的汤若望墓的旧物只剩得断壁残垣了。康熙皇帝敕赐的石门等虽然有迹可寻，但只留下一派冷落破败的景象。残破的门楣还可以辨别出它的旧貌。两根石门的门框仍立于左右两侧。框柱的上端篆刻着云朵，顶上各有一只石狮，看上去石狮仿佛蹲坐云端，为汤若望墓守护着大门。可惜它俩由于难以抗拒的原因失了职——把御赐的两扇大门都看丢了。门框两外侧对称的矮墙还依稀显露些昔日的风采，每面墙的四个角各刻一朵彩云花纹，墙的正中是个六边形图案，图上的花饰已难以辨认了。这石门原是汤若望墓地的入口处，步入石门，里面原来依次排列

着成对的石人、石马、石羊和石供。这些如今也都不复存在了，仅剩下一只孤独的石羊，兀自蹲在汤若望墓碑小院的门口，它仿佛满怀着失去伙伴的凄楚之情，默默无言地蹲在那里。石羊若有口，一定会滔滔不绝地向一批批谒墓者诉说汤若望墓地三百多年的变迁史。



## 汤若望生平年表

| 西历         | 中历     | 重要纪事                            |
|------------|--------|---------------------------------|
| 1592. 5. 1 | 明万历二十年 | 生于德意志科隆城。                       |
| 1573—1619  |        |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                       |
| 1582—1585  |        | 科隆之战, 结果巴伐利亚大公爵恩斯特继任科隆主教之职。     |
| 1592—1607  |        | 在科隆郊外的吕符腾贝格庄园度过幼年, 后在科隆三王冕中学就读。 |
| 1594       | 二十二    | 葡萄牙禁止荷兰商船进入里斯本, 荷兰开始向海外扩张势力。    |
| 1601       | 二十九    | 利玛窦抵达北京, 开始与徐光启等接触。             |
| 1602       | 三十     |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
| 1607 夏     | 三十五    | 结束中学学业, 校方决定保送他去罗马深造。           |
| 1608. 5.   | 三十六    | 前往罗马。                           |
| 1608. 7.   |        | 入罗马日耳曼学院。                       |

|               |     |   |
|---------------|-----|---|
| 1610          | 三十八 | 明朝：李之藻等首次采用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人的修历方法。  |
| 1608—1613     |     | 在日耳曼学院读书。   |
| 1611. 10. 21. | 三十九 | 加入耶稣会。  |
| 1613—1617     |     | 在罗马学院攻读。  |
| 1616          | 四十四 | 志愿去中国传教并获得教会方面的批准。  |
| 1617          | 四十五 | 升为神甫。   |
| 1618. 4. 16.  | 四十六 | 从里斯本启程前往中国。   |
| 1618. 10.     |     | 到达印度果阿。   |
| 1619. 7.      | 四十七 | 到达澳门。   |
| 1605—1619     |     | 欧洲：新教同盟势力不断增长，勃兰登堡、乌尔姆、纽伦堡等直属皇帝的城市参加。以巴伐利亚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为首的旧教同盟成立，1610年新旧教同盟议和。1618年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发生，三十年战争随之爆发。 |
| 1619—1622     |     | 荷兰于1619年在爪哇岛建立巴达维亚城。<br>在澳门学习汉语并做其他传教准备。参与葡萄牙与荷兰争夺澳门之战。   |

|           |       |  |
|-----------|-------|--|
| 1619—1621 |       | 明万历皇帝崩，次年光宗继位，又崩。沈淮教案发生。金尼阁、傅汎济、邓玉函、鲁德照等教士侨装秘密入内地传教。 |
| 1621      | 明天启元年 |  |
| 1622 夏秋之交 |       | 与李玛诺等进入内地。   |
| 1623. 1.  | 三年 腊月 | 抵达北京城。   |
| 1623—1626 |       | 在北京学习中文，研习天文，与徐光启等人初交。                               |
| 1625      | 五     | 大秦景教碑在陕西西安出土。  |
| 1627      | 七     | 奉教会之派前往西安。   |
| 1628      | 崇祯元年  |  |
| 1628—1630 |       | 在西安传教，观测天象，与王徽共译圣徒故事一书，即《崇一堂日记随笔》。                   |
| 1629      | 二     | 李自成起义。   |
| 1630      | 三     | 邓玉函卒，皇帝准徐光启奏，召罗雅谷和汤若望进京。                             |
| 1630 秋    |       | 以西法测五月初一日食，应验。                                       |
| 1633      | 六     | 徐光启卒，李天经接任。  |
| 1634      | 七     | 进呈日晷月晷及望远镜等。   |
| 1635      | 八     | 西士就中国礼仪发生的争执开始。                                      |

|      |      |  |
|------|------|--|
| 1636 | 九    | 傅汎济接阳玛诺之职,任耶稣会会长。                                    |
| 1638 | 十一   | 钦天监部分官员疏告西洋教人悖尧舜孔孟之道。                                |
| 1639 | 十二   | 崇祯帝御赐匾额《钦褒天学》。                                       |
| 1640 | 十三   | 修复利玛窦所进西洋琴并呈送巴伐利亚大公礼物《耶稣行迹图》。                        |
| 1641 | 十四   | 加当任司卿衔,受命专理历法。奉旨监造火炮。                                |
| 1642 | 十五   | 与李天经等共译《坤輿格致》,次年刻于北京。                                |
| 1643 | 十六   | 与焦勳译撰《火攻契要》。   |
| 1644 | 十七   | 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殉明。汤留守北京,守护教堂和历书刻版。                        |
| 1644 | 顺治元年 | 清兵入京,福临登基,多尔袞摄政。<br>汤奏获准,可居留北京城内。上谕,着汤掌钦天监信印。        |
| 1644 |      | 依西法所测八月初一日食各省起复时刻一一吻合,朝庭令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天下。十二月初七汤若望接受钦天监职务。 |
| 1645 | 二年   | 进呈西洋新法历书。  |

|      |    |  |
|------|----|--|
| 1646 | 三  | 任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印务。                                   |
| 1648 | 五  | 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字。                                   |
| 1649 | 六  | 勃兰登堡成为选帝侯国。任太仆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
| 1650 | 七  | 顺治帝赐宣武门隙地一块,以资重建天主堂。                             |
| 1651 | 八  | 顺治亲政。<br>二月加太常寺卿,八月授通议大夫。汤祖父、父亲被封通议大夫,祖母、母亲被封淑人。 |
| 1652 | 九  | 进浑天星球,地平日晷,帝赐朝衣朝帽。天主堂竣工,帝赐匾《钦崇天道》。               |
| 1653 | 十  | 敕赐“通玄教师”,加奉一级。                                   |
| 1654 | 十一 | 帝赐汤地亩为日后茔地。                                      |
| 1655 | 十二 | 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用二品顶带。                                 |
| 1656 | 十三 | 荷兰使节来访中任通事。                                      |
| 1657 | 十四 | 御赐《天主堂碑记》及《通玄佳镜》堂额。                              |
| 1658 | 十五 | 获光禄大夫衔,三代领受勋赠。                                   |
| 1659 | 十六 | 阻帝亲征郑成功,郑兵抵宁沪。                                   |

|             |      |   |
|-------------|------|---|
| 1660        | 十七   | 杨光先先后发表《辟邪论》和《不得已》等小册子。<br>勃兰登堡大选侯弗·威廉成为持有主权的普鲁士统治者。              |
| 1661        | 十八   | 庆七十寿辰,蒙赠诗文多篇。<br>顺治崩于天花。<br>清圣祖玄烨登基。                              |
| 1662        | 康熙元年 | 诰封光禄大夫及对汤氏祖父三代“赐封宠命”文书二月二十五日制诰,制成绢轴,邮寄西国。                         |
| 1664        | 三年   | 汤氏《回忆录》手稿携抵罗马。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疏,状告汤及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                         |
| 1665        | 四    | 汤等被告受审入狱,被判死刑。四月京师地震。<br>太皇太后孝庄干预此案。<br>朝庭重新定案,赦免汤等人。<br>给教会写忏悔书。 |
| 1666. 8. 15 | 五    | 逝世于北京。  |
| 1667        | 六    | 康熙亲政。   |
| 1667—1668   |      | 法荷交战结束,亚琛和约签字。  |

- |      |   |  |
|------|---|--|
| 1668 | 七 | 南怀仁等状告杨光先,康熙颁旨,要中西畴人“务须实心定历”。  |
| 1669 | 八 | 南怀仁测日影逐款皆符。<br>汤案昭雪,帝赐银修墓立碑并遣官致祭,此案被牵连者各依情昭雪。<br>南怀仁实理钦天监副职。<br>杨光先革职释放。 |
| 1670 | 九 | 奉旨解送广州的西士仍归各省。   |

## 主要参考书目

- |      |                   |         |         |
|------|-------------------|---------|---------|
| 方 豪  | 中西交通史             | 台北      | 1953    |
| 方 豪  |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 中华书局影印  | 1988    |
| 方 豪  | 中国天主教史论丛          | 商务印书馆   | 1944    |
| 方 豪  | 中外文化交通史           | 独立出版社   | 1944    |
| 方 豪  | 方豪文录              | 岳麓书社    | 1987    |
| 徐宗泽  |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br>提要   | 中华书局    | 1989 影印 |
| 魏特   | 汤若望传              | 商务印书馆   | 1949    |
| 黄伯禄  | 正教奉褒              | 上海慈母堂   | 1904    |
| 樊国梁  | 燕京开教略             | 救世堂     | 1905    |
| 裴化行  | (萧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         |         |
|      |                   | 商务印书馆   | 1951    |
| 德礼贤  |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 商务印书馆   | 1934    |
| 叶德禄辑 | 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br>丛    | 辅仁大学图书馆 | 1943    |
| 顾保鹤编 | 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br>表    | 光启出版社   | 1970    |
| 穆启蒙编 | 天主教史              | 光启出版社   | 无       |
| 费赖之  |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 商务印书馆   | 1938    |



(冯承钧译)

- |     |            |           |         |
|-----|------------|-----------|---------|
| 李志刚 |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 | 台北        | 1985    |
| 罗光  | 利玛窦传       |           |         |
| 罗光  | 中国耶稣会小史    | 上海青年协会印行  | 1918    |
|     | 天主教东传文献    |           |         |
|     |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 光启出版社     | 1972 影印 |
|     | 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  |           |         |
| 南怀仁 | 熙朝定案       | 手抄本       |         |
|     |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 河北献县      | 1937    |
| 杨森富 | 中国基督教史     | 台北商务印书馆   | 1968    |
| 包乐士 | 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1989    |
| 庄国土 | (约翰·尼霍夫原著) |           |         |
| 包乐士 | 中荷交往史      | 路口店出版社    | 1989    |
| 王之春 | 清朝柔远记      | 中华书局      | 1989    |
| 谈迁  | 北游录        | 中华书局      | 1960    |
| 张宸  | 平圃杂记       | 庚辰丛编      |         |
| 李逊之 | 三朝野记       | 历史研究社     | 1982    |
| 杨光先 | 不得已        | 天主教东传文件续编 |         |
| 汤若望 | 远镜说        | 商务印书馆     | 1936    |
| 汤若望 | 主制群微       | 绛州        | 1929    |
| 汤若望 | 崇一堂日记随笔    | 绛州        | 1929    |
| 王微  |            |           |         |
| 汤若望 | 火攻挈要       |           |         |
| 焦勛  |            |           |         |
| 王萍  | 西方历算学之输入   | 台北精华印书馆   | 1966    |
| 文秉  | 烈皇小识       | 广文书局      | 1967    |

Berhard Duhr; Geschichte der Jesuiten in den Länderndeutscher  
Zunge Regensburg, München, 1982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 unter Leitung von Pater  
Adam Schall von Bell Wien 1834

Übersetzt von Mannegge

Historica relatio, progressu fidei orthodoxae in regno chinensi per  
Missionarios Societatis Jesu, Anno 1581 usque ad Annum 1669  
Regensburg 1672

Anton Huonder; Der chinesische Ritenstreit  
Aachen, 1921

Anton Huonder; Die Verdienste der katholischen Heidenmission  
... Aachen 1923

Anton Huonder; Deutsche Jesuitenmissionäre des 17. – 18.  
Jahrhunderts Freiburg 1899

Claudia von Collani; Die Figuristen in der Chinamission  
Frankfurt/M, Bern, 1981

Alfons V ä 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K ö ln 1933

Hubert Gundolf; China zwischen Kreuz und Drachen  
M ö dling, 1969

Albert Werfel u. a. ,hrsg. ; Leben ausgezeichnete Katholiken der  
drei letzten Jahrhunderte  
Schaffhausen 1852

Carl Platzweg; Lebensbilder deutscher Jesuiten in ausw ä rtigen  
Mission  
Paderborn 1934

Felix Plattner; Der große Doktor Tang

Saarbrücken, 1935

Joseph Stöcklein; Der Neue Welt Boot (1642--1748)

Augsburg, Grätz

A. Werfer. hrsg.; Leben des Paters J. A. Schall und sein Wirken  
in China Schaffhausen, 1871

Werner Neite; J. A. Schall v. Bell, S J 1592--1666, ein Kölner As-  
tronom am chinesischen Hof

Köln, 1992

George Dunne; Das grosse Exempol

Stuttgart, 1965

J. Gernet; Christus Kam bis nach China

Zuerich Muechen 1984

## 档 案 资 料

|       |   |   |
|-------|---|---|
| 北 京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br>中国科学院图书馆<br>故宫博物院图书馆<br><br>中国历史博物馆                      | 前三朝题本等<br>汤若望奏疏等<br>崇祯历书,西洋<br>新法历书等<br>汤若望制日晷等   |
| 慕尼黑   | 巴伐利亚国家中心档案馆<br>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手迹部<br>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br>图书馆手迹部<br>耶稣会上德意志省档案馆 | 耶稣会档<br>奉天敕谕等<br>诰封汤氏三代<br>文书,赠言合刻等<br>魏特(A. Vath)<br>专档<br>Der Neue Welt<br>boote<br>纪念汤若望诞辰<br>四百年资料汇集<br>基督教传教史等 |
| 圣奥古斯丁 | 华裔学志图书馆   | 见界一黄道等总<br>星图,汤氏著作<br>Jap-sin 等手迹   |
| 罗 马   | 梵蒂冈图书馆<br><br>耶稣会档案馆  |   |

Lanqin Li

Lebensbilder vo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 INHALTSVERZEICHNIS

Vorwort

- Kapitel 1 Die Zeit in Europa
- Kapitel 2 Kleine Geschichte ueber das Bauen von  
Kanonen
- Kapitel 3 Die ersten Kontakte zwischen China und  
den Niederlanden; Schall als Mittler
- Kapitel 4 Adam Schall und die chinesischen  
Intellektuellen
- Kapitel 5 Zwischen dem Qing-Kaiser und dem westlichen  
"Mafa"
- Kapitel 6 Vermittlung westlicher Wissenschaften in  
China
- Kapitel 7 Missionstaetigkeit im Reich der Mitte
- Kapitel 8 Falsche Anschuldigung, ungerechte Verurteilung  
und wiedergutmachende Rehabilitierung
- Anhang: Zeittafel von Adam Schall  
Literatur (abgekuerzt)  
Archiv und Bibliothek

